

学校的理想装备

电子图书·学校专集

校园网上的最佳资源

抗美援朝纪实



编者的话

历史学是一门古老而富活力的学科。它的鉴往知来、资治育人的社会功能，历来为人们所重视。孔夫子说：“殷因于夏礼，所损益可知也；周因于殷礼，所损益可知也。其或继周者，虽百世可知也。”就是说，历代社会的因革都有规律可循，从夏、商、周的变化情况，可以推知后世的演变趋向。清人龚自珍说：“欲知大道，必先知史。”章太炎说：“不读史，则无从爱其国家。”把读史知史视为做人和爱国的前提。于此可见前人对历史是何等重视。毛泽东爱好历史，并号召全党都要“学点历史”更是众所周知的。

我国老一辈史学家是很重视历史知识的普及工作的。三四十年代，范文澜著《大丈夫》，吴晗著《历史的镜子》，胡绳著《二千年间》等，五六十年代，吴晗主持编写“中国历史小丛书”和“外国历史小丛书”，都产生过很好的影响。令人欣慰的是我们这套丛书的作者中有不少知名学者和研究有素的专家。我们希望有越来越多的史学工作者关心和重视这项工作。让历史学走出书斋，服务现实。

这套丛书首批两个系列由广东人民出版社和华夏出版社联合推出。如果读者需要，我们将继续编辑出版其他系列。

由于时间仓促，缺乏经验，一定会有许多不足之处。我们竭诚欢迎广大读者提出宝贵意见，以便把以后的工作做得更好。

1995年11月

作者简介

齐德学，辽宁省黑山县人，1950年4月生，1968年2月参加中国人民解放军，1975年7月毕业于吉林大学，现为军事科学院军事历史研究部副研究员、研究室主任。先后参加编写军事历史专著4部，自著和主编军事历史专著1部。

抗美援朝纪实

第一章

邻居失火

- 美苏妥协，一条三八线将统一的朝鲜分割为南北两半
- 朝鲜民主主义人民共和国与大韩民国
- 对立的南北政权由小打而大打
- 美国为首的“联合国军”使失衡的天平更加失衡

朝鲜，在地理上，是从亚洲东北大陆伸出的一个狭长半岛，三面环海，北面与中国和俄国接壤。半岛南北长 800 余公里，东西宽 170—340 公里，面积 22 万余平方公里。这里居住着一个勤劳的民族，具有悠久的文化和历史，早在公元 1 世纪，就是一个统一的王朝，14 世纪定国号为朝鲜。然而，这个民族，历史上多遭劫难，到 20 世纪初期的日俄战争后，于 1910 年，被日本殖民主义者吞并，长期遭受日本军国主义的蹂躏践踏。直到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日本帝国主义被打败宣布投降，朝鲜人民才从日本帝国主义的奴役下解放出来。然而，朝鲜人民在欢庆解放的同时，又陷入了新的忧愁，统一的民族被人为地分裂了。

一、美、苏两国植下祸根

在第二次世界大战进行到 1943 年底的时候，遭受日本奴役之苦的朝鲜人民，引起了反法西斯同盟国的关注。12 月 1 日，由中国、美国、英国发表的《开罗宣言》说：“我三大同盟国轸（音“诊”）念朝鲜人民所受之奴隶待遇，决定在适当期间，使朝鲜自由独立。”

到了 1945 年 2 月，反法西斯同盟的苏联、美国、英国三国首脑约瑟夫·斯大林、富兰克林·罗斯福和温斯顿·丘吉尔，在苏联克里木半岛南岸的雅尔塔举行会议，商议分区占领德国和柏林、苏联对日参战和战后世界的安排等问题，并签订了《雅尔塔协定》。协定规定了苏联对日作战条件，背着中国政府（当时是国民党政府）践踏中国主权，其中包括外蒙古独立、苏联使用中国大连港和苏联通往大连铁路的优越权益、租用旅顺为海军基地等。实际上，这次会议是三国划分战后势力范围的会议。战后世界政治格局的形成和许多国际问题的出现，都与这次会议有着直接的关系。朝鲜问题也不例外。会议期间，罗斯福同斯大林私下谈及朝鲜问题。这是美苏首脑首次就日本投降后朝鲜如何安排问题进行商谈。罗斯福认为，朝鲜不具备自治能力，需由苏、中、美三国共同托管 20~30 年。斯大林提出：托管时间越短越好，并应有英国参加。两人就这个问题私下达成了谅解。4 月中旬，罗斯福逝世，由当时的副总统哈里·杜鲁门接任总统。5 月下旬杜鲁门派特使去莫斯科商谈有关问题。该特使在谈到朝鲜问题时，斯大林告诉他，俄国允诺执行四国托管朝鲜的政策。

在德国法西斯战败投降后，1945 年 7 月 17 日至 8 月 2 日，苏联部长会议主席斯大林、美国总统杜鲁门、英国首相丘吉尔（后为艾德礼）及三国外长，在柏林西南的波茨坦再次举行会议。会议发表了《波茨坦协定》和《促令日本投降的波茨坦公告》。公告中，对朝鲜问题重申了《开罗宣言》中的

内容。会间，苏联通报准备于8月8日对日宣战，并探询美国是否有同苏联在朝鲜联合登陆的意向。而美国的愿望，最好是独占朝鲜，但他们估计，在朝鲜登陆会遭受重大伤亡，与其如此，莫如将这个重大伤亡送给苏联去承受，而自己坐收渔利。此外，美国认为，如果把必要的美军运到朝鲜，则无法保证抢先在日本登陆。因此，美、苏两国只划定了空中和海上对日作战的分界线，而没有划定地面部队作战的分界线。

美国万万没有料到，苏联于8月8日对日宣战后，立即于9日就对日军发起了进攻，并且发展很快。10日，日本内阁决定投降，并通知了美国等有关国家。这时美国人才有点着急了。距离朝鲜最近的美国地面部队，尚在600公里以外的冲绳岛，无论如何不会很快赶到朝鲜，倘若日本宣布投降，整个朝鲜岂不都被苏军占领了？美国不甘心这个结果。于是，迫不及待，要同苏联在朝鲜划出一条接受日军投降的分界线。

在地图上，北纬38°线（下称“三八线”）恰好位于朝鲜半岛南北中央。于是美国陆军部建议以三八线为界，该线以北为苏军对日受降区，该线以南为美军对日受降区。这个建议立即得到美国军方和国务院的同意，8月14日获得了总统的批准。然而，这不是美国单方面一厢情愿的事，必须征得苏联的同意。8月16日，斯大林得到了这个提议，同美国作了妥协，未表示反对意见。于是三八线的问题就这样定下来了。统一的半岛被人为地分割为两块。

8月15日，日本宣布投降。此时，苏军在金日成领导下的朝鲜人民革命军（朝鲜人民军前身）的配合下，迅速解放朝鲜三八线以北全部领土，一部并进至三八线以南。根据美、苏两国以三八线为界，分区接受日军投降的默契，苏军全部撤至三八线以北。

直至9月2日日本在投降书上签字后，美军才迟迟于9月8日和9日从朝鲜的仁川和釜山港登陆，开始占领朝鲜三八线以南地区。

由于美、苏两国在朝鲜问题上的妥协，以三八线为界分区受降和占领，使朝鲜人民刚刚挣脱日本的奴役，又开始陷入南北分裂的状态。从此埋下了朝鲜战争爆发的祸根。

二、朝鲜内战爆发

美国 and 苏联本来就是社会制度和意识形态完全不同的两个国家，在第二次世界大战中为了反法西斯的共同利益，临时结成了同盟。反法西斯战争胜利后，共同利益消失，两国便立即转为尖锐对立和斗争。不言而喻，他们必然推行各自的政策，按照自己的意识形态管理所占领的朝鲜南方或北方。

美军进入南朝鲜以后，立即解散了那里已经建立起来的人民政权——各级人民委员会，重新启用日本的殖民统治机构来维护美国的新的殖民统治。为朝鲜人民所痛恨的日本警察，居然戴上美国“军政府”的臂章招摇过市、横行不法。这些激起了朝鲜人民的愤怒。美国占领军司令官，在占领南朝鲜3个月后给参谋长联席会议的报告中说：“在南朝鲜，人们把分裂的局面归罪于美国，这个地区的人民越来越憎恨一切美国人。”杜鲁门在回忆录中也承认说：“大多数朝鲜人既不希望美国士兵，也不希望俄国士兵留在自己的国土上，……1946年秋季，在我们占领的地区，曾发生过几起骚乱和示威运动，在少数情况下，我们的军队还不能不向进行示威的群众开枪射击。”

与此相反，苏军进入朝鲜后，立即宣布“朝鲜已成为自由的国家”，帮

助朝鲜人民建立自己的人民政权机关，得到了朝鲜人民的拥护。

关于由四国托管逐步建立朝鲜统一政府之事，虽然美、英、苏三国外长于 1945 年 12 月达成过一个协议，后来中国国民党政府也参加了这个协议。但是，由于美、苏两国尖锐的政治对立，在建立一个什么样的统一政府问题上不可能形成一致的意见，因此，“托管”协议只能是一纸空文。虽然将这一问题提交已成立的联合国，但联合国本身就是在反法西斯同盟基础上产生的，美苏两国的对立和斗争，同样表现在联合国的活动中，并且，此时在国际上已形成了以美、苏两国为代表的完全对立的两大政治阵营，朝鲜是这两大政治阵营在东方斗争的主要阵地。因此，联合国不可能解决朝鲜问题。

美国在朝鲜的目的，不在四国托管，而是要建立一个由其控制的傀儡政权。为达到这个目的，1948 年 2 月，美国借联合国的招牌，强行决定在南朝鲜举行单独选举。经过美国的精心策划和导演，在美军刺刀的威逼下，南朝鲜举行了单独选举，选举了就连杜鲁门也认为是“专横”、“任性”、“不得人心”的 70 多岁的老头子李承晚为总统，组成“大韩民国政府”。8 月 15 日，这个政府在汉城粉墨登场。

在这种形势下，朝鲜北方于 8 月 25 日也进行了选举，并邀请南方的选民代表参加。9 月 9 日，组成了以金日成为首相的朝鲜民主主义人民共和国政府。

在朝鲜北方政府的要求下，苏联占领军于 1948 年底以前全部撤出朝鲜。美国占领军迟至 1949 年 6 月底才全部撤出朝鲜。此后，美苏两国在朝鲜问题上的对立和斗争，便具体表现为朝鲜内部南北两个政府、两种制度之间，在如何实现南北统一和统一于谁的问题上的尖锐对立和斗争。

以金日成为首的朝鲜北方政府，代表朝鲜的进步势力，主张和平统一，并做了不懈的努力。

在南方，李承晚集团代表朝鲜的反动势力，投靠帝国主义，实行血腥的恐怖统治，竭力主张武力统一，叫嚷“要结束南北分裂，就必须用战争来解决”。李承晚在大肆叫嚷和加紧战争准备的同时，自 1949 年以来，还不断加剧在三八线地区的武装挑衅，1950 年初开始向三八线地区大规模集结武装部队。火药味越来越浓，一场内战已不可避免。美国积极支持李承晚的活动，并进行挑唆。在朝鲜内战爆发前一个星期，美国国务院顾问约翰·福斯特·杜勒斯，到南朝鲜活动，视察了三八线，并鼓动说：“如果与共产主义妥协，那就等于选择导致灾难的道路。”“美国准备给予正在如此英勇与共产主义作斗争的南朝鲜以一切必要的精神上和物质上的援助。”

针对李承晚集团的磨刀霍霍，朝鲜北方也做了必要的准备。

三八线上长期小规模武装冲突和磨擦，至 1950 年 6 月 25 日，终于发生了质变，响起了不同以往的激烈枪炮声，朝鲜大规模内战爆发了。

三、美国公然武装入侵

朝鲜内战爆发，立即在国际上引起了反响，反映最为强烈的当属美国。

当年美国不费一枪一弹，白手分享了日军在朝鲜投降的利益。但是美国认为，朝鲜对于美国来说，在经济上、军事上均没有战略上的重要价值。1949 年上半年，美国占领军撤出朝鲜，这是其中的重要因素。1950 年初，美国当局在确定美国在远东和太平洋地区的利益范围时，也将朝鲜半岛划在了圈

外。但是，做为资本主义世界的“领袖”和霸主，美国不可能，也没有完全抛弃南朝鲜。在其占领军撤出南朝鲜时，留下 500 余人的军事顾问团，控制南朝鲜军队；美国陆军部并制定了一旦在三八线发生大规模武装冲突时，美国的应急行动方案。这个方案大致内容如下：

1. 撤离在朝鲜的美国侨民眷属；

2. 把战争的责任嫁于北朝鲜，宣布北朝鲜发动了进攻，并提交联合国讨论北朝鲜发动进攻问题。

3. 在前两方案不能解决问题时，则利用联合国由美国军队和其他成员国军队组成特遣队，对朝鲜采取警察行动。实际上，就是打着联合国的招牌，侵入朝鲜，支援李承晚集团作战。

在朝鲜内战爆发的当晚，美国军政当局的巨头们，就紧锣密鼓地行动起来。他们首先考虑的是，朝鲜战争的爆发，是苏联共产主义在朝鲜问题上向自由世界的挑战，做为自由世界的“领袖”——美国，对此不能视而不见，否则有失自由世界“领袖”的面子。美国必须在朝鲜采取行动。然而，美国一国采取行动，会被指责为侵略。那么最好的办法就是打着联合国的旗号进行活动。联合国是个复杂的国际组织，苏联和许多共产主义国家都是其中的成员，不可能迅速做出符合美国愿望的决定，而南朝鲜又不能等待。

怎么办？美国当局按照预定的紧急行动方案，先斩后奏，当晚就做出决定：命令驻东京的美国远东军总司令道格拉斯·麦克阿瑟，从 26 日起，派出驻日本的美国空军飞机和海军舰艇，以掩护美国侨民眷属撤退的名义，支援南朝鲜军作战；命令驻菲律宾的美国海军第 7 舰队，以“台湾海峡中立化”、“台湾地位未定”为名，侵入台湾海峡，阻止中国人民解放军解放台湾的任何进攻；加速对菲律宾季里诺傀儡政府和侵略越南的法国军队的军事援助。同时决定在联合国积极活动。27 日，美国总统杜鲁门发表声明，公开宣布了上述决定。

从 26 日起，美国驻日本的海军和空军公开侵入朝鲜，武装干涉朝鲜内战，美国海军第 7 舰队侵入中国台湾和台湾海峡。同时乘苏联驻联合国代表缺席之机 and 中国的合法席位被蒋介石集团占据的情况，操纵联合国安全理事会，先后通过了指控北朝鲜发动了进攻和要求联合国会员国以“紧急军事措施”给予南朝鲜以“必须的援助”的决议。

7 月 1 日，美国地面部队侵入朝鲜。7 日，美国再次操纵联合国安全理事会，通过了授权组成以美国军队为主的侵朝“联合国军”的决议。8 日，杜鲁门任命麦克阿瑟为侵朝“联合国军”总司令。陆续参加“联合国军”侵朝行动的先后有 16 个国家的军队，美军占 90% 以上，英国为两个旅、加拿大和土耳其各一个旅，其他国家只是象征性地派出一个排到一个营。南朝鲜不是联合国成员国，但 7 月中旬，李承晚也将南朝鲜军交“联合国军”指挥。

至此，美国将其一国对朝鲜的侵略行动，披上了“联合国”的外衣。美国军队的入侵，使本来是南北双方内战的朝鲜战争，变成了侵略和反侵略的战争，并使朝鲜问题的解决更加复杂化了。

第二章

被迫出兵

- 千疮百孔、百废待兴的新中国
- 毛泽东、周恩来的先见之明
- 边防军备战东北
- 侵略者不听劝告
- 仁川登陆，人民军腹背受敌，危在旦夕
- 金日成紧急求援，毛泽东毅然决策
- 彭大将军挂帅出征

中国人民同美国在朝鲜半岛进行一场较量，并非出于计划，而是美国侵略者迫使中国人民不得不这样做，且确是帮助朝鲜人民反抗美国侵略和保卫中国安全利益的需要。

一、朝鲜战争爆发时中国的形势

中国共产党领导中国人民经过 28 年不屈不挠、艰苦卓绝的斗争，终于推翻了帝国主义、封建主义和官僚资本主义在中国的统治。1949 年 10 月 1 日，毛泽东代表中国人民在天安门城楼上庄严宣告：“中华人民共和国中央人民政府成立了！”从此，百余年来备受欺侮、奴役和压迫的中国人民站起来了。

然而，摆在中国共产党和中国人民面前的形势，依然相当严峻。长期战争的破坏，使整个中国成了一片废墟，到处是“破烂摊子”。“千疮百孔”、“百废待兴”，是对当时中国状况的恰当形容和概括。一切须从头做起。

经济方面，主要工农业产品的产量，普遍低于历史最高水平，工农业总产值只有 466 亿元人民币（50 年代新币值）；工业水平相当落后，没有象样的加工工业，更没有机械制造业，工业产值仅占工农业总产值的 17%；占农村人口绝大多数的新解放区，土地改革尚未开始；国家财政赤字庞大，通货膨胀严重，物价不稳，财政经济存在着巨大的困难。

政治方面，到 1949 年底，全国还有海南岛、台湾等大部沿海岛屿没有解放；大陆上还残留着国民党小股部队和土匪武装 200 余万人，他们还在进行破坏活动；新解放区的人民政权刚刚建立，还不巩固；以美国为首的帝国主义不甘心在中国的失败，采取政治上颠覆、外交上孤立、军事上包围、经济上封锁的政策，企图把新中国扼杀在摇篮里。此外，城市数百万工人和知识分子失业等等，存在着许多动荡不安的因素。

面对这种严峻的形势，中国人民非常需要一个和平安定的环境，以治理这“百孔千疮”，恢复和建立正常的生产秩序、生活秩序，恢复和发展科学文化教育事业，巩固新生的人民民主政权。

到了 1950 年 6 月，除台湾和西藏外，全国大陆和大部沿海岛屿已解放，大规模战争基本结束。在这种形势下，中国共产党于 6 月 6 日至 9 日，在北京召开了第七届中央委员会第三次全体会议，适时将主要精力和中心工作，由领导中国人民取得解放战争的胜利，转为领导中国人民恢复国民经济建设。确定中心任务是，以三年左右时间，争取国家财政经济状况根本好转。为此已着手进行解放区的土地改革，调整工商业，精简国家机构和节减经费

开支，人民解放军开始有计划地大批复员，参加国家经济建设。

然而，中国人民的良好愿望，由于美国大规模侵略朝鲜和占领中国领土台湾而遭到破坏，刚刚制定的恢复国民经济的各项计划，不得不做必要的调整。

二、毛泽东、周恩来的先见之明

在中国共产党七届三中全会结束仅仅半个月时间，朝鲜内战爆发，美国即大规模武装入侵朝鲜，同时侵入我国的台湾和台湾海峡。这不能不引起中国人民的高度关注和警觉。中华人民共和国中央人民政府主席毛泽东和政务院总理兼外长周恩来，纷纷发表讲话、声明，谴责美国的侵略行径，表明反抗美国侵略的决心和态度。

朝鲜人民没有被气势汹汹的美国帝国主义所吓倒，在金日成的领导下，朝鲜人民军势如破竹，打得美军和南朝鲜军一路败退。6月28日解放汉城，7月上旬进至北纬37°线（下称“三七线”）附近。

毛泽东、周恩来等中共中央领导人，冷静地分析了朝鲜战局形势，认为，由于美国军队的大规模入侵，朝鲜局势有恶化的可能，美国甚至进一步扩大战争，有攻击我国东北的可能。因此，我们不能不有所防范，预做必要准备。毛泽东委托主持军委日常工作的周恩来副主席，召集中国人民解放军总司令朱德、中央军委代总参谋长聂荣臻、总政治部主任罗荣桓，以及林彪、萧华、萧劲光、刘亚楼、杨立三、李涛、许光达等军队有关方面的负责人，于7月7日和10日，两次开会讨论我国国防问题。中央军委根据两次会议的讨论，于7月13日做出了《关于保卫东北边防的决定》。

决定抽调第13兵团（辖第33、第39、第40军）和第42军，及炮兵第1、第2、第8师等部，共25万余人，组成东北边防军，保卫我国东北边防，并准备必要时支援朝鲜人民军作战；任命人民解放军著名战将粟裕为东北边防军司令员兼政治委员、萧劲光为副司令员、萧华为副政治委员、李聚奎为后勤司令员；任命邓华为第13兵团司令员、赖传珠为政治委员、解沛然（解方）为参谋长、杜平为政治部主任。

随着国内大规模战争结束，恢复国民经济中心任务的确定，上述部队多数已枪炮入库，从事农业生产和水利建设工作。没想到征尘刚洗，又披战袍，放下生产的锹镐，告别即将成熟的庄稼，从湖北、河南和黑龙江的齐齐哈尔等地区整装开拔。一个月时间，全部到达辽东和吉林省的东南部地区，开始突击整训。

此时，边防军首长或因有病或因工作脱不开，一时都难以到任，而边防军的整训工作则不能拖延。于是经周恩来、聂荣臻建议，毛泽东批准，边防军暂归东北军区司令员兼政治委员高岗指挥，并统由东北军区供应，李聚奎改任东北军区后勤部长。边防军的训练工作由第13兵团统一组织，并先后任命洪学智、韩先楚为第13兵团第一副司令员和副司令员，赖传珠离职养病，由邓华兼兵团政治委员。

8月初，中央政治局讨论朝鲜局势时，认为对朝鲜人民来说，能否取得胜利已进入紧张时期。毛泽东明确指出：如果美帝胜利，它就会得意，就会威胁我国。对朝鲜我们一定要帮，以志愿军的形式帮，时机还要选择。仗打起来，有短打、有长打，还有大打和打原子弹。原子弹我们没有，只好让他

打，我们还是打手榴弹。但我们不能不有所准备。

毛泽东还指示高岗，召开边防军师以上干部会议，说明作战的目的、意义和战略方向，要求各部于本月内完成作战准备，待命出动。高岗遵照毛泽东的指示，于8月13日召开边防军军事会议，传达了中央的意图，并部署了边防军各项作战准备工作。中央军委根据边防军集中后反映出的战略水平较低的情况，将边防军完成作战准备时间向后推延一个月。

到8月上旬，朝鲜人民军已解放了三八线以南90%的地区，人民军的作战势头已开始减弱，并于8月中旬，同美军和南朝鲜军僵持在朝鲜东南隅的洛东江一线。

鉴于朝鲜战局形势的变化，经聂荣臻代总长建议，中央军委又决定，解除宋时轮指挥的第9兵团（辖第20、第26、第27军）所担负的准备解放台湾的任务，集结津浦铁路沿线整训，同时解除杨得志、李志民指挥的第19兵团（辖第63、第64、第65军）在西北地区的任务，集结陇海铁路沿线整训。该两兵团做为东北边防军的二线部队，待东北边防军一旦参战后，做为第二、第三批部队调用。9月上旬，又将在湖北的第50军编入东北边防军序列。

为了督促检查边防军的各项准备工作，根据毛泽东的指示，周恩来于8月下旬再次召开国防会议。周恩来在会上指出：我们对于朝鲜问题，不仅看成是兄弟国家，同我国东北相联有利害关系，而且应看成是重要的国际斗争。我们要做好准备，并要做战争长期化的准备，防止临急被动。周恩来还设想了边防军一旦参战后，部队补充的几种方式。会议确定，向苏联订购武器装备，加速空军、炮兵、装甲兵的建设，以便适应一旦参战后作战的需要。

组成东北边防军，进行作战准备，这是毛泽东、周恩来等中共中央领导人军事战略上的高瞻远瞩，是先见之明的战略举措，为保卫我国国防安全和必要时支援朝鲜人民反抗美国侵略，争取了军事上的主动，为后来做出抗美援朝、保家卫国的战略决策，准备了必要的军事力量。

美国侵略朝鲜与台湾，给中国人民提出了新课题，一场较量难以避免，中国人民不得不分散一部分精力，进行必要的准备。

三、侵略者不听劝告

中国人民在强烈抗议美国侵略行动的同时，一再主张和平解决朝鲜问题，支持苏联常驻联合国代表雅科夫·马立克在安全理事会上提出的和平解决朝鲜问题的建议，主张在朝鲜停止军事行动，并从朝鲜撤退一切外国军队。但美国不顾中国人民的一再抗议和谴责，也不理睬中国和苏联关于和平解决朝鲜问题的建议和主张，继续扩大战争。

8月27日，美国侵略朝鲜的空军飞机，先后以5批13架次侵入我国领空，扫射我国东北边境地区的辑安（今集安）、安东（今丹东）等地的火车站、机场等。29日以后，美国侵朝空军的飞机不断继续侵入我国领空，对我国城乡进行轰炸扫射，我国边境人民遭到杀伤，财产遭到破坏。对此，周恩来外长代表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向美国提出了严正的抗议。

在朝鲜战场，美国继续增兵洛东江一线，参加“联合国军”侵朝的其他国家军队也开始进入朝鲜。经过麦克阿瑟的精心策划和准备，9月15日，集中美第10军指挥的两个师，在260余艘舰艇和近500架飞机的支援配合下，

在距汉城 30 公里的朝鲜西海岸仁川港，实施了大规模的登陆进攻。占领仁川后，兵分两路，以美陆战第 1 师向东攻打汉城，以美步兵第 7 师向南进攻，截断在洛东江一线的朝鲜人民军主力的后路。与此同时，在洛东江一线的美第 8 集团军司令官沃尔顿·沃克指挥的美军 4 个师和南朝鲜军 6 个师，也于 16 日发起反击，致使朝鲜人民军腹背受敌，被迫组织战略退却。朝鲜战争形势发生了逆转，美军大举向三八线攻进。9 月 28 日，美陆战第 1 师占领汉城，29 日，美第 8 集团军进抵三八线，并且准备越过三八线继续北进。

鉴于美军仁川登陆后向三八线进攻的形势，9 月 27 日，中央军委代总参谋长聂荣臻，对印度驻华大使表明了中国的态度：“一旦战争起来了，我们除了起而抵抗之外，是别无他途可循的。”9 月 30 日，周恩来总理在庆祝中华人民共和国建国一周年的报告中严正警告美国当局：“中国人民是热爱和平的。……很明显，中国人民在解放自己的全部国土以后，需要在和平而不受威胁的环境之下来恢复和发展自己的工业生产和文化教育工作。但是美国侵略者如果以为这是中国人民软弱的表现，那就要犯与国民党反动派同样严重的错误了。中国人民热爱和平，但是为了保卫和平，从不也永不害怕反抗侵略战争，也不能听任帝国主义者对自己的邻人肆行侵略而置之不理。”

然而，早在 9 月 27 日，美国当局即向麦克阿瑟发出了越过三八线向北进攻的指令。28 日，麦克阿瑟做出了北进的简要计划：最早 10 月 5 日，最迟 10 月 30 日，向三八线以北进攻，以第 8 集团军沿开城——沙里院——平壤轴线，夺取平壤，以第 10 军在东海岸的元山再次登陆，占领平壤、元山一线后，以南朝鲜军向定州——宁远——咸兴一线以北进攻。29 日，美国当局进一步指令麦克阿瑟，必须越过三八线北进，造成既成事实，迫使联合国通过同意在三八线以北进行军事行动的决议。

这期间，美国当局欺骗中国人民，通过印度政府告诉中国，说美国没有越过三八线北进的打算。10 月 1 日、2 日，我国政府已得知，美国决定越过三八线继续扩大侵略。于是，3 日凌晨，周恩来总理兼外长紧急召见印度驻华大使潘尼迦，请他通过印度政府告诉美国当局：“美国军队正企图越过三八线，扩大战争。美国军队果真如此做的话，我们不能坐视不顾，我们要管。”

然而，美国当局错误地估计了中国人民反抗侵略的决心和力量，根本没把中国人民放在眼里，认为周恩来的警告，不过是虚张声势，是苏联和中国为了挽救北朝鲜政权进行外交斗争的一部分，是对联合国即将决议联合国军在北朝鲜行动的恫吓。美国中央情报局的专家，也向白宫报告称：“尽管周恩来发表了声明和中国的部队正向满洲机动……，但没有令人信服的证据表明，中国真的打算干涉朝鲜……。从军事上看，干涉朝鲜的最好时机已经过去。”美国军界认为，无论苏联或中共，“干涉朝鲜”都要冒世界大战的风险，苏联没有做好冒这种风险的准备，中共在军事上不具备单独“干涉”的能力。因此，苏联和中共都不会对朝鲜进行“干涉”。

鉴于这种分析，10 月 7 日，美军大举越过三八线北进。同一天美国操纵联合国大会，通过了所谓“统一朝鲜”的决议，使美国军队在三八线以北的侵略行动，取得了形式上的“合法化”。

10 月 1 日和 9 日，麦克阿瑟两次狂妄地向朝鲜北方发出最后通牒，要求朝鲜人民军无条件投降。

美国军队大举向三八线以北进攻，朝鲜民主主义人民共和国处境危急，中国大陆的安全受到了严重的威胁。战火已经烧到了中国的大门口。

四、中共中央被迫决策“抗美援朝、保家卫国”

在美军仁川登陆以后，朝鲜人民军主力被隔在三八线以南，并遭到南北两面敌人的夹击，损失严重。仅仅依靠人民军的力量，不但已不可能将美国侵略军赶出朝鲜，而且也难以组织有效的防御将美军阻止在三八线以南。因此，在美军已进抵三八线即将北进的时刻，1950年10月1日，朝鲜民主主义人民共和国首相金日成和外相朴宪永，向中国发出了请求。他们在给毛泽东的信中说：

在目前，敌人趁着我们严重的危机，不予我们时间，如果继续进攻三八线以北地区，只靠我们自己的力量是难以克服此危机的。因此，我们不得不请求您给予我们以特别的援助，即在敌进攻三八线以北地区的情况下，急盼中国人民解放军直接出动，援助我军作战。

{ewc MVIMAGE,MVIMAGE,!12300160_0021-1.bmp}

毛泽东主席与金日成首相在一起

中朝两国一衣带水，紧密相连，历史上两国人民就有相互援助的好传统。邻居失火，岂有不救之理？！中国人民早已表示了援助朝鲜人民反抗美国侵略的愿望，尤其是，与朝鲜一江之隔的东北地区的人民，还筹集了许多援助物资。况且美国侵略朝鲜的战火已经烧到了我国的大门口。历史的经验告诉中国人民，对于帝国主义的侵略，只有坚决抵抗才是出路，妥协退让只能换来帝国主义者更大的贪心和自己国家更大的屈辱。对于已经站起来的中国人民，绝不容许任由帝国主义欺侮、宰割的历史重演。

10月2日，毛泽东致电斯大林，表明了中国人民决定以志愿军的名义出动到朝鲜作战的决心，同时请求苏联政府对我们提供武器装备援助。

同一天，毛泽东致电高岗和邓华，召高岗速动身来京开会，令邓华结束边防军的准备，待命出动。

10月4日、5日，中共中央政治局在北京中南海召开会议，讨论出兵问题。当时的政治局成员毛泽东、朱德、刘少奇、周恩来、任弼时、陈云、康生、高岗、彭真、董必武、林伯渠、邓小平、张闻天、彭德怀、李富春等均出席了会议，中共中央办公厅主任杨尚昆和中央负责新闻工作的胡乔木同志列席了会议。彭德怀是4日才被从西安接来北京，到京时会议已经开始。

讨论中有的同志对出兵抗美援朝有顾虑，觉得朝鲜人民已经处境危急，确实需要帮助，但我国也确有许多困难。当时我国的困难主要是：1.长期战争的创伤还没有治愈；2.土地改革工作尚未完成；3.大陆的土匪特务还没有完全肃清；4.军队的武器装备落后，训练也不充分；5.部分军民存有厌战情绪。就我军的装备水平，同世界上最现代化装备的美军作战，能否打赢？我国的经济力量能否支持持久战争？一旦引火上身，我们国家将更加困难。这些都是实际问题。出兵与否，对中国共产党的领袖们来说确实是个两难的问题。

1951年1月，周恩来在一次会议上讲道：当着朝鲜正受到美帝国主义摧残的时候，美国侵略军越过了三八线逼近鸭绿江的时候，我们下决心是很不容易的。当时有许多顾虑，而这些顾虑从当时的情况看是实际的。毛主席说，我们可以提出几十条、几百条甚至几千条困难，但对于美帝国主义的疯狂侵略不能不给以回击。我们的困难是可以克服、可以忍受的。我们必须争取胜

利，并且是有有利条件的。

确实，美国虽然经济力量强大，军队装备优良，并且手里握有原子弹，气势汹汹，不可一世，但他也有弱点和不足。他所进行的战争是侵略战争，在政治上孤立，失道寡助；在军事上，战线长，后方远，兵力不足（当时总兵力只有 150 万人）并且士气不高；盟国已经不强，英国、法国在第二次世界大战中伤了元气；原子弹并非美国所独有，苏联于 1949 年已试验成功，并且不能轻易使用，对战争胜负也不起决定作用。

中国出兵参战是反抗侵略，是正义行动，师出有名，可以动员中国人民全力支援，能够得到世界爱好和平和正义的人民的同情和支持，政治上得多助；中国人民解放军在数量上占有优势，经过长期革命战争的锻炼，有丰富的作战经验和顽强的战斗作风；同朝鲜人民军并肩作战，并有朝鲜人民的支持；东北边防军已做了必要的准备，并调集了二线兵力；苏联政府会给我们提供一些必要的帮助。只要指挥得当和逐步改善武器装备，是可以取得胜利的。

毛泽东认为，如果我们不出兵，整个朝鲜被美国侵占，我国大陆就直接面临着美国侵略的威胁，我国东北地区的电力将被其控制，工业基地将遭到破坏，中国将失去安心进行经济建设的保证；如果朝鲜人民失败了，朝鲜的革命遭到镇压，则是灭了共产主义的士气，长了帝国主义的威风，美国侵略者将会更加猖獗，国际国内反动气焰将会增高，这极为不利。而出兵参战，“对中国、对朝鲜、对东方、对世界都极为有利”。因此，中国人民“应当参战，必须参战，参战利益极大，不参战损害极大”。

政治局在充分分析了困难和有利条件，全面权衡了利弊之后，终于下了决心，毅然做出了“抗美援朝、保家卫国”的重大战略决策，决定组成中国人民志愿军出动到朝鲜境内作战。

中央对志愿军出动后可能会出现的局面也做了充分的估计：第一，志愿军在朝鲜战场上打胜仗，并且可能将美国军队全部驱逐出朝鲜或将其歼灭。如果出现这种局面，当然是最理想的，也是我们努力争取的。

第二，志愿军同美军打成僵局，尽管我们以志愿军名义参战，但美国仍可能对我国宣战，至少以其空军轰炸我国的许多大城市和工业基地，以海军攻击我国的沿海地区。

第三，美国为了减轻其在朝鲜战场上的压力，可能同蒋介石的军队联合起来向我东南沿海发动攻击。

针对这些可能，中央也做了部署和准备。（一）派周恩来总理立即赴苏联同斯大林会谈，请求苏联政府派空军支援志愿军作战，并提供武器装备援助。（二）将仅有的为数很少的航空兵部队和几个高炮团部署在靠近沿海的大中城市，担负防空任务，并由周恩来、彭真、聂荣臻、薄一波、李立三组成防空筹委会，研究计划全国大中城市和工业基地防空问题。（三）有计划地将辽东辽南地区的部分工业基地，向内地做了迁移。（四）在广东和福建方向，各部署 4 个军，防止美蒋联合进犯，并加速华东和中南地区的剿匪和土改工作，以便集中力量对付美蒋可能的进犯。（五）在全国开展轰轰烈烈的抗美援朝运动，动员全国人民支援抗美援朝战争。（六）为志愿军确定了“在稳当可靠的基础上争取一切可能的胜利”的战争指导总方针，并依此确定第一期只打防御战，在平壤、元山铁路线以北，德川、宁远公路以南构筑两到三道防御阵线，歼灭小股敌人，站稳脚跟，待苏联装备到达，完成训

练，我空中和地面均具有优势时，再配合朝鲜人民军举行反攻。这样，对志愿军出国作战和国内防务都做了稳妥部署。

中共中央决定组成中国人民志愿军抗美援朝，这是不得已之举。一年以后，1951年10月23日，毛泽东在全国政协会议上的讲话中指出：“我们不要去侵犯任何国家，我们只是反对帝国主义对于我国的侵略。大家明白，如果不是美国军队占领我国的台湾、侵略朝鲜民主主义人民共和国和打到了我国的东北边疆，中国人民是不会和美国军队作战的。但是既然美国侵略者已经向我们进攻了，我们就不能不举起反侵略的旗帜，这是完全必要的和完全正义的。”

朝鲜战争结束30多年后，美国学者在谈到这个问题时也指出，这是中国不得已的选择。一位学者说：“北京决定参加朝鲜战争是受形势的支配，而不是按计划，”“中国没有进行现代战争的准备，……特别是没有准备同主要依赖空中轰炸和优势火力支援的美军作战，”当美国决定越过三八线，美国强大军事力量出现在中国东北边境的时候，“中国领导人似乎没有别的选择”。另一位学者说：“中国出兵朝鲜，是出于国家利益的考虑，是不得已。如果苏联侵略墨西哥，那么美国在五分钟之内就会决定派军队去的。”

五、彭德怀挂帅出征

在美军大举越过三八线的第二天，10月8日，毛泽东以“中国人民革命军事委员会主席”的名义签署了组成中国人民志愿军的命令。全文如下：

“（一）为了援助朝鲜人民解放战争，反对美帝国主义及其走狗们的进攻，借以保卫朝鲜人民、中国人民及东方各国人民的利益，着将东北边防军改为中国人民志愿军，迅即向朝鲜境内出动，协同朝鲜同志向侵略者作战并争取光荣的胜利。

（二）中国人民志愿军辖十三兵团及所属之三十八军、三十九军、四十军、四十二军及边防炮兵司令部与所属之炮兵一师、二师、八师。上述各部须立即准备完毕，待命出动。

（三）任命彭德怀同志为中国人民志愿军司令员兼政治委员。

（四）中国人民志愿军以东北行政区为总后方基地，所有一切后方供应事宜，以及有关援助朝鲜同志的事务，统由东北军区司令员兼政治委员高岗同志调度指挥并负责保证之。

（五）我中国人民志愿军进入朝鲜境内，必须对朝鲜人民、朝鲜人民军、朝鲜政府、朝鲜劳动党（即共产党）、其他民主党派及朝鲜人民的领袖金日成表示友爱和尊重，严格地遵守军事纪律和政治纪律，这是保证完成军事任务的一个极重要的政治基础。

（六）必须深刻地估计到各种可能遇到和必然会遇到的困难情况，并准备用高度的热情，勇气，细心和刻苦耐劳的精神去克服这些困难。目前总的国际形势和国内形势于我们有利，于侵略者不利。只要同志们坚决勇敢，善于团结当地人民，善于和侵略者作战，最后胜利就是我们的。”

{ewc MVIMAGE,MVIMAGE,!12300160_0027-1.bmp}

毛泽东 1950 年 10 月 8 日修改的关于组成

中国人民志愿军的命令手迹两页

接着毛泽东亲自起草电报，致中国驻朝鲜大使倪志亮转金日成，告知了

上述决定，请金日成派人到沈阳与彭德怀、高岗会商有关中国人民志愿军进入朝鲜境内作战诸问题。

本来，东北边防军是由第四野战军的部队组成的，改为志愿军后，由林彪出任司令员更为合适。但林彪说身体有病，并在中央做出出兵决策后去苏联治疗。毛泽东和中央政治局的常委们就选定了“彭大将军”。

彭德怀，时年 52 岁，身任西北军政委员会主席、西北军区司令员，此时他满脑子装的都是如何建设好祖国大西北的问题。出席中央政治局会议，才知道讨论出兵抗美援朝问题。会议上他坚定地支持了出兵的意见，但是出任志愿军统帅，对他来说实感意外，没有任何精神准备。这位敢于“横刀立马”的彭大将军，服从党的需要从来不讲条件。既然中央常委已定，他彭德怀没有二话，坚决服从中央的决定，肩起了志愿军统帅的重任，来不及交代工作和向亲人告别，就立即投入了志愿军出征的紧张准备工作。10 月 8 日，他同高岗风风火火地飞赴沈阳。从 10 月 8 日到 18 日，他多次往返于北京、沈阳、安东之间，为志愿军的出动而奔忙。

9 日和 16 日，他和高岗先后在沈阳和安东主持召开了志愿军军以上干部会议和师以上干部会议，传达中央的出兵决策，进行战前动员，确定出动部署和作战原则，并强调了出国作战的纪律和政策。其间，会见了金日成派来的朴一禹同志，了解朝鲜战局的具体情况，并视察了志愿军部队。12 日和 18 日，同高岗先后两次应召进京，与毛泽东等中央领导人反复研究了出兵有关问题。

10 月 19 日晚，这位上任仅仅 12 天的志愿军统帅，率领中国人民志愿军部队，肩负着祖国人民的重托，秘密开赴朝鲜战场，开始了中国人民伟大的抗美援朝战争。

此时，除中央任命彭德怀为志愿军司令员外，志愿军的组织指挥机构尚未组成，彭德怀也还没有指挥助手。为便于指挥志愿军作战，10 月 25 日，中共中央决定，将第 13 兵团部改组为志愿军总部，任命邓华为志愿军副司令员兼副政治委员，洪学智、韩先楚为志愿军副司令员，解方为志愿军参谋长，杜平为政治部主任。同时决定，以彭德怀为书记，邓华为副书记，组成志愿军党委，完善了志愿军的组织领导机构。朝鲜还派出朴一禹负责联络工作。

第三章

声威大震

- 麦克阿瑟不可一世，挥兵直向鸭绿江
- 狭路相逢，志愿军初战告捷
- 彭德怀将计就计，示弱诱敌
- 三十八军万岁
- 长津湖边，美第 10 军险遭覆没
- 志愿军声威大震

已经站起来的中国人民是不好惹的，中国人民反抗侵略的决心和力量是不可小视的。中国人民志愿军的将士们，没有辜负祖国人民的殷切希望和重托，一开局就狠狠地教训了美国侵略者，打出了中国人民的志气和中华人民共和国的声威。

一、侵略军无所顾忌遭到迎头痛击

美军越过三八线以后，10月15日，美国总统杜鲁门、参谋长联席会议主席奥马尔·布莱德雷、陆军部长弗兰克·佩斯、太平洋舰队司令阿瑟·雷德福等，专程飞赴太平洋上的威克岛，同麦克阿瑟研究朝鲜战争有关问题，再次探讨中国和苏联出兵的可能性。麦克阿瑟分析认为，如果中国人在朝鲜战争最初一两个月进行干涉，那将具有决定意义，现在时机已过，“我们不再担心他们干涉了”，中国没有现代化的武器装备，没有空军，如果他们的地面部队敢于试图南下平壤，无异于大规模的自杀。因此，中国出兵的“可能性很小”。苏联没有可以派入朝鲜的地面部队，虽然在西伯利亚有空军部队，但没法同美国空军抗衡。如果苏联空军支援中国地面部队作战，他们根本协同不起来，苏联飞机扔在中国军队头上的炸弹将会同落在美国军队头上的一样多，因此，也不必担心。对麦克阿瑟的分析，无论是总统，或是参谋长联席会议主席，以及其他官员，都没有提出疑义，一致表示赞同。

鉴于这种乐观的分析判断，加上朝鲜人民军已难以组织有力的抵抗，麦克阿瑟无所顾忌，加快了向北进攻的速度，指挥部队长驱直入，疯狂向鸭绿江边冒进。

沿东海岸北进的南朝鲜第1军团的两个师，于10月17日进占元山以北兴南、咸兴地区，原计划在元山实施第二次登陆的美第10军的两个师，已船运至元山海域；担任中路进攻的南朝鲜第2军团的3个师进占平壤、元山间的阳德、成川地区；沿开城、沙里院、平壤轴线担任主要进攻的美第1军指挥的美、英军和南朝鲜军共3个师又1个旅，于10月19日攻占平壤。为截断朝鲜人民军从平壤北撤的退路，美军在朝鲜战场上实施了第一次空降作战。20日，麦克阿瑟亲自临空指挥美空降第187团，在平壤以北肃川、顺川空降。美第9军指挥的部队，随美第1军之后也在向北跟进。

美军占领平壤以后，麦克阿瑟认为，朝鲜人民军有组织的抵抗，从此结束，于是更加无所顾忌，放胆全速向中朝边境推进。命令美第10军登陆后，指挥东线美军和南朝鲜军共4个师沿朝鲜东北部海岸和山区向江界、惠山镇和图们江进犯；命令美第8集团军指挥的美、英军和南朝鲜军共6个师1个

旅又1个团，在西线向鸭绿江边的新义州、朔州、昌城、碧潼、楚山、江界地区进犯。企图在感恩节以前，全部占领朝鲜，结束朝鲜战争。

中国人民志愿军在10月19日入朝时，根据中央军委确定的第一个时期只打防御战的方针，预定入朝后，首先在朝鲜半岛蜂腰部以北的龟城、泰川、宁边、球场、德川、宁远、五老里一线，利用有利地形组织防御，阻止敌人进攻，稳定朝鲜战局，尔后创造条件协同朝鲜人民军举行反攻。同时也估计了几种可能：一是在我军到达预定地区之前，敌军即已先期赶到；二是我军刚刚到达预定地区敌军即已到达；三是我军在向预定地区开进过程中，即同敌军遭遇。这三种情况都造成我军在运动中歼敌的机会，因此，要求部队在开进中必须保持战斗姿态前进，随时准备战斗，包围歼灭北进的敌人。

然而，就在志愿军开始向朝鲜境内开进的这一天，麦克阿瑟已经占领了平壤、元山一线，并且继续向北疯狂冒进。10月20日，麦克阿瑟的东线部队已进到五老里和东海岸的洪原地区，达到了我志愿军预定防御的地区；西线部队已占平壤，并进至平壤以北肃川、顺川、新仓里一线地区，距离志愿军预定防御地区只有90—130公里。而此时志愿军过江的只有5个师，距预定防御地区尚有120—270公里。战场形势的变化，使志愿军无论如何也不可能按原计划组织防御了。同时，无论华盛顿的美国军政当局，或是东京的麦克阿瑟的“联合国军”总部，以及朝鲜战场上的“联合国军”部队对志愿军入朝均没有丝毫察觉，并且麦克阿瑟的东西两线进攻部队之间，纵卧着一条狼林山脉，将其部队东西相隔，两线相距80公里，难以相互照应，这对志愿军在运动中歼灭敌人是极好的机会。

10月21日，毛泽东连续致电彭德怀和邓华，指出：“现在是争取战机问题，是在几天之内完成战役部署以便几天之后开始作战的问题，而不是先有一个时期部署防御然后再谈攻击的问题。”“此次是歼灭伪军（指南朝鲜军。下同）三几个师争取出国第一个胜仗，开始转变朝鲜战局的极好机会。如何部署，望彭邓精心计划实施之。”

据此，志愿军放弃预定防御的作战计划，彭德怀决定，集中第38、第39、第40军和第42军的第125师于西线歼灭越过清川江北进之敌，而以第42军主力进至东线长津湖以南地区阻击美第10军部队的北进，保证西线主力作战安全。

为保守志愿军入朝参战的秘密，达成战略战役上的突然性，以保证作战的胜利，中共中央和中央军委采取了许多具体措施，并对志愿军提出了具体要求：第一，毛泽东电告各中央局，“在目前几个月内，只做不说，不将此事在报纸上做任何公开宣传，仅使党内高级领导干部知道此事，以便在工作布置上有所准备，此点请各中央局加以注意”。第二，要求志愿军一律着朝鲜人民军式军服，“各部派遣远出之侦察队均要伪装朝鲜人民军，而不要称为中国人民志愿军，借以迷惑敌人”。第三，要求部队在开进中控制无线电台的使用，夜行昼伏，严密伪装，封锁消息，隐蔽行动和企图，规定每日黄昏开始行动，拂晓隐蔽完毕，行军避开大路，只走小路和山路。第四，为防止过早同敌军接触，便于我军歼敌，要求已过江的部队避开定州、博川、军隅里一线及其以北20公里不走，让敌进至上述地区将其歼灭之。

志愿军按上述要求隐蔽行动，因此，麦克阿瑟没有发现一点蛛丝马迹。彭德怀还做了遭遇战的部署。

10月23日，西线美第8集团军的部队越过清川江，以英军1个旅和美

军 1 个师分向新义州和朔州进犯，以南朝鲜军 4 个师沿宁边至楚山公路和价川至满浦铁路北进。

麦克阿瑟的部队从平壤、元山一线北进以来，仅遇到过朝鲜人民军的几次零星抵抗。在麦克阿瑟看来，似乎在北朝鲜，已没有什么人敢同他的部队较量一下了，剩下的问题，只是迅速进到鸭绿江边庆祝胜利了。于是在越过清川江以后，麦克阿瑟将他的部队以团或营为单位乘卡车分头沿公路大摇大摆地向鸭绿江边开进。他和他的部队无论如何也没有想到，厄运即将临头了。

10 月 25 日，中国人民志愿军在开进中同敌军遭遇，从此拉开了中国人民抗美援朝战争的帷幕。一年以后，这个日子被定为抗美援朝纪念日。

25 日晨，南朝鲜第 1 师先头部队，从云山沿公路北进，遭到志愿军第 40 军第 120 师部队的迎头打击，是日上午 10 时许，志愿军第 40 军第 118 师部队，在北镇以南两水洞地区，同由温井沿公路乘车北进的南朝鲜第 6 师第 2 团先头 1 个营遭遇。南朝鲜军还以为遇到的是人民军零星阻击部队，纷纷下车攻击。然而，他们错了。在弹药未及开箱、火炮未及架设的情况下，即被志愿军第 118 师部队以迅雷不及掩耳之势，采取拦头、截尾、斩腰战术，将其悉数全歼。是日晚，志愿军第 40 军该两师乘胜攻占温井。

彭德怀鉴于敌军以坦克汽车组成支队，以营团为单位到处乱窜，当即指示各部，以军或师为单位分途歼灭敌人，求得在第一个战役中数个战斗歼灭敌一两个师，阻止敌乱窜，以稳定人心。据此，志愿军各部边开进，边分头歼敌。第 50、第 66 军也加入志愿军序列入朝，增强西线歼敌力量。

26 日，南朝鲜第 6 师第 7 团先头营进占鸭绿江边的楚山镇，并向我国境内开炮，团主力于后跟进。这是南朝鲜军到达鸭绿江边唯一的一支部队。为歼灭这股敌军，彭德怀命令第 118 师从温井地区调头北向，第 50 军第 148 师从辑安南进，会歼该敌。由于该敌孤军深入，担心被歼而后撤。29 日晚第 118 师不等第 148 师赶到，即乘敌动摇之际，将其大部歼灭在柳良洞、古场洞地区。28 日晚至 29 日晨第 40 军主力在温井以东龟头洞地区歼灭南朝鲜第 6、第 8 两师前来增援的 4 个营大部。对于志愿军取得的胜利，毛泽东在 10 月 28 日和 30 日致彭德怀和邓华的电报中，两次表示祝贺。

11 月初，号称美军历史最长、战斗力最强的“王牌”部队，美国独立战争时期由华盛顿组建的美骑兵第 1 师（保留骑兵番号的机械化师），也未能逃脱遭受沉重打击的厄运。该师第 8 团于 11 月 1 日进至云山，与南朝鲜第 1 师部队换防。早在 10 月 29 日，即已对云山形成三面包围的志愿军第 39 军，以为被围的南朝鲜军要跑，则立即发起攻击。这是志愿军部队首次同美军作战。尽管美军这个团编有 20 余辆坦克，18 门 105mm 口径榴弹炮，并且还有飞机支援，但是在志愿军第 39 军的强大攻势面前，这个美军“王牌”部队中的团几乎全军覆没。至 11 月 3 日，战斗结束，第 39 军在云山共歼敌 2000 余人，其中美军 1800 余人，击毁和缴获坦克 28 辆、汽车 170 余辆、各种炮 119 门。此战，大大振奋了志愿军部队士气，增长了战胜美军的信心，也使美军这个“王牌”部队感到非常惊愕。

此时，志愿军第 38 军从清川江上游，沿江两岸已迂回到美第 8 集团军的侧后，同时，第 50 军主力和第 66 军在距鸭绿江边十几公里的地方阻住了英第 27 旅和美第 24 师的北进。美第 8 集团军指挥官沃尔顿·沃克，感到形势不妙，乃令所部向清川江以南收缩，至 11 月 5 日，已全部撤至清川江一线及以南地区。志愿军的西线作战结束。

在志愿军主力在西线沉重打击美第 8 集团军的同时，东线志愿军第 42 军两个师苦战 13 昼夜，顽强阻击了美军和南朝鲜军 3 个师的北进，有力地配合了西线主力的作战。

至此，志愿军入朝第一次战役胜利结束，歼灭南朝鲜第 6 师大部，重创美骑兵第 1 师，东西两线共歼敌 1.5 万余人，初步稳定了朝鲜战局。

二、麦克阿瑟高兴得太早了

中国人民志愿军在朝鲜战场上的出现，完全出乎美国侵略当局的预料之外。美国侵略当局，只相信他们是世界的霸主，只相信他们依靠现代化的武器装备可以在世界上称王称霸，不相信有谁敢在“太岁头上动土”，不相信中国人民反抗侵略的决心和力量。对于中国人民志愿军已经参战这一事实，他们始则不信，继而不敢相信或不愿相信，直到“联合国军”遭到志愿军首次战役的严厉打击之后，于 11 月初才确信中国军队参战了。11 月 7 日，我国新华社首次公开报道了中国志愿部队在朝鲜作战的消息。中国人民志愿军的参战，引起了美国白宫和五角大楼不小的震动。

当时的美国国务卿迪安·艾奇逊，后来在回忆录中写到：“所有有关总统的顾问，不论文的还是武的，都知道出了毛病。但是什么毛病，怎样找出来，怎样处理，大家都没有主意。会议的频繁是没有先例的，可见大家感到十分困惑，感到有共同讨论的需要。……我们的困惑集中在两个主要的问题上：中国军事力量在北朝鲜的实际情况究竟是怎样的，以及他们的企图是什么？……麦克阿瑟将军面对眼花缭乱和神出鬼没的军事行动怎么办？”美国参谋长联席会议主席奥马尔·布莱德雷，在他口述的回忆录中也说：“我们既搞不清赤色中国向北朝鲜实际投入了多少部队，也不知道他们可能的军事目标是什么。”一时间，白宫和五角大楼都无所适从。

布莱德雷要求麦克阿瑟对中国军队参战的形势做出估计。麦克阿瑟认为做出确切的权威性的估计，条件还不成熟，还有待于进一步积累军事情报。但同时，他估计了四种可能：一是中国以全部力量毫无顾忌地公开参战；二是出于外交上的需要，仅仅是对北朝鲜尽点义务，隐蔽的、秘密的参战；三是以“志愿军”名义在朝鲜保持一个立足点；四是设想在没有美国和其他外国军队到达中朝边境的情况下，而仅仅是对付南朝鲜军队。他认为第一种可能性虽然存在，但中国军队不敢同美国军队作战，最大的可能是后三种情况的综合，即中国只是象征性的出兵，并且进入朝鲜的中国志愿军只有几万人，最大的建制单位是师级。麦克阿瑟非常乐观地、充满信心地向参谋长联席会议表示，他的部队可以消灭进入朝鲜的中国志愿军，他准备于 11 月 15 日发起进攻，消灭这些部队，并一直打到鸭绿江边。但是他又告知华盛顿当局，中国的大队人马和物资正自满洲通过鸭绿江上的所有桥梁进入朝鲜，这将使他指挥的联合国军陷入困境，甚至有全部被歼灭的危险。因此，他命令远东空军出动全部的 90 架 B—29 型战略轰炸机，轰炸鸭绿江上的所有国际桥梁，以阻止中国军队大批进入朝鲜，为他继续向鸭绿江边推进清除障碍。这一轰炸行动得到了杜鲁门的批准。从 11 月 8 日开始，美国远东空军指挥的几乎所有能执行轰炸任务的飞机，对位于新义州、朔州、楚山、满浦、惠山等鸭绿江上的大桥和这些城镇，进行了毁灭性的轰炸。11 月 8 日轰炸新义州和大桥时，喷洒汽油，投掷炸弹和燃烧弹，使新义州立即成为一片火海，当即炸死

烧死数千居民，炸毁大桥数孔，同时轰炸了新义州对面的中国安宁市。美军轰炸其他桥梁时也都同时轰炸了桥对面的中国城镇。这一轰炸行动至12月5日结束，鸭绿江上的这些大桥大部被炸毁（本书作者去过丹东和长甸河口，那里至今仍残留着当年被美军炸毁的桥梁遗迹）。

11月9日，美国国家安全委员会根据参谋长联席会议的分析认为，中国军队参战的企图有三种可能：第一，只希望建立一个缓冲区以保护在鸭绿江沿岸和长津湖地区的电力设备；第二，同美国打一场长期消耗战，消耗美国的军事力量；第三，把联合国军全部赶出朝鲜半岛。但是第三种可能性极小，因为中国军队如果没有苏联空军和海军的支援，是无力把麦克阿瑟赶出朝鲜半岛的。会议对中国军队参战的企图没有做出确定的分析。鉴于志愿军于11月初脱离了同“联合国军”的接触，他们又认为“中国军队只是出动小部队进行干涉，当他们遭受惨重打击后，也许已经放弃了继续作战的企图”。后来接替麦克阿瑟出任“联合国军”总司令的马修·李奇微，在回忆中说：“少数几个中国‘志愿军’的出现，仅仅被当成了中国在外交棋盘上的又一个小小步骤，不会马上对联合国军总部产生影响。”于是这次安全委员会会议决定：在军事上，麦克阿瑟继续执行占领全朝鲜的计划，发动一次进攻或威力侦察，矛头直指鸭绿江；与此同时，在政治外交上试探，与中国谋求在鸭绿江两岸各10英里的地带，建立一个缓冲区，要求中国军队迅速撤出北朝鲜。

这个决定更加助长了麦克阿瑟的骄狂心理，也铸就了美军在朝鲜战场上的失败。麦克阿瑟本来就没把中国军队放在眼里，对中国军队的出现，非但没有担忧，而且乐观地认为，他的空军轰炸，可以切断中国和朝鲜的联系，中国的后续部队无法继续进入朝鲜，已经进入朝鲜的志愿军也“不能生存下去”。就是中国人真的大规模参战也不在话下，中国军队和北朝鲜军队一样不经打。11月17日，他在同美国驻南朝鲜大使约翰·穆乔谈话时，狂妄地断言：在北朝鲜的志愿军不可能超过3万人，他将发动全线进攻，在10天内完全“扫荡”在北朝鲜的志愿军和他们所占地区，然后把所有的中国战俘押到边界释放，把美第8集团军撤回日本，只留美第10军、联合国其他部队和南朝鲜军队，负责占领朝鲜。这位创造了仁川登陆奇迹的“英雄”，还在喜滋滋地做着再创“英雄奇迹”的美梦。

三、彭德怀将计就计，示弱诱敌

对于麦克阿瑟还要发动进攻，彭德怀在结束第一次战役时就有所预料。他在11月4日致中央军委的电报中指出：“此役胜利，对稳定朝北人心使我军站稳脚，坚持继续作战，是有意义的。因消灭敌人不多，我军实力尚未完全暴露，美伪军还可能重新组织反攻。”如敌再进，则边打边退，让其深入，尔后歼灭之。毛泽东完全同意这个战场统帅的分析和下一步作战的设想，并回电指示：“德川方面甚为重要，我军必须争取在元山、顺川铁路以北区域创造一个战场，在该区域消耗敌人的兵力，把问题摆在元山、平壤的正面，而以德川、球场、宁边以北以西区域为后方，对长期作战方为有利。”同时确定，以宋时轮指挥的第9兵团3个军入朝，全力担负东线长津湖方面的作战，采取诱敌深入方针，寻机各个歼灭敌人。“争取在本月内至十二月初的一个月内东西两线各打一二个仗，共歼敌七八个团，将战线推进至平壤、元

山间铁路线区域，我军就在根本上胜利了”。

据此，彭德怀和他的助手们——邓华、洪学智、韩先楚、解方等，进行了精心研究和部署，确定在我军空军、炮兵、坦克部队尚未得到适当组成前，我军“仍采取运动战、阵地战、游击战相结合，内线和外线相结合的方针”。此次战役采取诱敌深入各个歼敌的部署，将西线进攻之敌诱至温井、宁远一线以北地区消灭之，将东线之敌诱至长津湖地区消灭之。以第一次战役入朝的6个军全部共22万人担负西线歼敌，以第9兵团全部15万余人担负东线歼敌。西线主力后撤休整待机，以逸待劳，只以小部同敌军保持接触，边打边撤，引敌上钩。

麦克阿瑟为了探明志愿军在朝鲜的兵力和意图，从11月6日就开始试探进攻。在西线，先以南朝鲜军两个师，继则增加美军两个师和英军1个旅向北进攻，企图占领西起清川江口、东至宁远一线，做为其发动总攻势的攻击发起线，尔后直指鸭绿江边。在东线，以美军两个师和南朝鲜军1个师继续北进，企图配合西线迂回到鸭绿江边的江界。彭德怀则按计划，命令西线部队主力后撤休整待机，命令第38、第39、第40军各以1个师实施节节抗击，边打边撤，做为诱耳，造成“怯战”的假象，诱敌深入。东线第42军主力奉命于11月7日放弃长津湖以南阵地北撤。西线诱敌的第112师于11月9日，放弃位于清川江边的飞虎山阵地，10日第119、第117师又放弃了清川江以北宁边、博川阵地。

此时，麦克阿瑟的部队虽全线向北推进，但由于有10月底分兵向北冒进遭到打击的教训，行动比较谨慎，前进缓慢。至11月15日，东西两线只前进9—16公里，距志愿军预定歼敌地区较远。为了给麦克阿瑟造成更大的错觉，使他的部队放胆前进，16日，彭德怀指示担负诱敌的各部，从17日起，停止向进攻之敌反击，继续后撤，示弱于敌，将敌诱至我预定地区举全力歼击之。各部遵示，停止了反击，在敌进攻时，稍一抵挡就后撤，以示“怯战”，并故意遗弃一些装备和物资，制造“狼狈撤退”的假象，逐渐与敌军脱离了接触，而“神秘地消失了”。与此同时，为瓦解敌军，扩大志愿军的政治影响，彭德怀报请毛泽东批准，决定释放一批俘虏。利用释放俘虏的机会，向俘虏散布，志愿军武器装备太差，特别是冬寒将至，和粮食弹药供应困难，准备撤回国内去。

志愿军的示弱，果然奏效。就连美国五角大楼的官员也认为，在朝鲜的志愿军没有得到很好的补充，补给的困难和寒冷的天气可能是他们撤退的原因。麦克阿瑟则更加觉得他的判断正确，狂言：中国在朝鲜的军队，绝不是不可侮的势力，志愿军是“怯战败走”了。于是他催促他的部队，加快了北进的速度。11月21日，已到达其进攻开始线，完成了战役展开。这一天，在东线进攻的美第7师第17团1个营攻占了鸭绿江边的惠山镇，向中国境内开枪射击，美第10军军长爱德华·阿尔蒙德将军专程飞往惠山，同他的一群高级军官们庆贺“胜利”，并以中国为背景，照相留影，麦克阿瑟也发来了祝贺的电报。此时，麦克阿瑟在西线进攻的部队共8个师又3个旅，13万余人，统归美第8集团军沃克指挥；在东线进攻的部队共5个师，9万余人，统归美第10军阿尔蒙德指挥。也就是这一天，美国当局批准了麦克阿瑟宣称的圣诞节结束朝鲜战争的“总攻势”。

麦克阿瑟掩饰不住就要“得胜”的内心喜悦，高兴得几乎达到了颠狂的地步。1950年11月的第四个星期四，23日，是美国感恩节。麦克阿瑟让他

的士兵们，在朝鲜饱餐了感恩节的火鸡盛宴。24日，麦克阿瑟下令发动了“总攻势”，并公开向新闻界宣布了他的总攻计划。同一天，他乘飞机从东京专程飞往设在新安州附近的美第8集团军指挥部，然后乘着吉普车，用5个小时的时间，去视察他的前线部队，内心的兴奋溢于言表，喋喋不休地与下属们交谈。接着余兴未消，又乘着他的专机，沿鸭绿江上空飞行炫耀了一番。麦克阿瑟真的相信，他的美梦就要实现了。他万万没有想到，彭德怀已经把他的部队装进了口袋。

四、清川江畔，美第9军损失惨重

“出其不意，攻其无备”，“善守者，藏于九地之下，善攻者，动于九天之上”。彭德怀的守和攻，均大大出乎麦克阿瑟的预料。志愿军按彭德怀的部署将麦克阿瑟的部队诱至预定地区后，西线于25日黄昏，按预定计划突然发起了反击。彭德怀首先以第38、第42两军在第40军一部的配合下，抓住麦克阿瑟西线部队担负右翼进攻的南朝鲜第2军团的第7、第8两师，并专派志愿军副司令员韩先楚具体指挥该两军作战。第38军3个师兵分三路，各以1个师分从德川东西地区迂回插至德川以南，截断了进至德川的南朝鲜第7师的退路，以1个师从正面攻击，经一昼夜激战，将南朝鲜第7师大部歼灭于德川地区。与此同时，第42军以1个师隔断宁远和孟山之间敌军的联系，以1个师迂回到宁远城南，以1个师从正面攻击，至26日拂晓攻占宁远城，歼灭南朝鲜第8师大部。第40军1个师在该两军的右翼牵制了当面美军。

第38、第42两军的胜利出击，打开了战役反击的缺口。接着彭德怀命令在西线反击的其他部队，积极作战，抓住当面之敌歼灭之。同时命令第38军以主力迅速西向位于清川江边价川以南的军隅里攻击前进，以一部取捷径向位于价川、顺川之间的三所里前进，截断进至清川江以北美第9军的南撤退路，和阻击平壤、顺川之敌经此的北援，命令第42军西向顺川、肃川插进，截断在美第9军以西向北进攻的美第1军的南撤退路，以便我正面主力追击和侧击溃逃之敌。志愿军各部得令后，积极行动，第39军并利用俘虏喊话，争取美军1个建制连投降。第38军主力在向军隅里前进途中，击溃从价川急向德川增援的土耳其旅，第42军主力在孟山西南的北仓里歼灭南朝鲜第6师一部，继向西南方向前进。第38军第113师，昼夜兼程，经14小时70余公里的急行军，于28日晨抢占了三所里地区，在发现三所里以西1公里处的龙源里也是一条南北通道时，则派去1个团于当日下午抢先占领，完全截断了美第9军南逃的退路。至此，第66、第39、第40、第38军已从北、东、南三面将美第9军指挥的美第2师、第25师、土耳其旅全部和美骑兵第1师、南朝鲜第1师的各一部，包围于价川附近的清川江南北地区。第50军也攻进至博川以西地区，第42军主力歼灭阻击之敌1个营进至顺川以东新仓里地区。麦克阿瑟在西线整个进攻布势被打乱。志愿军在西起安州、东至价川的清川江南北地区展开了勇猛的围追堵截战。在东线的美第10军两师也同时遭到了厄运。

麦克阿瑟搞不清这么多志愿军部队是从哪来的，好像是神兵从天而降。在志愿军突然猛烈的反击面前，麦克阿瑟懵了、呆了。他的美梦骤然变成了恶梦，已经不是他如何歼灭志愿军打到鸭绿江边的问题了，而是他的部队如何从志愿军的包围中逃脱出去，免遭全军覆没的命运问题了。此时的麦克阿

瑟已完全不是5天以前的模样了，成了霜打的茄子，泄了气的皮球，怎么也乐不起来了。他已从乐观的顶点坠入了沮丧的深渊，从信心百倍，胜利在握，转而惊慌失措，乱了方寸。一方面惊恐地向华盛顿报告，他遇到了全新的敌人，一方面错乱地将沃克和阿尔蒙德两位前线指挥官紧急召到东京商讨对策，决定全线向平壤、元山一线撤退。

要逃走？谈何容易！志愿军第113师已死死地卡住了三所里和龙源里美第9军南撤仅有的两条通道。尽管美军的空军终日轰炸和扫射，美第9军也以上百辆坦克和数十门大炮进行轰击，南面又有美骑兵第1师主力和英第29旅的向北增援，可就是突不破第113师的阻击。而此时的第113师只上来两个步兵团（另外1个团在德川打扫战场），携带的只有步兵轻武器，对付美军的坦克只有地雷、炸药、手榴弹和爆破筒。这同美军的现代化装备形成了鲜明的对照。第113师就是凭着这样的装备和两个团的兵力，必须卡住这两个关口，这是关系到志愿军此次作战能否取得胜利的关键。这支部队是一支具有红军传统的部队，其中的第338团，是由徐海东指挥的红25军的一个建制团演变下来的红军团队，第337团也是以红军连队为骨干在抗日战争中组建起来的。第113师的官兵们，凭着解放军的顽强战斗作风，依托有利地形，南北两面对敌坚守阻击。就这样，美军对这两个关口，从29日至12月1日，南北对攻3天，始终可望而不可及。因此，彭德怀于12月1日亲自起草电报，通令嘉奖第38军（尤其第113师）全体官兵。电报全文如下：

梁（兴初）刘（西元）转三十八军全体同志

此战役克服了上次战役中个别同志某些过多顾虑，发挥了三十八军优良的战斗作风，尤以一一三师行动迅速，先敌占领三所里、龙源里，阻敌南逃北援，敌机、坦克各百余，终日轰炸，反复突围，均未得逞。至昨三十日，战果辉煌，计缴仅坦克、汽车即近千辆。被围之敌尚多，望克服困难，鼓起勇气，继续全歼被围之敌，并注意阻敌北援。特通令嘉奖，并祝你们继续胜利！中国人民志愿军万岁！三十八军万岁！

此电对第38军，特别对第113师是巨大的鼓舞。

于第113师阻击的同时，彭德怀命令正面各军勇猛攻击，为减轻第113师的压力，命令第38军主力迅速向113师靠拢。第38军主力向113师靠拢过程中，在凤鸣里歼灭美第25师1个团大部，在松骨峰地区又歼灭美第2师数百人。第40军在军隅里地区歼灭美第2师1个营，尔后主力西向安州方向攻击，第39军击溃清川江以北之敌后，南渡清川江，同第40军主力在马场里与美军展开激战。第66军也尾第39军之后渡过清川江南进攻击。第50军逼近清川江边。第42军主力被美骑兵第1师部队阻于顺川以东的殷山地区，未能按时插到肃川。

战至12月1日，美第9军遭到惨重伤亡。鉴于从三所里、龙源里地区南突无望，被迫丢弃全部重装备，转而西向安州，尔后南经肃川退向平壤。此时，美第1军已经经安州、肃川退向了平壤。12月2日，清川江畔的激战结束。此战志愿军歼灭美第2师7000余人、美第25师5500余人、土耳其旅2200余人，美第2师被打残，失去了战斗力。美军溃逃

{ewc MVIMAGE,MVIMAGE,!12300160_0049-1.bmp}

彭德怀亲自起草的通令嘉奖第38军全体官兵的电报

时在清川江南北地区的公路上遗弃了大量的装备，据统计，各种炮500余门、坦克100余辆、汽车2000余辆、各种枪5000余支。然而，非常遗憾，志愿

军没有空军掩护、没有高射炮部队，能够驾驶坦克和汽车的人也寥寥无几，这些装备很快即被美军飞机炸毁，公路变成了火龙，志愿军只能望炸兴叹。然而，这只是胜利中的遗憾，这是客观条件无力所及造成的遗憾，志愿军在客观条件所及的范围内已大获全胜，美军遭到了惨重的失败。

五、长津湖边，美第 10 军险遭全军覆没

麦克阿瑟的进攻在西线遭到惨败的同时，在东线，情况同样很糟，甚至比西线更惨。

宋时轮指挥的第 9 兵团，于 11 月中旬开始从吉林省的辑安渡江，隐蔽向长津湖地区开进。直至志愿军在西线已发起攻击，在东线的美第 10 军，仍未发现志愿军第 9 兵团部队已神不知鬼不觉地到了他们的身前、身侧，仍在兵分数路向北前进中。11 月 27 日晚，第 9 兵团第 20、第 27 两军完成了攻击准备，突然发起反击，一夜之间，即将美第 10 军指挥的美陆战第 1 师（也是美军战斗力较强的“王牌”部队之一）师部和两个多团，及美第 7 师 1 个多团，分割包围于长津湖东西两侧及湖南的新兴里、柳潭里、下碣（音“竭”）隅里三个孤立的点上。

朝鲜东北部地区，冬季非常寒冷，最低平均气温达零下 30~40℃。此时长津湖地区普降大雪，气温已降至零下 20~30℃。志愿军第 9 兵团部队，是在中国华东地区生长起来的部队，不适应寒区的气候，没有寒区生活、作战经验。此次入朝参战比较仓促，从山东乘火车北开时，部队穿的是华东地区的冬装，原计划到东北地区整训一个时期，并换发寒区冬装，尔后再入朝作战。但由于战场形势的急速变化，已不容许第 9 兵团在东北地区停留，而直接开赴朝鲜作战，只是火车在沈阳等地短暂停留时，匆匆补充了有限的寒区服装，加之，当时志愿军的跟进保障能力太弱，致使到战斗打响时，官兵多数没有大衣，许多官兵甚至还穿着胶鞋，戴着单帽。就连穿着羽绒服装、配有羽绒睡袋并有空中运输源源补给的美军士兵，在这样的气候下仍冻得瑟瑟发抖，那么缺乏寒区装备的志愿军官兵的状况就更可想而知了。严寒的气候，是志愿军第 9 兵团遇到的第一个巨大威胁。许多官兵手脚被冻僵，面部、耳朵被冻伤，有的步枪被冻得拉不开栓、机枪打不响。第 9 兵团就是在这样的困难条件下，同被围的美第 10 军部队展开了激战。被围美军为免于被歼，则以坦克、装甲车和汽车组成环形防御，以坦克和大炮的火力掩护步兵拼死抵抗，并且空中有飞机支援。志愿军由于攻击火力太弱，加上作战和冻饿减员，各点攻击力量均显薄弱。战至 29 日，仅歼被围之敌 1000 余人。

第 9 兵团为集中优势兵力，逐点歼灭被围之敌，遂调整部署，首先集中第 27 军第 80 师和第 81 师主力共 5 个团，于 30 日晚，对被围于长津湖东侧的美第 7 师第 31 团及第 32 团 1 个营，发起猛烈攻击，战至 12 月 1 日拂晓，将敌压缩于狭小地域。是日中午，该敌在 40 余架飞机掩护下，以 10 余辆坦克为先导，拼命向南突围。志愿军 5 个团立即展开尾追堵击，将其大部歼灭于新兴里及以南新岱里地区，其余残敌逃至后浦、泗水里地区，也被阻击歼灭。此战，志愿军共歼美军 3100 余人，缴获 60MM 迫击炮以上火包及火箭筒 266 门（具），各种枪 2455 支，击毁和缴获坦克 18 辆、汽车 345 辆，创造了一战全歼美军 1 个多团的范例。

新兴里美军被全歼，使美第 10 军的进攻全线动摇，12 月 1 日开始全线

向南撤退，就连美军自称为只有进攻和胜利的陆战第1师，也不得不使用“撤退”这个字眼。

宋时轮立即转兵，向被围于柳潭里的美陆战第1师的两个团发起攻击，展开激战。12月3日，美陆战第1师的两个团，在50余架飞机的支援掩护下，集中数十辆坦克为先导，全力向南突围，在遭到志愿军第20军阻击部队的重大杀伤后，丢弃大量重装备，突破志愿军阻击，同被围在下碣隅里的该师师部和另1个营会合。此后，一面空运伤员，一面继续准备突围。此时第9兵团预备队第26军正在向南开进，尚未赶到战场。当12月6日赶到战场时，下碣隅里的美陆战第1师已突围南逃。毛泽东和彭德怀早有预见，早在第9兵团在东线发起反击之前，就指示宋时轮做了部署。宋时轮据此已将第20军的3个师部署在下碣隅里以南，在美陆战第1师逃跑的必经之路上，设下了数道阻击埋伏线。在美陆战第1师从下碣隅里突围南逃后，又以第26军和第27军紧紧追击。这样，在北起下碣隅里，南至上通里和下通里的数十公里的地段上，对南逃的美陆战第1师展开了层层堵截和步步紧追。在古土里以南，第20军第58师堵住了美陆战第1师的退路，截歼其800余人；在上、下通里以北地区，第20军第89师又截歼美陆战第1师600余人。

美陆战第1师从12月3日开始突围南撤以来，几乎是层层受阻，步步被截。李奇微曾说：“这是一次漫长而曲折的撤退，一路上战斗不断，似乎是在一寸一寸地向后挪动。”美陆战第1师一路苦战，一路惊慌，一路遭受伤亡损失，损失过半，已溃不成军，直至12月12日，赖以坦克、大炮的优势火力，赖以空运的源源补给和空军的支援掩护，其残部才在美第3师的接应下，艰难地突破志愿军最后的阻击，狼狈逃至五老里，幸免于全军覆没的灾难。这是美国这支“王牌”部队有史以来，遭受损失最为严重、逃跑景象最为狼狈的一次败退。几十年后，当时的美军高级官员，回忆起美陆战第1师在长津湖地区险遭全军覆没的境况时，仍觉非常可怕，不寒而栗。

志愿军第9兵团此次长津湖地区的作战，在武器装备严重落后，运输补给严重不足，冻饿交加严重威胁的情况下，发扬人民军队的优良传统，灵活顽强作战，给美陆战第1师和步兵第7师以歼灭性的打击，共歼敌1.3万余人，彻底扭转了东线战场的局面。毛泽东、彭德怀均致电宋时轮给予高度评价。毛泽东在12月17日的电报中指出：“九兵团此次在东线作战，在极困难条件之下，完成了巨大的战略任务。”

六、中国人民声威大震

麦克阿瑟遭志愿军东西两线强大攻势突然猛烈的打击后，由根本没把中国军队放在眼里，转而对中国军队感到非常畏惧。继11月29日，命令他的部队撤至平壤、元山一线后，12月3日又命令他的部队全线向三八线撤退。美第8集团军司令官沃尔顿·沃克，于12月23日也死于慌乱撤退中的车祸。

毛泽东、彭德怀，则令志愿军抓住时机，迅速扩大战果。12月6日志愿军西线部队进占平壤，12日开始向三八线攻进。23日，西线各军逼近三八线，进至涟川、华川一线地区集结。朝鲜人民军一部收复了三八线以南延安半岛和瓮津半岛。在东线，朝鲜人民军一部于12月9日收复元山，截住了美第10军从陆路南撤的退路。志愿军第9兵团继续追击撤退的美第10军部队，12月17日，进占咸兴，24日收复兴南及沿海港口。阿尔蒙德指挥的美军残

部和南朝鲜军，在近 300 艘海军舰船的接应下，从海路狼狈撤往釜山。

至此，志愿军第二次战役以大获全胜而告结束。

这次战役，是志愿军在抗美援朝战争运动战中打得最漂亮的一次战役，也是美军在整个朝鲜战争中遭到打击最严重的一次战役。彭德怀成功地利用了美国当局战略上的判断错误和麦克阿瑟恃强骄傲的心理，将计就计，示弱诱敌，尔后采取迂回包围战术，截断美军退路，实行关门打狗，使麦克阿瑟大上其当。志愿军取得了远远超过预想的胜利，东西两线共歼敌 3.6 万余人，其中美军 2.4 万余人，把美国侵略军从鸭绿江打回到三八线，根本扭转了朝鲜战局，奠定了抗美援朝战争胜利的基础。

志愿军此次战役，打懵了麦克阿瑟，打懵了美国当局，也震动了全世界。中国如此贫穷落后，面临的困难那样多，竟然敢于出动如此大规模的军队同美军较量，志愿军仅仅依靠步兵作战和少量炮兵的支援，竟然打败了武器装备如此精良、陆海空军联合作战的美军，实在不可理解。直至几十年后，美国及其他西方国家的许多人仍觉是个谜。

1950 年 11 月和 12 月，是美国当局最为难过的 60 天，从总统到政府和军队最高层的决策人，都忧心重重，不知所措。布莱德雷在其回忆录中写到：“这 60 天，是我们职业军人生涯经历最严峻的考验的时刻，……朝鲜战争出乎预料地一下子从胜利变成了丢脸的失败——我军历史上最可耻的一次失败。”

志愿军取得了这次战役的胜利，一下子使中国人民声威大震，改变了美国人对中国的看法，改变了西方人对中国的看法，甚至也改变了当时社会主义阵营对中国的看法。站起来的中国人民是不好惹的，中国人民反抗侵略的决心和力量是不可小视的。美国人德鲁·米德尔顿在其所著的《用兵之道》一书中，评论这次战役时说：“无论就军事还是政治而言，中国人都是胜利者。中国军队达到了出奇制胜的目的。……在政治上，这次胜利确定了中国在亚洲大陆上的主要军事强国的地位，因而增强了北京在整个地区的影响。”

与志愿军在战场上取得胜利的同时，中国大使衔特派代表伍修权，率中国代表团，于 11 月 28 日，在联合国安全理事会会议上，发表长篇演说，控诉了美国侵略我国台湾和侵略朝鲜的罪行，要求联合国安理会对美国予以制裁。这是中国人民第一次在国际讲坛上伸张了正义，使不可一世的美国当局处于被告的狼狈境地，是中国人民外交斗争的一个重大胜利。这个胜利同志愿军在战场上的胜利一样，在国际上造成了良好的影响。

第四章

反复较量

- 联合国军成了惊弓之鸟
- 李奇微难挡奔涌而来的溃兵
- 华盛顿左右为难
- 仁川英雄成了替罪羔羊，李奇微走马上任
- 决定战局的第五次战役

美国侵略当局错误估计形势，在中国人民志愿军面前遭到惨败，在全世界丢了脸。但是美国当局并不甘心失败，仍然梦想依靠美军现代化的武器装备，赢得这场战争。这样，中国人民志愿军和朝鲜人民军一起，与美国为首的“联合国军”，在三八线南北地区又进行了长达半年之久的反复较量。

一、“联合国军”成了惊弓之鸟

“联合国军”连续遭到中国人民志愿军两次战役的突然打击，引起了麦克阿瑟的惊慌，也引起了华盛顿当局的极大不安。麦克阿瑟惊恐地向华盛顿报告，他所“面对的是一场崭新的战争”，要么联合国继续增兵，扩大战争，要么联合国军继续败退。而此时，美国已无力向朝鲜增兵。在华盛顿，美国总统杜鲁门和他的军政要员们频繁召开会议，估计朝鲜的形势和研讨对策，然而毫无结果，莫衷一是。

但是有一点非常明确，杜鲁门决定，绝不主动撤出朝鲜，而继续战斗，直至被迫撤出。与此同时，杜鲁门声称，美国正在考虑在朝鲜使用原子弹，以此进行威胁和恫吓。这没有吓倒中朝两国人民，反而引起了美国最亲密的盟友——英国人的恐慌。

英国人最担心的是，美国在朝鲜使用原子弹，将会引起世界大战，美国将主要力量投入朝鲜，将会减少在欧洲的力量投入，从而英国利益和安全受到威胁。于是，英国首相克莱门特·艾德礼，急忙飞往华盛顿，探究美国的虚实，并表明英国的主张：避免在朝鲜问题上引起大战，而应通过谈判使中国人停在三八线以北。美国人表示，同意“设法避免和中国进行大战”，也没有使用原子弹的打算，但是不同意举行谈判，而要继续聚集力量，在朝鲜坚持下去。但为使中国军队停在三八线以北，不再南进，而使美军得到喘息的机会，同时也为了抚慰一下他的盟友，则按英国人的意见，通过联合国和其他渠道放出了和谈空气，玩弄先停火后停战的把戏，以对我国施加压力。

对此，周恩来代表中国政府进行了一针见血的揭露，指出：美国自侵朝以来，一直拒绝撤出其侵朝军队，从来没有结束朝鲜战争的诚意。那么，为什么又赞成在朝鲜立即停战而举行谈判呢？“不难了解，当着美国侵略军登陆仁川港、越过三八线或直逼鸭绿江的时候，他们不会赞成立即停战，也不会愿意举行谈判；只有在美国侵略军失败的今天，他们才赞成立即停战，并在停战后举行谈判。很显然地，昨天反对和平，是为着美国可以继续扩张侵略；今天赞成停战，也是为着美国可以取得喘息的时间，准备再战，至少可以保持现有侵略阵地，准备再进”。“这就是说，停战后一切侵略状态照旧，准备好了再打”。“就地停战——和平谈判——大举进攻”，这就是美国的

真正意图，这是马歇尔曾经在中国使用过的故伎在朝鲜重演。

为粉碎美国的阴谋企图，毛泽东在 12 月中、下旬连续致电彭德怀，指出：“目前美英各国正要求我军停止于三八线以北，以利其整军再战。因此，我军必须越过三八线。如到三八线以北即停止，将给政治上以很大的不利。”

“美英正在利用三八线在人们中存在的旧印象，进行其政治宣传，并企图诱我停战，故我军此时越过三八线再打一仗，然后进行休整是必要的。”“所谓三八线在人们脑子中存在的旧印象，经过这一仗，也就不存在了，……但如果不打这一仗，……则必引起资本主义各国甚多揣测，民主阵线各国亦必有些人不以为然，发生许多议论。如果我军能……于一月上半月打一个胜仗，争取歼灭伪军几个师及美军一部，……则对民主阵线及资本主义各国人民大众影响甚好，对帝国主义则给以新的一击，加重其悲观失败情绪。”

根据毛泽东的指示，彭德怀部署了第三次战役，决定采取“稳进”的方针，集中在西线的志愿军 6 个军，在朝鲜人民军 3 个军团的协同下，突破麦克阿瑟的三八线既设阵地，歼灭布防在西起临津江东岸、东至北汉江西岸的南朝鲜军 2~3 个师。以志愿军副司令员韩先楚指挥第 38、第 39、第 40、第 50 军为右纵队，攻歼当面南朝鲜军第 1、第 6 师；以第 42 军军长吴瑞林、政委周彪指挥第 42、第 66 军为左纵队，攻歼当面南朝鲜军第 2 师主力及第 5 师一部。得手后，两纵队向纵深发展，扩大战果。同时，朝鲜人民军以第 2、第 5 军团在左纵队以东，第 1 军团在右纵队以西配合作战。

这时朝鲜人民军已有 5 个军团陆续完成休整，开始同志愿军并肩作战。为了便于作战的协同和指挥，经毛泽东和金日成商定，于 12 月上旬组成了以彭德怀为司令员兼政治委员，朝鲜人民军前线总指挥金雄为副司令员，内务相、人民军次帅朴一禹为副政治委员的中国人民志愿军和朝鲜人民军联合司令部。

“联合国军”遭志愿军第二次战役的打击后，按麦克阿瑟的命令沿三八线部署了防御，第一线展开南朝鲜军 8 个师和土耳其旅。除被打残的美第 10 军和美第 2 师在后方休整外，美英军主力全部位于汉城周围及汉江南北地区，做为二梯队。“联合国军”惊魂未定，充满了失败情绪，士气不振，整个部署摆出了能守则守，不能守则逃的架势。接替已死的沃克出任美第 8 集团军司令官的是马修·李奇微中将，12 月 26 日上任。李奇微曾是美国西点军校的优秀生，第二次世界大战时会指挥过空降师和 1 个军作战，此次出任前为美国陆军助理参谋长。他一上任，麦克阿瑟就将“联合国军”地面部队全部交他指挥。他发现，他所指挥的部队“是一支张惶失措的军队，对自己，对上级都丧失了信心，不清楚自己究竟在那里干什么，老是盼望着能早日乘船回国”，“完全丧失了信心和斗志”。于是，他不得不使出全身的解数稳定他的部队的情绪。但是彭德怀没有给他时间。1950 年 12 月 31 日黄昏，志愿军和人民军发起了第三次战役。

志愿军和人民军迅速突破了麦克阿瑟的三八线既设阵地，经一夜攻击全部突入纵深，最深达 10 余公里。此时的“联合国军”已成惊弓之鸟，对志愿军闻风丧胆。因此，对志愿军和人民军的攻势，稍作抵挡，就撤退逃跑，并且像决了堤的洪水一般，就连李奇微面对他的部队这种丢盔卸甲的败逃，也无可奈何。他在回忆录中，对这种溃退的景象做了描述：

元旦上午，我驱车由北面出了汉城，结果见到了一幅令人沮丧的景象。朝鲜士兵（指南朝鲜士兵）乘着一辆辆卡车，正川流不息地向南涌去。他们

没秩序，没有武器，没有领导，完全是在全面败退。有些士兵是靠步行或靠各种征用的车辆逃到这里来的。他们只有一个念头——逃得离中国军队愈远愈好。他们扔掉了自己的步枪和手枪，丢弃了所有的火炮、迫击炮、机枪以及数人操作的武器。

{ewc MVIMAGE,MVIMAGE, !12300160_0062-1.bmp}

彭德怀司令员与金日成首相在一起

我知道，要想制止这些连我话都听不懂的吓破了胆的

士兵大规模溃逃，那是枉费心机。但是，我还是得试一下。于

是，我跳下吉普车，站到路当中，高举手臂，示意一辆迎面开

来的卡车停下。开头的几辆没有减速便从我身旁绕了过去。但是不久，我还是拦住了一支载着南朝鲜军官的卡车队，头一辆卡车上的军官没有听懂我的意思，不服从我的示意。不久整个车队又开动了。……

美第 19 步兵团的一个营在其友邻的南朝鲜部队崩溃之后，也被卷入了无秩序的退却。

然而，这些溃逃的部队还算是幸运的。志愿军在突入敌军纵深后，左纵队第 42 军第 124 师截断了南朝鲜第 2 师主力南逃的退路，至 1 月 2 日，会同第 66 军歼灭南朝鲜第 2、第 5 师共 3 个团大部 3200 余人，缴获各种炮 60 余门，各种枪 1500 余支。右纵队割裂了南朝鲜第 1、第 6 师的联系，并截歼和追歼 1000 余人。

李奇微鉴于这种败势，不得不放弃汉城，于 3 日开始向汉江以南撤退。彭德怀当即令志愿军和人民军各部展开追击。第 50 军于 1 月 3 日的追击，截断了英第 29 旅的退路，经奋战全歼该旅步兵 1 个营、坦克 1 个中队，依靠爆破筒和手榴弹近战打坦克，共击毁和缴获英军“百人队长式”重型坦克 31 辆。其余各军和军团也各追歼敌军一部。

彭德怀鉴于物资运输补给困难，追击战果不大，并为了防止追击过远造成敌军可乘之隙和便于尔后作战，乃于 1 月 8 日，停止了追击，结束战役。此战共歼敌 1.9 万余人，将战线推进至三七线附近，粉碎了美国侵略当局玩弄的“停火”阴谋，扩大了中朝两国人民和军队在国际上的影响。

二、华盛顿当局举棋不定

虽然华盛顿当局为了保持其帝国主义盟主的面子，表示绝不主动退出朝鲜，但是也不得不考虑，中国人民志愿军一旦发动新的攻势，是有能力将美国军队赶出朝鲜的。同时，苏联也可能乘机而动，攻占日本本土。对于美国来说，日本的战略地位远远重于朝鲜，而能够用于维持日本安全的部队只有在朝鲜作战的美第 8 集团军。这样，一旦这种威胁出现，麦克阿瑟指挥的“联合国军”只好被迫撤出朝鲜。然而，如何判断形势，麦克阿瑟如何掌握撤出的时机？华盛顿当局很费了一番脑筋。国务卿艾奇逊、国防部长乔治·马歇尔、参谋长联席会议主席布莱德雷等，自 1950 年 12 月中旬以来，就连日探讨磋商，终来寻得最佳计策。至 12 月 29 日，经杜鲁门批准，参谋长联席会议给麦克阿瑟发去了一个模棱两可的电报：

现有的一切估计表明，中共如果打算采取行动，是有能力将联合国军赶出朝鲜的，可能阻止敌人发挥这种能力的方式之一，是使敌人在行动中付出

高昂的代价，迫使他们放弃这一行动；方式之二，是向该区投入大量美军，而这样将危及我们在其他方面担负的义务，其中包括对日本安全承担的义务。要联合国其他成员国为朝鲜提供大批援军也是不现实的。我们认为朝鲜并不是打大仗的地方。而且，我们认为，在全面战争的威胁不断增长的情况下，我们不应将现有的剩余地面部队派往朝鲜，同中共作战。但是，如果不会遭至严重损失的话，在朝鲜某个地区我们能成功地抵抗中共——北朝鲜的进攻，打击中共的军事和政治威信，这对我们的国家利益将具有重大意义。

你的基本任务是为大韩民国提供必要的援助，击退武装进攻，恢复这一地区的国际和平与安全。但鉴于目前的形势，有必要对你的任务加以调整。

事态的发展也许将迫使我们撤出朝鲜。特别是在日本面临的威胁不断加大的情况下，对于我们来说，十分重要的是要提前确定我们最终进行井然有序撤军的适当时机。在我们看来，你倘若被迫退到锦江附近及以东一线的阵地，中共集结大批部队对你们阵地发起进攻，而且显然是有将我们赶出朝鲜的能力，我们就将指示你开始向日本撤退。

要求你对上述情况提出你的看法。这些情况将决定是否撤军，特别是考虑到你的主要任务仍然是保卫日本，而且只有第 8 集团军的部队能用于执行此项任务。

接到你的意见后，我们将明确指示你在何种情况下开始撤军。

麦克阿瑟接到这个电报后，一方面非常沮丧，感到“华盛顿对于应遵循哪一条途径，看来还是举棋不定，态度暧昧。这封电报似乎表明了朝鲜‘取胜的意志，已经丧失’”。另一方面，他非但不愿从朝鲜撤出，而且主张对中共采取大规模报复行动。12 月 30 日，他复电参谋长联席会议，提出：

1. 封锁中国海岸；
2. 以海空军轰炸摧毁中国进行战争的工业能力；
3. 联合国军从台湾国民党的部队中得到援军；
4. 让台湾的国民党军对大陆发动牵制性的进攻，以减轻联合国军在朝鲜的压力。

布莱德雷曾说，麦克阿瑟所以如此主张，是“因为他那神话般的尊严被损害了，赤色中国人愚弄了这位一贯正确的‘军事天才’。……麦克阿瑟要恢复丢掉的面子和军事声誉，唯一能做到的就是彻底击败曾愚弄了他的那些赤色中国的将军们。为此，他这时很想促使我们同赤色中国、也许同苏联进行一场全面战争，挑起第三次世界大战和一场核屠杀”。

当中国人民志愿军和朝鲜人民军发起第三次战役，将“联合国军”打到三七线附近时，美国当局对中朝军队的攻势更加感到畏惧，他们把心都提到了嗓子眼上，李奇微平均后撤 60 英里，美军在“汉城这个重要的政治基地……连同仁川补给基地”全部丢失。李奇微还能经受得住中国军队的再一次进攻吗？华盛顿当局感到“心中无数”。于是，1951 年 1 月 9 日，美国参谋长联席会议正式拒绝了麦克阿瑟的报复主张，再次指示麦克阿瑟：“组织梯次阵地实施防御，在优先考虑你部队的安全和保卫日本的基本任务的情况下，最大限度地杀伤在朝鲜的敌军。一旦你判明必须撤退才能避免人员和物资的严重损失时，就从朝鲜撤往日本。”1 月 12 日，杜鲁门在给麦克阿瑟的信中，也表明了矛盾的心理状态，一方面让他坚持在朝鲜作战，另一方面又让他保证第 8 集团军的安全以用于保卫日本。究竟何去何从？杜鲁门同样心中无数。为了掌握朝鲜战场的第一手材料，杜鲁门批准派陆军参谋长劳顿·柯林

斯和空军参谋长霍伊特·范登堡前往朝鲜。

三、横城大捷和掩护后续兵团开进集结

中国人民志愿军在入朝不到3个月内，连续进行了三次战役未得休整，于是，在第三次战役结束后，除留少数部队在第一线监视敌军担负警戒外，主力集结于汉城、横城一线以北地区转入休整，着手进行春季攻势的准备，计划3月中旬以后，同朝鲜人民军一起发动春季攻势。

此时，虽华盛顿当局在举棋不定，但李奇微在战场上对他的部队进行了整顿，撤换了美军7个师中的5个师长，消除部队中的失败情绪。他早在一上任时就表示，一旦集结好部队，就转入进攻。从1951年1月15日开始，他就进行试探进攻，以探明中朝军队的实力和部署。他还坐飞机飞到中朝军队上空亲自进行侦察。李奇微认为，志愿军的后勤补给困难，每次只能维持一个礼拜的攻势，越过三八线以后，运输线延长，补给更加困难，已不可能进行有效的作战。李奇微经过试探进攻和空中侦察，判断志愿军和人民军第一线兵力不足，短时间之内不会发动进攻，因此，他认为，美军在朝鲜还可以坚持下去。于是，经过准备，遂于1月25日开始，集中他指挥的“联合国军”所有地面部队，在空军支援配合下，全线发起了进攻。这次进攻部署上，与上次三八线防守截然不同，以美军和南朝鲜军混合配备，加大了兵力密度和加深了纵深配置，由美军担任主攻，美军重点在西线，南朝鲜军重点在东线。

杜鲁门派来的特使柯林斯和范登堡将李奇微的判断和行动向华盛顿作了报告，使白宫和五角大楼自去年11月以来，第一次有了如释重负之感，虽然认为面前还有艰难岁月，但却不再为撤出朝鲜问题而伤脑筋了。与此同时，白宫和五角大楼已不再信任麦克阿瑟，而越过他直接给李奇微下达指示了。

志愿军在休整时，已充分估计到了美国是不会甘心在战场上的失败的，不再经过几次激烈的大规模的战役打击，美军是不会退出朝鲜的，他们甚至会破坏我们的休整和春季攻势的准备。但是对美军如此迅速转入大规模反扑，则缺乏足够的估计。彭德怀在判明李奇微的企图后，立即命令各部停止休整，进行作战准备。

此时，志愿军前线各军，兵员没有得到任何补充，物资补给的困难状况没有得到任何改善，第9兵团因在第二次战役中冻伤减员较大，尚在咸兴、元山地区休整，暂时不能投入作战，第一线总兵力同李奇微的地面部队相比已不占优势。作为后续部队的第19兵团，在国内还未完成入朝作战准备，一时不能开到前线。因此，前线各军面临着巨大的困难。彭德怀经同金日成首相会商，确定了“力争停止敌人前进，稳步打开战局，并从各方面加紧准备，仍作长期打算的方针”。

彭德怀据此方针部署了第四次战役。针对李奇微的部署特点，彭德怀决定，以韩先楚副司令员指挥第38、第50军和人民军第1军团，在西线汉城东西地区的汉江两岸，坚决阻击李奇微的进攻，牵制美军主力，掩护志愿军主力在东线集结寻机歼敌。以邓华副司令员指挥第39、第40、第42、第66共4个军，向东线横城以北以西地区集结，寻机歼敌。以中朝联合司令部副司令员、人民军前线总指挥金雄，指挥人民军第2、第3、第5军团，向横城以东以南迂回，断敌退路，配合邓华指挥的志愿军作战。以志愿军第9兵团

的第26军南开至汉城以北的议政府地区作为预备队。

此次，李奇微在西线共部署美军主力4个师，英军全部两个旅、土耳其旅和南朝鲜军两个师。李奇微也改变了以往沃克主要沿公路发动进攻的战术，而抢占山头，夺取制高点，密切靠拢，齐头并进，在飞机、坦克和大炮强大火力的支援下，对志愿军和人民军防守的各要点实施了猛烈的火力攻击，所谓“火海战术”。

韩先楚指挥的各部，在兵力单薄、粮食弹药未及补充的情况下，依托野战工事，展开了顽强阻击。尤其第50军和第38军第112师，在第38军主力和人民军第1军团尚未赶到汉江南岸以前，即顽强坚守数天。美军虽有空军和强大的地面火力，但每前进一步都要付出重大的伤亡代价。志愿军和人民军的坚强阻击，始终保持了汉江南岸的基本阵地，有力地掩护了东线主攻集团的开进集结。

东线邓华指挥的各部完成集结后，就出现了战机。2月11日黄昏，以第42军两个师和第39军第117师在西，第40军在北，第66军在东北，向进至横城西北地区、态势突出的南朝鲜第8师发起了攻击。当夜即对敌军形成了包围。第117师由西向东，迅速横插，截断了南朝鲜第8师的退路；第42军的第125师在第117师南面展开，阻击横城以南美军的增援，并歼灭从横城出逃之敌一部；第42军第124师和第40军第118、第120师从西和北三路插进，将南朝鲜第8师各部间的相互联系完全切断，分割成数块；第66军从东北方向南进，歼敌一部。人民军第3、第5军团也在横城以东和东南阻击了南朝鲜第3、第5师的北进增援。南朝鲜第8师已完全陷于四面楚歌的重围之中。

12日至13日晨，志愿军各部对分割包围之敌，纷纷展开攻歼。战至13日晨，将被围的南朝鲜军第8师的3个团悉数歼灭，击毙该师第10团上校团长，并歼美第2师1个营和4个炮兵营，共歼敌1.2万余人。此战，是志愿军在连续进行三次战役后，未得休整和补充的困难情况下，获得的又一个大捷。

为扩大战果，击破敌人进攻，邓华根据彭德怀的指示，转移兵力攻歼位于横城以西砥平里小镇孤立突出的美第2师第23团，并以两个军兵力会同金雄指挥的人民军，前出原州及以东平昌一线，阻敌西援并扩张战果。13日晚，各部开始行动，以6个师前出，并以6个团包围了砥平里之敌。

此时，砥平里之敌为美第23团全部，另指挥法国营和1个炮营、1个坦克中队，总兵力6000余人，火力较强，并且预有防御准备。而志愿军6个团，因连续作战减员未得补充，仅有10000余人，兵力优势不大，并且只有3个炮兵连支援作战，每门炮又只有20~30发炮弹，攻击火力太弱，加之部队建制多，协同困难，致经过13、14两个夜晚的攻击，虽予美第23团等部以重大杀伤，重伤其团长，并曾攻入镇内，但未能将其全歼。15日，美骑兵第1师第5团前来增援。志愿军打援部队歼灭真步兵，但有20余辆坦克突破志愿军阻击，进入砥平里同美第23团等部会合，这更增加了志愿军攻击的困难。此时，李奇微知道志愿军后续兵团来到，攻击没有后劲，因此，他部署了纵深防御，并准备继续进攻。志愿军即使攻克砥平里，李奇微也不会后撤。

彭德怀鉴于这种战场态势，为了避免同李奇微拼消耗，争取主动，遂果断决定撤出对砥平里的攻击，而全线转入运动防御。

在志愿军发起第四次战役后，毛泽东和周恩来鉴于朝鲜战场上美军依靠

其优势的武器装备，遭到志愿军攻击时撤退快，而志愿军停止攻击后其反扑也快，不容许志愿军进行较长时间的战场休整的情况，为了保持作战的优势力量，解决作战与休整的矛盾，于2月上旬，确定志愿军在朝鲜采取轮番作战的方针，以第二番作战部队于2月中旬开始入朝，4月中旬接替第一线作战。同时还计划了第三番作战部队。

为掩护第二番部队入朝参战，彭德怀决定第一线部队以空间换取时间，争取在三八线以南组织两个月左右的防御，掩护第二番作战部队到三八线地区完成集结，发起第五次战役。于是从2月17日起，至4月21日，志愿军和人民军在南起汉城、横城东西一线，北至三八线，部署三道防线，每道防线纵深20~30公里。为有力抗击敌军进攻，减少自己伤亡，彭德怀要求各部，采取“兵力前轻后重，火力前重后轻”的部署原则，依托有利地形实行节节抗击的运动防御，并结合反击消耗迟滞敌军。第一道防线部署志愿军4个军和人民军4个军团，坚持防御25天；第二道防线部署志愿军3个军和人民军1个师，坚持防御20天；尔后全部转移至三八线南北地区，再坚持防御20天左右。志愿军和人民军完全实现了在三八线以南争取两个月左右时间的计划，圆满地完成了掩护第二番部队开进集结的任务，并大量歼灭了敌军。至4月21日，第四次战役结束，共歼敌7.8万余人，其中运动防御期间歼敌5.5万余人。

四、麦克阿瑟成了替罪羊

当1950年7~8月间，麦克阿瑟在计划仁川登陆的冒险行动时，因为仁川的潮汐和地形对登陆不利，遭到美国参谋长联席会议的所有参谋长们以及几乎是所有海军高级官员们的反对。虽然，麦克阿瑟的雄辩才能，曾打动了这些官员，但是参谋长联席会议一直疑虑重重，直到杜鲁门批准了这个名为“烙铁行动”的仁川登陆计划之后，参谋长们的疑虑仍然未消。

然而，麦克阿瑟的仁川登陆行动却神奇般地成功了。美国白宫和五角大楼的官员们说他创造了“辉煌”的“军事奇迹”，是“当之无愧的军事天才”，是美国的“大国宝”。麦克阿瑟在美国、在西方的声誉，达到了他几十年军事生涯的顶峰。由此，参谋长联席会议的参谋长们，也自愧：对麦克阿瑟仁川登陆计划“持怀疑态度，简直像一群胆小怕事的娇小姐”。

就是这样一个“大国宝”，这样一个“当之无愧的军事天才”，在几个月之后却威信扫地，跌入了他几十年军事生涯的低谷。1951年4月11日，美国总统杜鲁门竟然“深感遗憾”地解除了这位美国“伟大司令官”的远东总司令、“联合国军”总司令的职务，而任命李奇微接替他的上述一切职务。同时任命詹姆斯·范佛里特接替李奇微的第8集团军司令官职务。

对麦克阿瑟被解除职务的原因，美国官方的解释是，这位司令官在亚洲和朝鲜的政策问题上，同华盛顿决策当局之间存在分歧，并且发展为公开的对抗，侵犯了总统的权力。杜鲁门解除他职务的直接原因，是他在1951年3月24日，不经批准擅自发表了与美国政府的考虑相抵触的、企图继续扩大朝鲜战争的政策性声明。然而，美国的一些学者对这种解释怀有疑问，事隔几十年之后，仍认为麦克阿瑟被解除职务的真正原因还是一个“谜”。

美国学者们的怀疑是有道理的，尽管他们没有说出究竟是什么原因。其实，麦克阿瑟被解除职务的根本原因，是美国在朝鲜战争中的失败。

麦克阿瑟同美国决策当局之间在亚洲政策问题上确有分歧，但并非始于朝鲜战争，而在第二次世界大战期间就是如此。他对美国欧洲第一、亚洲第二的政策不以为然，而主张亚洲第一；麦克阿瑟在他的上司看来，确实是一个自恃狂做、桀骜不驯的家伙，对他的上司，甚至总统表示不恭。对此，参谋长联席会议和杜鲁门一直很恼火，甚至有人说，杜鲁门早在两年前就应解除麦克阿瑟的职务。事实上，两年中杜鲁门非但没有解除他的职务，而在朝鲜战争爆发后，美国侵朝时，杜鲁门还居然任命他为统帅侵朝“联合国军”的总司令。

在麦克阿瑟仁川冒险取得成功，“创造”了“军事奇迹”的时候，麦克阿瑟昏昏然了，华盛顿当局同样昏昏然了。当时，美国国务院和军方官员诸如艾奇逊、马歇尔、布莱德雷等，都极力主张，麦克阿瑟不受三八线的限制，越过三八线，武装占领整个朝鲜。这种主张占了上风，并得到了杜鲁门的批准，于是才有1950年9月27日参谋长联席会议给麦克阿瑟越过三八线北进的指令；于是才有同年10月15日，杜鲁门、布莱德雷等在威克岛与麦克阿瑟分析中国出兵可能性时，完全赞同麦克阿瑟的错误分析和判断；于是才有麦克阿瑟遭到志愿军第一次战役的打击以后，1950年11月9日，美国国家安全委员会批准麦克阿瑟发动直指鸭绿江边的圣诞节结束朝鲜战争总攻势的错误决策。这一系列的错误造成了美国在朝鲜战争中“一下子从胜利变成了丢脸的失败”，美军“历史上最可耻的一次失败”。

这一失败，使美国这个自由世界的“领袖”在全世界丢了脸。美国当局为了摆脱这种难堪的窘境，则尽量同那些错误决策摆脱干系，而麦克阿瑟对于这一失败有不可推卸的直接责任。于是，麦克阿瑟便成了美国在朝鲜战争中失败的替罪羔羊。李奇微接替已死的沃克出任美第8集团军司令官后，使美国在朝鲜战场上的不利局面出现转机，这使华盛顿当局发现了接替麦克阿瑟职务的合适人选。麦克阿瑟于1951年3月24日不经批准公开发表与华盛顿当局意图相抵触的政策性声明，使华盛顿当局有了公开解释解除麦克阿瑟职务的极好理由。

尽管美国官方在解释麦克阿瑟被解除职务的原因时，闪烁其词，尽量避免将其同朝鲜战争的失败联系起来。但也能从其中嗅出一些味道。布莱德雷在其口述的回忆录中公开讲过，从1951年1月中旬，李奇微发动试探进攻，使美国在朝鲜的不利局面发生转机起，“我们就撇开麦克阿瑟，从李奇微那里得到可靠的军事估价和启发性的意见。尽管我们把参谋长联席会议的电报和指示发给麦克阿瑟，但给人的感觉是，麦克阿瑟已‘明升暗降’了，成了董事会主席式的人物。在军事行动上，他成了一个我们不得不敷衍一下的象征性的司令官”。艾奇逊更是不加掩饰地把美国军队越过三八线北进的责任全部推到麦克阿瑟身上。他在1951年5月至6月，美国参议院军事和外交两个委员会举行的关于美国对朝政策的调查会上，和在他后来写的回忆录中都说：联合国军司令部的战争目的（指恢复三八线以南的和平）和联合国的长远的政治目的（指建立统一的、独立的、民主的朝鲜）二者之间的区别，本来是很明确的。“但是，在1950年10月到1951年4月这段时间里，却被麦克阿瑟这位将军的能言善辩搞得含混不清了；当时，这位将军置杜鲁门总统的命令于不顾，一再发表言论和采取行动”。

麦克阿瑟被罢免，这是中国人民志愿军抗美援朝战争胜利的一个结果，美国当局已经认识到，无论如何再也难以打到鸭绿江边，把向鸭绿江边推进

的责任全部推到麦克阿瑟的身上，为美国下一步不得不调整朝鲜战争政策准备了一个台阶。

五、最大的一次战役

1951年3月底，三八线的问题又摆在了华盛顿当局面前，需要对“联合国军”在朝鲜的行动目标做出明确的决定。美国国务院和五角大楼之间，陷入了无休止的辩论，国务卿艾奇逊要求军方提出军事力量所能达到的政治目标，而军方要求国务院首先做出政治决定，尔后才能确定军事行动方案。此时，英、法等国参加“联合国军”侵朝行动的国家，已经不愿继续拴在美国这架战车上，旷日持久地陷在朝鲜，认为，此时是结束朝鲜战争的“心理时机”，主张通过谈判谋求在三八线建立“事实上的停火”。美国决策当局也认识到，仅靠“联合国军”现有部队，无论如何也无法实现武力统一朝鲜的目标，而美国自身已没有机动部队可再调往朝鲜战场，希望那些参加“联合国军”行动、并已厌倦了朝鲜战争的国家再增派部队也是痴心妄想。鉴于此，美国军方的立场是，在政府和联合国做出新的决策之前，联合国军的行动不受三八线的限制，并且认为三八线没有能建立有效防线的天然地形，决定李奇微继续向三八线以北推进。而麦克阿瑟甚至还想打到底，甚至不惜把战争扩大到朝鲜以外。

据外电报道，在美国决策者当局的圈子里，将确定一个折衷的方案，既不在三八线停止，也不打到底。那么“联合国军”的行动目标就只能是平壤、元山一线的朝鲜蜂腰部，在那里建立坚固的战线，等待政治解决。这个方案的大体计划是：（一）继续在三八线以北进行战争；（二）建立平壤、元山战线，参谋长联席会议认为“联合国军”有力量打到这条线并可进行防守；（三）发表一项新的声明，宣布不越过这条线；（四）试图与中国人获至协议，在这条线和中国边界之间建立中立地带。

麦克阿瑟后来在他的回忆录中写到：自1951年2月开始，我就拟制了消灭中国军队的长远计划，在我收复汉城以后，“我将用大量的空袭清除北朝鲜整个北部的敌军后方。……在敌人所有的主要补给线上敷设一片放射性废料——原子制品的副产品，……切断朝鲜与满洲的联系……。如果我获准使用国民党中国军队，……同时美国的增援部队也将开到，我将在北朝鲜北端东西两岸同时进行两栖登陆和空降登陆，从而就扣紧了一张巨大的罗网。……这景象有点像仁川，但规模要大得多了”。

对于麦克阿瑟的计划，当时中国军队并不知道，但自2月起，驻日美军就在日本举行大规模的陆海空军联合登陆作战演习，南朝鲜至少有两个师在日本整训；3月底起，美国又将转为现役的两个国民警卫师调往日本；3月中旬和4月初，李奇微和麦克阿瑟先后视察了春川地区和襄阳地区；3月底4月初李奇微指挥的“联合国军”部队再次向北越过了三八线，正企图向他确定的目标线——“堪萨斯线”（位于三八线以北，大体与三八线平行，西起临津江，东至东海岸的襄阳一线）推进，尔后再向北推进20英里，到达“怀俄明线”。这些情况表明，“联合国军”似有以正面进攻同侧后登陆相配合，在朝鲜蜂腰部平壤、元山一线建立新防线的企图。

此时，毛泽东为志愿军确定了“战争准备长期，尽量争取短期”的方针，志愿军第二番作战部队已全部入朝，并且大部到达三八线以北完成了集结。

鉴于此，彭德怀于4月初召开了志愿军党委会议，研究部署了第五次战役。为粉碎敌人建立新防线的企图，确定在敌军有可能登陆以前，于4月下旬或5月上旬发起反击，以志愿军11个军在人民军3个军团配合下，歼灭战线中西部的敌人几个师，夺回战场主动权。以宋时轮指挥的第9兵团第20、第26、第27军和杨得志、李志民指挥的第19兵团第63、第64、第65军分从东西两翼突破，歼灭当面之敌，尔后向心合拢，同由正面突击的王近山指挥的第3兵团第12、第15、第60军会歼美第24、第25师；以第19兵团1个军向汉城以北议政府迂回，截断敌军退路；以第40军在第9兵团左翼向纵深穿插，割裂敌军的联系，第39军在第40军以东牵制当面美军阻其西援，保证3个兵团主力完成会歼任务。第39、第40两军归宋时轮指挥。志愿军党委把这次战役看成是夺取主动权与否和战争时间是缩短还是延长的关键，要求各部队从各方面认真准备，尤其强调后勤准备，尽量争取缩短战争时间。4月21日，第二番作战部队基本完成作战准备，第一番作战部队遂结束第四次战役。紧接着，第二番部队于22日晚即发起了第五次战役。

此次战役，是敌我双方投入兵力最大的一次战役。李奇微在前线共16个师3个旅又1个团，兵力34万人，有空军支援，武器装备占有巨大的优势。彭德怀在第一线集中了志愿军11个军3个炮师和1个高炮师，兵力58万余人，连同人民军3个军团，共为68万余人，攻击火力和防空力量较前四次战役均有所加强，兵力以2：1占有优势，但仍没有空军支援作战，武器装备仍处于悬殊劣势的状态。

战役发起后，志愿军第40军迅猛穿插，沿途击破敌军6次阻击，按要求到达指定位置，圆满完成了割裂敌军的任务，第39军也有力地牵制了当面美军。第9兵团突破后发展较为顺利，包围数股敌军营团部队。第19兵团突破后，其第63军发展较好，在第65军1个师的配合下全歼当面英第29旅1个营，并大部歼灭另1个营。第3兵团突破后，也向前发展，歼灭敌军一部。担任迂回任务的第64军，突破后受阻，未完成迂回切断敌军后路的任务。整个战线形成了平推。敌军地面部队在其空军掩护下，以坦克断后，迅速后撤。战至29日，第一阶段作战结束，虽未歼灭敌军师团建制部队，但歼敌2.3万余人，将李奇微的部队从三八线击退至汉城东西一线地区防守。

此时，李奇微的东部战线突出，并且主要是南朝鲜军防守，为志愿军提供了歼击的机会。彭德怀抓住这一有利战机，决定转兵东向，歼灭南朝鲜军几个师。为了迷惑李奇微，达到出其不意之效，彭德怀瞒天过海、声西击东，以杨得志、李志民的第19兵团3个军和人民军第1军团，在汉城以北向汉城和汉城东西地区积极佯动，攻歼敌军营以下规模的部队，造成我军欲攻打汉城的假象，牵制当面的美军；以第39军进至春川以南活动，掩护第3、第9兵团主力隐蔽东移。

彭德怀的声西击东奏效了，第19兵团的佯动，迷惑了李奇微。李奇微判断彭德怀真的要攻打汉城。第39军也圆满完成了掩护任务。5月16日，宋时轮指挥所属第20、第27军和第3兵团第12军，与金雄指挥的人民军3个军团，出其不意，突然在东线发起了攻击。志愿军和人民军采取多路突破、多层迂回包围的战法，截断敌军退路。志愿军和人民军密切协同，勇猛作战，将南朝鲜军4个师的建制打乱。战至21日，第二阶段作战结束，歼南朝鲜军第3、第5、第7、第9共4个师大部。据韩国国防部编写的《韩国战争史》记载：在志愿军和人民军发起攻击后，南朝鲜军一片混乱，没有建制、没有

指挥、没有秩序。5月16日，其第3、第9两师共有2.3万余人，至20日，仅剩8200余人，第3师损失66%，第9师损失60%，并且丢弃了几乎所有重武器和车辆；第7师12400人，损失数千人，另损失各种枪3300余支，各种炮和火箭筒85门（具），榴弹发射器269具；其第5师也遭受了重大伤亡。由于南朝鲜军这次惨败，李奇微撤销了南朝鲜第3军团的建制，解除了南朝鲜第3师师长的职务。

志愿军和人民军整个这一阶段的作战又歼灭敌军2.3万余人。

至此，志愿军和人民军在一个月內，连打两个胜仗，已甚为疲劳，加之运输补给困难，彭德怀遂决定收兵休整。令各兵团留1个师或1个军就地展开，掩护主力转移休整。

然而，在我军主力刚刚撤出第一线转移，李奇微立即采取“磁性战术”，由西而东全线向我展开了反扑，以坦克、炮兵和摩托化步兵组成数支特遣队，向我军纵深猛插，并空降营连规模的兵力抢占我后方要点，阻止我军主力北移。这曾造成我军一度被动，并有1个师遭受了严重的损失。

彭德怀鉴于此，命令主力停止转移，全线展开阻击。志愿军各部在粮食、弹药将尽，供应十分困难和连续作战疲劳的情况下，顽强奋战，至6月10日，将李奇微的地面部队阻止于三八线南北地区，又歼敌军3.6万余人。至此，第五次战役结束。

此次战役，虽我军在转移时对敌军反扑估计不足曾一度被动，但整个战役仍取得了重大胜利，共歼敌8.2万余人，击毁和缴获敌军坦克170余辆，这些都是入朝以来各次战役中最多的。这次战役是继第二次战役之后，对美军的又一次重大打击，而且更重要的是经过这次战役的较量，粉碎了美国在平壤——元山一线建立新防线的企图，迫使美国当局不得不调整朝鲜战争政策，被迫谋求和谈。

第五章

唇枪舌剑

- 美国人谋求和谈
- 中共中央决定边打边谈
- 骄横的美国谈判代表
- 时打时谈的谈判
- 关于战俘问题的激烈斗争

美国人尽管有现代化的武器装备，但是正如毛泽东所说的：“敌人大炮比我们多，但士气低，是铁多气少。”美国在战场上打不下去了，不得不谋求和谈。然而，在谈判中又毫无诚意，蛮横无理，企图在谈判桌上得到其在战场上所没有得到的东西，并以强大的军事压力相威胁，但遭到了志愿军和人民军的有力反击。

一、美国被迫谋求和谈

美国侵朝以来，将其现役部队中陆军 1/3、海军近半数和空军 1/5 的作战力量投入了朝鲜战争，不但没打赢，而且遭到了惨重的失败。经过几个月的较量，美国已经看到，中国人民志愿军具有巨大的兵力优势，有源源不断的兵员补充，美国尽管武器装备很强，但依靠在朝鲜的现有兵力，无论如何也不可能取得胜利了，并且每向北前进一步都要付出重大的伤亡代价。若单纯以军事手段解决朝鲜问题，则必须增加兵力，并且有冒引起世界大战的风险。而美国尚没有准备好打世界大战的力量，也再无机动力量可调往朝鲜。那么只好求助于盟国。美国曾设想，土耳其、希腊、英国、菲律宾、阿根廷、巴西、墨西哥、澳大利亚和新西兰都应提供师级规模的兵力到朝鲜。然而，这些国家有的根本未派部队，派部队的也只是象征性的，多数只派出 1 个营或不到 1 个营，美国最亲密的盟友英国派的最多，也只两个旅。此外，加拿大、土耳其各派 1 个旅。这些国家已清楚地看到，美国在朝鲜没有胜利的希望。因此，当美国向他们寻求军事增援时，均遭到了拒绝。这些表明，美国在朝鲜寻求彻底军事胜利的希望，已是“无可奈何花落去”了。

美国在朝鲜这种力量投入的本身，就同其以欧洲为重点，以苏联为主要敌人的全球战略严重矛盾。苏联并没有介入这场战争，美国在朝鲜主要是同中国军队而不是苏联军队作战，这样，对美国来说，在朝鲜浪费军事力量是极为不利的。美国不能为了南朝鲜而不顾欧洲利益，更不能为了打败中国军队而不是苏联军队在朝鲜孤注一掷，久拖不决。杜鲁门曾经说过：“我从来没有使自己忘记：美国的主要敌人正端坐在克里姆林宫里；或者忘记：只要这一敌人还没有卷入战场，而只在幕后拉线，我就绝不能将我们再度动员起来的力量浪费掉。”布莱德雷也说过一段“著名”的话：如果我们在朝鲜继续扩大战争，甚至扩大到中国，那“将使我们在错误的地方，错误的时间，同错误的敌人打一场错误的战争”。

于是杜鲁门在解除了麦克阿瑟的职务以后，在“联合国军”遭到志愿军和人民军第五次战役的沉重打击以后，于 5 月上半月召开国家安全委员会会议，检讨了美国的朝战政策，认为单纯依靠军事手段已无法解决朝鲜问题。

因此，确定，在朝鲜问题上，将政治目标（建立统一、独立、民主的朝鲜）同军事目标（击退进攻，恢复三八线以南和平，并通过谈判结束敌对行动）区别开来。一方面进行一定规模的军事行动，建立一条有利的防线；另一方面谋求通过政治谈判达成一个解决朝鲜问题的方案，以求得“体面停战”。

根据美国国家安全委员会的这个决定，一方面李奇微在战场上转入了战略防御，不实施大规模的进攻行动，而力求通过强有力的巡逻和局部进攻来保持主动。另一方面，美国在外交上积极活动，谋求和谈，千方百计想同中国人进行政治接触。5月31日，艾奇逊派国务院顾问、曾任美国驻苏联大使的乔治·凯南，以私人身份单独会见苏联驻联合国代表雅克夫·马拉克。凯南拐弯抹角地表示了美国在朝鲜谋求谈判的愿望。凯南表示：“美国准备在联合国任何一个委员会，或是以其他任何方式与中国共产党人会面，讨论结束朝鲜战争问题。”美国人还通过其他方式表示了愿沿三八线实现停火的愿望。

二、中共中央决定边打边谈

中国人民志愿军自1950年10月入朝参战以来，在没有海军和空军支援配合的情况下，依靠劣势的武器装备连续作战7个多月，同朝鲜人民军共歼敌23万余人，缴获了大批装备物资，打出了战争的有利形势，把以美国为首的“联合国军”从鸭绿江打回到三八线以南，并经反复较量将战线稳定在三八线地区，粉碎了美国占领全朝鲜的企图，迫使“联合国军”由战略进攻转入战略防御，取得了了不起的伟大胜利，奠定了抗美援朝战争最后胜利的基础。

但是，由于敌我装备优劣悬殊和朝鲜特殊的地理条件的制约，志愿军战争机器的运转受到严重限制，在作战中的困难也是相当严重的。这些困难主要是：

第一，没有制空权，白天没有行动自由，作战天时受到严重限制。作战和物资运动主要靠夜间进行。

第二，基本上是在少量炮兵支援下的步兵作战，装备落后，攻击火力弱，难以歼灭美英军的重兵集团，每次战役能包围其一个或几个师，但对其一个整师甚至一个整团都难达到歼灭任务（同南朝鲜军作战稍容易一些）。当敌军突围逃跑时，我军依靠官兵的两条腿追击，也难达到追歼。

第三，作战地区南北狭长，三面环海，回旋余地小，限制了我军兵力优势和运动战特长的充分发挥，但有利于敌军依靠海空军优势在我侧后登陆进攻。

第四，在美国空军的轰炸封锁下，加之我军运输工具少，运输能力弱，因此，后勤保障严重困难，尤其物资运输和作战中的跟进保障更加困难。

由于我国工农业基础落后，经济力量薄弱，志愿军作战中的这些困难，短时间内不可能完全解决。因此，志愿军也不可能在短时间内大量歼灭敌人，解决朝鲜问题。战争的长期性充分显露出来了。

同时，我国支援战争的财力、物力是有限的。我国本来就贫穷落后，1950年的工农业总产值共为574亿元人民币，而财政收入仅65.2亿元人民币，财政收入还不足美国在朝鲜战争第一年直接开支战费100亿美元的1/3。因为支援战争，1950年我国军费开支占财政决算的41.5%，而经济建设费仅占财

政决算的 25.5%。1951 年财政预算，军费在比例上、数量上都较 1950 年有所增加。这样，战争长期打下去，国内经济建设必然受到影响。朝鲜人民已打了一年，支持长期战争的困难更多。

虽然，中国人民在以毛泽东为主席的中国共产党和中华人民共和国中央人民政府的领导下，是可以克服这些困难的，但是，如果美国放弃侵略全朝鲜的企图，愿意以三八线为界通过谈判公平合理地解决朝鲜问题，于中国人民和朝鲜人民更有利。和平解决朝鲜问题是我国的一贯主张，志愿军参战的目的就在于同朝鲜人民一起打击美国的侵略，保卫和平。在此之前，只是由于美国当局执意坚持继续侵略，使和平解决朝鲜问题成为不可能。而这时，战线已稳定在三八线地区，美国当局调整了朝战政策，做出了愿沿三八线谈判停火的表示，通过和谈解决朝鲜问题的基础和可能性已经具备。

{ewc MVIMAGE,MVIMAGE,!12300160_0088-1.bmp}

彭德怀司令员（中）同陈赓（左）、邓华（右）

副司令员在一起

在这种情况下，毛泽东、周恩来同金日成商谈，为志愿军确定了“充分准备持久作战和争取和谈达到结束战争”的总方针，即边打边谈。在军事上则确定了“持久作战，积极防御”和“在作战上，我们也应与谈判的要求相配合、相适应”的方针。

根据这些方针，彭德怀在第五次战役结束后，一方面对志愿军部队全面进行了持久作战的思想政治教育和各种准备，另一方面做了同敌军进行谈判的准备。

根据彭德怀和邓华的建议，志愿军领导也有了加强，中央军委任命陈赓和宋时轮分别为志愿军第二、第三副司令员，仍兼第 3、第 9 兵团司令员，甘泗淇为志愿军副政治委员。同时，调杨成武、张南生指挥的第 20 兵团（辖第 67、第 68 军）入朝，第 50 军也再度入朝。

三、停战谈判开始

6 月 23 日，苏联驻联合国代表马立克，在联合国举办的“和平的代价”广播节目中发表演说，根据朝鲜战争中双方的意向，提出了“交战双方应谈判停火与休战，而双方把军队撤离三八线”的建议。

也可能是一种偶然的巧合，在 6 月 25 日朝鲜战争爆发一周年的这一天，我国《人民日报》发表社论，表示“中国人民完全支持马立克的建议，并为其实现而努力”。同是这一天，美国总统杜鲁门在发表政策演说中也称：“我们现在愿意参加朝鲜问题的和平解决。”

6 月 30 日，根据美国国家安全委员会的指示，在东京时间上午 8 时，以“联合国军”总司令李奇微的名义，通过广播向中国人民志愿军司令员和朝鲜人民军司令官发布了要求举行停战谈判的通知。通知中说：“在接到你们愿意举行会谈的通知后，我将指派我的代表，并提出双方代表会晤的日期。我提议这样的会议在元山港内一艘丹麦的医疗船上举行。”

7 月 1 日，朝鲜人民军最高司令官金日成和中国人民志愿军司令员彭德怀，答复李奇微：“我们同意举行关于停止军事行动和建立和平的谈判而和你的代表会晤。会晤地点，我们建议在三八线上的开城地区。”

尔后，双方多次进行文电往来，并互派联络官进行了接触协商。7 月 10

日，朝鲜人民军和中国人民志愿军代表团（下简称“朝中代表团”）同“联合国军”代表团（下简称“美方代表团”）在开城开始了朝鲜停战谈判。朝中代表团的成员是：首席代表——朝鲜人民军总参谋长南日，代表——朝鲜人民军副总参谋长兼情报局局长李相朝、朝鲜人民军第1军团参谋长张平山、志愿军副司令员邓华、志愿军参谋长解方。朝中代表团的谈判工作，统由我国外交部副部长、军委情报部部长李克农全权负责组织领导，由李克农直接向毛泽东、金日成请示报告工作，并根据他们的指示处理谈判中的各种问题，还组成了由李克农为书记，邓华、解方和乔冠华为委员的志愿军代表团党委。美方代表团的成员是：首席代表——美国远东海军司令特纳·乔埃中将，代表——美国远东空军副司令劳伦斯·克雷奇少将、美国第8集团军副参谋长亨利·霍治少将、美国远东海军副参谋长阿雷·克雷奇少将、南朝鲜第1军团军团长白善焯少将。

朝鲜停战谈判局面的出现，是中国人民志愿军入朝参战以来，中朝军队同以美国为首的“联合国军”实际较量的结果，这本身也是中朝人民的伟大胜利。美国被迫谋求和谈走到谈判桌上来，是美国当局承认朝战失败的一种表现。然而，这种承认不是干脆的，而是羞羞答答的。美方代表团在谈判中无时无刻不表现出侵略者狂傲的姿态，使停战谈判一开始就非常艰难。彭德怀在朝鲜停战实现后的1953年9月曾经说过：“朝鲜停战谈判是一次史无前例的停战谈判。它既不是帝国主义者征服了别的国家、强迫别国接受投降条件的停战谈判，也不是帝国主义者争夺火并、相持不决，只好以妥协瓜分殖民地谋得短暂和平的停战谈判，而是一个妄图独霸世界的帝国主义者，在侵略战争中遭受到年轻的新兴的人民民主国家的反抗并遏制之后，不得不罢手而勉强接受的停战谈判。很显然，帝国主义者对于这样的谈判是不会甘心情愿地接受的，他无时无刻不在力图翻案。”

谈判要解决哪些具体问题，首先需要双方达成一个关心议程的协议。朝中代表团一开始就表明了通过谈判解决问题的诚意，南日在谈判开始的第一次双方代表团大会上，提出了三条建议，即：双方在协议的基础上停止敌对行动，以构成实现朝鲜全面停战的第一步；确定以三八线为军事分界线，双方军队同时撤离三八线，以建立非军事区，与此同时进行交换俘虏的谈判；在尽可能短的时间内撤退一切外国军队，以保障朝鲜问题的和平解决。朝中代表团并以这三条建议为基础，提出了谈判议程的方案：1.通过议程；2.以三八线为军事分界线并建立非军事地区问题；3.从朝鲜境内撤出外国军队问题；4.在朝鲜境内实现停火与休战的具体安排问题；5.关于战俘的安排问题。

美方代表团也提出了包括有9项内容的议程方案，然而，不分主次，次序混乱，并且有的与此次谈判毫无关系。因而，当朝中代表团指出其方案的不合理性后，他们稍作辩解，就将其所提9条改为4条，但以“撤退外国军队”问题属政治问题，不属这次谈判的范围，和在议程中只提一般性的而不是具体的分界线为借口，拒绝将朝中方面所提撤退外国军队和以三八线为军事分界线问题列入议程。美方代表态度蛮横、语言粗鲁，表现得既不讲理，也无礼貌。

朝中代表团表现了极大的克制和耐心，为了表示诚意，以早日达成议程协议，进入实质性的谈判，在这两个问题上做了让步，同意在议程中只提一般的军事分界线，而不提具体的线，留待具体讨论这一议程时再提。但关于撤退外国军队问题，提议留待停战实现后，由双方有关各国政府召开高级会

议来解决、并将其列为谈判的一项议程。这样，仅仅关于议程的谈判，就历经半个月，至 7 月 26 日才艰难地达成了协议。这个协议是在朝中代表团所提方案的基础上形成的，内容包括：

1. 通过议程；
2. 确定军事分界线以建立非军事区；
3. 实现停火休战的具体安排；
5. 向双方有关各国政府建议事项。

四、关于军事分界线问题的 舌战和飞机大炮的辩论

朝中代表团把关于军事分界线问题的谈判，看成是谈判各项议程中的核心问题。根据美方代表团在关于议程的谈判中毫无诚意并横生枝节的表现，估计到关于军事分界线问题的谈判会更加艰难，会有一场更为激烈的舌战。正像预料的那样，美方代表团完全不讲理，几乎不是在谈判，而是在炫耀武力。

在关于军事分界线的实质性问题谈判中，朝中代表团再次提出了以三八线为军事分界线的建议，并阐述了理由。美国当局在谋求谈判时，也有过这样的表示。然而，本来就没有多少诚意的美方代表团，认为朝中代表团在关于议程问题的谈判中一再让步是软弱的表现，因此，更加傲慢无礼，不但置美国当局曾做过的表示于不顾，坚决拒绝朝中方面以三八线为军事分界线的合理建议，而且狂妄地炫耀其海空军“优势”，无理地要求这种优势要在军事分界线的确定上得到“补偿”。

美方首席代表乔埃，在 7 月 27 日的谈判会中说：地面部队的战线，不能反映双方军队的实际力量，联合国军具有海空军“优势”，“贵方对海空军的威力是充分领会的，因此，必须对海空军部队给予地区作战的影响以适当的估计”。“联合国军以其空军力量与海军力量所控制的广大区域，它包括了全部北朝鲜从目前军事接触线直至鸭绿江和图们江，你方在朝鲜没有可以相比拟的地位，……换言之，你方将部队撤到大致通过平壤与元山一线以北时，所放弃的优势将完全比不上联合国军将其空军与海军力量从北朝鲜撤退时你方所获得的优势”。28 日，乔埃在谈判会中又说：“在选择非军事区时，我们必须要考虑地形和联合国陆海空军的潜力。但是，我方已经提议撤退我方的海空军，为了这些让步，我方应得到补偿。”为此，美方代表团还标定了一份他们所要求的军事分界线的地图，将军事分界线划在了志愿军和人民军后方数十公里的地区。按这条军事分界线，志愿军和人民军将从当时的双方实际接触线退出 1.2 万平方公里地区。

对于美方狂妄无理的要求，朝中代表团针锋相对地进行了驳斥。朝中代表团首席代表南日，在 28 日的谈判会上指出：“你们的形势既然如此有利，你们为什么不在你们海空军掩护下，在你们曾经到过的平壤、元山一线站住脚呢？而且一直退到汉江以南呢？……尽管你们滥用你们的空军狂轰滥炸，你们的战线却从鸭绿江一直撤到三八以南，这是单纯的什么兵种效能的观点可以解释的吗？你们的陆上战线集中地反映了你们陆海空军的全部效能。事实上，你方只是依靠了海空军毫无人道的、违反国际公法的狂轰滥炸，才勉强地、暂时地维持了你们地面部队的现状，假使没有这种狂轰滥炸的掩护与

支持，你们的地面部队早就不知道撤到什么地方去了。”你们根据“荒谬的理论而提出的军事分界线，是完全没有根据的，从而也是不值得考虑、不能考虑的”。你们在谈判中这种无理的表现，“除了表明你们在准备扩大战争的根据外，不能有其他解释，……我们坐在这里开会，不是来夸耀自己的军事力量，叫嚣战争，而是来谈判停战，从而建立和平解决朝鲜问题的桥梁”。

美方代表百般无理狡赖。8月11日，乔埃又荒唐可笑地提出了与其海空军“优势”自相矛盾的理由，来支持其关于军事分界线的主张。乔埃说：你方地面部队具有强大的优势，并且这种优势还会增加，而美方地面部队不具备这种优势，因此美方地面部队必须要有一定深度的天然防御阵地。

这种理论简直不值一驳。南日一针见血地指出：你们用“两种互相冲突的理由，来支持你的方案，难道你们不觉得滑稽可笑吗？你们说你们海空军强，所以你们应有所补偿。现在你们承认你们陆军弱，但你们又说应有补偿。……不管你们强弱，你们都需有补偿，这不是一种失去理智的瞎说么？”

美方代表团理屈词穷，仍不接受以三八线为军事分界线，并且以为他们依靠海空军优势可以夺取他们所提出的军事分界线。于是，“联合国军”诉诸武力，用飞机大炮展开了辩论。李奇微下令于8月18日起发动夏季攻势，同时以空军对朝鲜后方发动了大规模的“绞杀战”，尔后又发动了秋季攻势。此时，美方在谈判会场连续制造事端，轰炸朝中代表团驻所、枪杀保障开城谈判会场安全的志愿军军事警察等，致使停战谈判于8月23日被迫中断。会场上的舌战转到了战场上飞机大炮的辩论。

对于美方的军事进攻，我方早有预料和防备。早在停战谈判开始前的7月初，毛泽东就指示彭德怀：必须“极力提高警惕。我第一线各军，必须准备对付在谈判前和谈判期内敌军可能对我来一次大的攻击，在后方，则举行大规模的空炸，以迫我订立城下之盟。如遇敌军大举进攻时，我军必须大举反攻，将其打败”。彭德怀据此做了部署和准备。在谈判开始后，志愿军代表邓华和解方，鉴于美方代表在谈判中的狂妄表现，于7月底致电彭德怀，建议“谈判需要战斗胜利配合，并须做破裂之军事准备，……谈判需政治攻势，特别是战斗胜利相配合才更有为利”。

在李奇微发动进攻后，彭德怀指挥志愿军协同人民军进行了带有坚守性质的防御作战，顽强抗击敌军进攻。李奇微夏季攻势的目标，指向人民军防守的东线阵地。人民军第2、第3、第5军团在前线总指挥金雄的指挥下，同敌军展开了激烈的争夺，经一个月抗击，歼敌4.6万余人，敌军只向前推进阵地2—6公里。志愿军第一线第64、第47（4月中旬入朝）、第42、第26、第27军配合人民军的抗击，主动进行战术出击，歼灭敌军数千人，攻占了几个战术要点。

李奇微的夏季攻势未达到目的，于9月底又发动了秋季攻势，目标指向志愿军阵地。此时，第20兵团指挥的第67、第68军分别接替了第27军和人民军第5军团的阵地。李奇微利用飞机大炮猛烈轰击西线志愿军第64、第47军和东线刚刚接防的第67、第68军阵地，对每一个阵地都发射炮弹数万发。彭德怀指示各军，坚决抗击敌军进攻，大量杀伤敌军，并在有利情况下实施反击，以粉碎敌人的进攻。“所有重要之点，必须准备坚守，不得随便放弃”。据此，各军利用有利的山地地形，顽强抗击。第64、第47军的每个阵地上都大量地歼灭了敌军，有的还利用掩蔽式工事有效地保存了自己。第67、第68两军出色地组织了反坦克作战，集中所有反坦克武器，组成专

门的反坦克分队，结合构筑反坦克阵地，有效地打击了敌军集群坦克的进攻，共击毁敌军坦克 67 辆，击伤 8 辆，为志愿军打击敌军集群坦克的进攻创造了经验。战至 10 月 22 日，志愿军歼敌 7.9 万余人，李奇微推进阵地 3—9 公里。李奇微连续两个月的夏秋季攻势，付出 15.7 万余人的伤亡代价，仅占去阵地 640 余平方公里。这种得不偿失的进攻遭到了美国国会和参谋长联席会议的指责。

美方代表团在谈判桌上舌战没有得到的东西，美军在战场上两个月的飞机大炮的辩论同样没有得到，并且付出了重大伤亡代价。于是美方代表团不得不回到谈判桌上来继续谈判。战场上飞机大炮的辩论，又一次证明，美军的海空军“优势”，对于其推进地面战线帮不了多少忙。

10 月 25 日，停战谈判在新会址板门店复会后，美方代表团再也狂妄不起来了，再也不提其“补偿”论的主张了。但是，帝国主义者是不会轻易认输的。美方代表团在其所提的关于军事分界线的新方案中，仍拒不接受以三八线为军事分界线，并无理要求志愿军和人民军退出 1500 平方公里的地区，其中包括志愿军和人民军占领的开城地区。这当然遭到了朝中代表团的有力驳斥。此时，双方代表团成员均有调整。志愿军代表邓华，已由第 23 兵团副司令员边章五接替。邓华回到志愿军总部协助彭总负责作战等工作。

为了配合谈判，粉碎美方的企图，彭德怀决定，志愿军举行战术反击，收回一些放弃的阵地，表示我力量。在精心组织和准备的基础上，志愿军第一线的第 64、第 47、第 42、第 26、第 67（11 月 7 日由第 12 军接替）、第 68 军，从 10 月底至 11 月底，分别选择当面敌军突出的、暴露的营以下兵力防守的阵地进行了攻击，共对 26 个阵地攻击 34 次，攻克阵地 21 处，经反复争夺后，主动放弃 12 处，巩固地占领 9 处，共歼敌 10000 余人。其中第 47 军和第 64 军分别创造了阵地战中，一次攻歼美军或英军一个营的范例。担负保卫开城任务的第 65 军还进行两次扫荡作战，扩大土地面积 280 余平方公里。位于西海岸的第 50 军在志愿军轰炸机部队的支援配合下，攻击西朝鲜湾大和岛、小和岛等 10 余个岛屿。人民军海防部队在大同江口和瓮津半岛沿海攻占数个岛屿。从而，有利地打击了敌人，促进了板门店的谈判。

在我军作战的有力打击下，在朝中代表团的严词驳斥下，美方代表团不得不逐渐放弃其无理要求。朝中代表团也根据具体情况做了适当让步。

早在 8 月中旬，志愿军谈判代表团李克农、邓华、解方、乔冠华就根据美方在谈判中的表现，对美方关于军事分界线的意图进行了分析，认为“要对方接受三八线的方案是不可能的。……估计对方最后的盘子就是老实的就地停战加上若干不大的调整”。代表团认为，与其坚持三八线而谈判破裂，不如就地停战为有利。虽然敌方说是就地停战，但敌我双方在三八线南北均有阵地，我方也可以说是三八线停战，这样政治上双方都可以过得去。敌军在三八线以北较我在三八线以南占阵地略多，但敌占阵地主要是山区，于军事上有利，而没有经济价值，而我在三八线以南所占阵地为平原，遭战争破坏较小，经济上对我有利。军事上我在三八线以北有阵地可守，在三八线以南可威胁汉城，于我方也没有什么不利。这样说，那样说，只是个说法问题。

其实，早在 6 月初，金日成同毛泽东、周恩来在北京会商决定谈判时，对此就有考虑。为了促进停战早日实现，经金日成批准，在敌方遭我打击逐渐放弃无理要求后，朝中代表团于 11 月 7 日的谈判会上，提出了以双方军队实际接触线为军事分界线，各后撤 2 公里为非军事区的建议。美方代表无法

再无理耍赖。这样，关于军事分界线的谈判，历时4个月，方于11月27日达成协议，并校订了军事分界线。美方代表团坚持自签订本项谈判协议之日起，如果30天之内实现停战，则已校订的军事分界线为有效，如果30天以后实现停战，届时，则按双方接触线的实际变化，重新校订军事分界线。美方还梦想，30天以后依靠现代化的武器装备，仍可得到便宜。然而，朝鲜战争历史的演进，却总是同美国过不去，总是不按美方的梦想发展。

五、其他议程的舌战

毛泽东在讲到美国在朝鲜战场上的表现时，曾经说过：“同他们讲和是不容易的。美帝国主义者很傲慢，凡是可以不讲理的地方就一定不讲理，要是讲一点理的话，那是被逼得不得已了。”

朝中方面原以为，关于军事分界线这个谈判的核心问题解决了，其他议程的谈判要相对容易些。然而，美方在军事分界线问题上的谈判没能得到便宜，没有达到他们“体面停战”的目的。由于他们的本性所决定，在其他各项议程的谈判中，仍是处处表现不讲理。

在关于军事分界线的谈判达成协议后，1951年11月27日、12月11日和1952年2月6日，以小组会的形式先后开始了第三项议程：关于停火与休战的安排问题；第四项议程：关于俘虏的安排问题；第五项议程：关于向双方有关各国政府建议事项的谈判。

在第三项议程的谈判一开始，朝中代表就提出了保障停战的五项建议：1.自停战协定签字之日起，双方停止一切敌对行动；2.双方一切武装力量，于停战协定签字后3天内撤出非军事区；3.双方一切武装力量，于停战协定签字后5日内，从对方后方撤走；4.双方一切武装力量不得进入非军事区和在该区进行武装行动；5.双方组成停战委员会，共同负责停战协定的实施。后又增加一项建议：组成中立国监察机构对双方停战进行监督。

美方代表除了空谈同意停战后双方停止敌对行动外，没有提出任何实质性的方案，反而提出与停战毫无关系的双方互派人员到对方后方自由视察的建议，企图进行特务侦察活动。尤其无理的是，竟然提出在停战期间不准朝鲜北方建设机场，干涉朝鲜内政。经朝中代表的严厉驳斥后，美方虽放弃了自由视察的要求，但仍胡搅蛮缠，坚持不准朝鲜北方建设机场。朝中代表解方严词警告对方：既使在你们使用军事力量狂轰滥炸、大肆破坏的时候，你们妄想干涉朝鲜北方的内政也没有干涉得了。你们使用军事力量不能得到的东西，也休想在谈判中得到。后来，美方代表又拒绝朝中代表所提中立国监察机构的成员国。直到1952年5月，美方才被迫放弃其干涉朝鲜北方内政的不准建设机场的要求。这样朝中代表在中立国提名问题上也做了让步。此项议程的谈判，历经5个多月，双方于5月2日，以朝中代表所提方案为基础，达成了协议。

相对而言，关于第五项议程的谈判还算顺利，但美方代表也是左右刁难，企图使该项议程变得毫无意义。经朝中代表的努力，历经12天的反复辩论，该项议程于2月17日达成了协议。

斗争最尖锐，拖延时间最长的是第四项议程：关于俘虏安排问题的谈判。此项议程谈判，由于美方不讲理和毫无诚意，竟拖了一年半之久。这是朝中方面没有料到的。本来，关于战俘问题，既有国际惯例，也有美国已签字的

关于战俘问题的日内瓦国际公约。该公约规定：战争停止后，全部释放并遣返战俘，不得迟延。朝中代表一开始就据此提出了停战后迅速遣返全部战俘的原财。

然而，美方代表始则不表态，继则提出先交换战俘名单，进而不顾其政府已签字的战俘问题的国际公约，又一次无理到了荒唐可笑的地步，竟然提出“一对一”交换战俘的无理主张，即：一方交换完了，其缺额由愿到对方的“平民”顶替，再有剩余战俘，则要他们宣誓，“不再参加战争”，尔后“假释”，所谓尊重战俘的“人权”，实行“自愿遣返”。企图假其名而行强迫扣留战俘之实。朝中代表李相朝对此进行了严厉驳斥，并指出：“战俘的释放与遣返，不是人口买卖，20 世纪的今天更不是野蛮的奴隶时代。”“全世界人民将诅咒你方的提案，你方自己的被俘人员和他们的家属也将诅咒你方的提案，因为你方这一提案阻塞释放与遣返全体战俘的可能，将阻塞迅速达成停战协议的前途。”然而，美方代表对所谓“自愿遣返”以外的任何方案都拒绝讨论，致使这一问题的谈判没有任何进展。1952 年 5 月 22 日，美国陆军少将威廉·哈里逊接替乔埃为美方首席代表后，对谈判则采取了无赖的态度，要么到会一言不发，甚至在会场上打瞌睡，要么一到会就提议休会若干天，不等对方表态，他就率美方代表退席。谈判实际上已处于停顿状态。到了 10 月 8 日，美方竟单方面宣布无限期休会，停战谈判再次中断。

美方还派特务到志愿军和人民军战俘营进行反动宣传，对战俘强行“甄别”，并血腥屠杀志愿军和人民军被俘人员。我方对此提出了强烈谴责和抗议。

1952 年夏季以后，美军在战场上越来越处于不利地位，几乎是守则必失、攻则不克。到了 1953 年初，已完全失去了战场上的主动权，处于走投无路的境地，只好再次回到谈判桌上来解决问题。朝中方面为使战俘问题获致圆满解决，提出了新的建议。经过谈判会上朝中代表团的不懈努力和战场上志愿军、人民军胜利作战的有利配合，至 1953 年 6 月 8 日，终于以朝中方面的建议为基础，达成了关于战俘问题的协议。然而，由于南朝鲜李承晚当局的破坏，直至 1953 年 7 月 27 日，双方才签订朝鲜停战协定。

第六章

后方战场

- 美国空军肆无忌惮
- 千条万条，运输第一条
- 遮蔽天幕的高射炮火网
- 大队长李汉首开志愿军空军击落美机记录
- 毛泽东“向空军第三师致祝贺”
- 打不烂、炸不断的钢铁运输线

朝鲜战争是现代化的立体战争，美军依靠其优势的空军力量到处狂轰滥炸，朝鲜前方后方都成了战场，这对基本上是单一陆军的志愿军来说，不但在前方作战困难很多，而且后方运输也极为困难。但是，上致中央军委和志愿军总部，下致广大官兵，采取了许多有效措施，想了许多办法，创造性地建成了“钢铁运输线”，不但基本解决了运输问题，而且使我军后勤保障实现了适应现代作战需要的一次质的飞跃，并且创造了现代战争中后方战场的斗争经验。

一、美国空军肆无忌惮

1950年10月，在志愿军入朝时，美军投入到朝鲜战场上的各型飞机即达1200余架，到1951年夏季以后，增加到1500架以上，最多时达2400架。据1951年6月的资料统计，美国用于侵朝的空军计有B—29型战略轰炸机3个大队和1个侦察中队，飞机115架；B—26型轻轰炸机2个大队，飞机96架；F—51、F—80、F—84型战斗轰炸机（主要用于攻击地面目标，也可空战）4个大队2个中队，飞机360架；F—51、F—80、F—86型战斗截击机（空战飞机）3个大队，飞机225架；海军陆战队和海军舰载航空兵的飞机400余架；另有其他飞机500余架。美军飞行员均有数百小时以上的飞行经历，最多的达3000余小时，1/2以上有第二次世界大战空中作战的经验。

而志愿军在1951年9月以前，没有空军参战，在1951年3月以前，也几乎没有高射炮部队，甚至连高射机枪也为数寥寥。

美国空军欺我志愿军没有空军，也没有高射炮部队，因此，其飞机活动肆无忌惮，非常猖狂，无论白天黑夜，成群结队在朝鲜北方上空活动，到处狂轰滥炸和扫射。整个朝鲜北方的城镇几乎变成了一片废墟，主要铁路车站和铁路、公路桥梁基本被毁，铁路时常处于瘫痪状态。朝鲜北方的上空，一度成了美军飞行员的自由天地，他们随心所欲，无所顾忌，几乎见到活动目标就打，单个车辆、单个行人也不放过。飞行高度之低可使地面人员看到飞行员的眼睛和鼻子，经常擦房顶、掠树梢而过，甚至有的钻桥洞追打地面目标，有的亡命之徒，因此而撞毁丧命。

朝鲜停战谈判开始以后，李奇微为配合谈判，对志愿军和人民军施加军事压力，在命令其地面部队于8月18日发起夏季攻势的同时，也命令其空军（包括海军的飞机）发动了大规模的“绞杀战”，以摧毁朝鲜北方铁路运输系统为主要目标。他们集中了远东的全部轰炸机和绝大部分的战斗轰炸机，在战斗截击机的掩护下，每日出动数百架次至上千架次，对朝鲜北方铁

路分区分段进行毁灭性的轰炸，并派有专门的巡逻飞机，在夜间追打铁路和公路上的运输车辆，企图以此来“窒息”志愿军前方部队。

1951年9~12月，美国空军集中轰炸破坏清川江以南、平壤以北的铁路。在地图上这一地区的铁路近似于三角形，因此，这一地区铁路被称为“三角铁路”，是朝鲜北方铁路咽喉。据中朝联合铁道运输司令部的统计，美国空军轰炸三角铁路，9月出动飞机3027架次，破坏线路和车站648处次，破坏桥梁57座次；10月出动飞机4128架次，破坏线路和车站1336处次，破坏桥梁53座次；11月出动飞机8343架次，破坏线路和车站1937处次，破坏桥梁77座次；12月出动飞机5786架次，破坏线路和车站1697处次，破坏桥梁101座次。三角铁路总长为180公里，只相当于当时志愿军和人民军管区铁路960公里的1/5强，而遭受破坏的数量却占管区被破坏总数的50%以上。4个月中，美国空军在这一地区投弹63515枚，合31755吨，平均每公里落弹350余枚，合170余吨。

这给志愿军的物资运输造成了极大的困难，甚至直接影响了前线的作战。这是抗美援朝战争给志愿军提出的一个新的重大问题。

二、千条万条，运输第一条

中央军委把志愿军能不能有饭吃，一直是作为能否取得战争胜利的重大战略问题来解决的，对志愿军的后勤保障极为关心。早在东北边防军组成时，就决定以李聚奎为司令员组成边防军的后勤领导机构，后来边防军后勤机构与东北军区后勤部合并，以李聚奎专任东北军区后勤部长，负责边防军的供应问题。1950年10月，边防军改为中国人民志愿军时，毛泽东签署的军委命令中，明确规定：“中国人民志愿军以东北行政区为总后方基地，所有一切后方工作供应事宜，……统由东北军区司令员兼政治委员高岗同志调度指挥并负责保证之。”志愿军向朝鲜境内出动时，东北军区派出了前勤指挥所，负责领导志愿军的后勤工作，并且兵马未动，粮草先行，提前向朝鲜境内运送和储备了作战物资，还从东北和其他地区抽调人员，加强志愿军的后勤保障工作。这对保障志愿军取得初期作战的胜利，具有重要的作用。

但是，由于缺乏现代条件下后勤保障的经验，对美国空军给我军后勤保障造成的重要困难估计不足。因此，尽管我军后勤保障早有准备和部署，但仍不适应前方部队作战的需要，尤其作战物资的运输补给极为困难。

为解决这些问题，中央军委和东北军区于1951年1月，专门在沈阳召开了志愿军后勤工作会议，军委副主席周恩来、代总参谋长聂荣臻、总后勤部长杨立三等到会并作指示。会议认为，抗美援朝战争把我军后勤工作推上了新的阶段，“小米加步枪、仓库在前方”的时代已经过去。后勤工作必须以新的姿态适应现代战争的需要。志愿军后勤工作千头万绪，但核心是运输问题，“千条万条，运输第一条”。会议决定，采取一切措施，保证物资运输，改变运输工作的被动局面。志愿军党委于5月3日，也专门作出了《关于供应工作的指示》，要求各部把后勤工作作为当前“一切工作中的首要环节”。

据此，从国内抽调高炮部队入朝，掩护交通运输，并增调了铁路、公路抢修部队和汽车运输部队，到1951年6月，已有两个城防高炮团另6个营，部署在朝鲜境内铁路线上的重要桥梁和车站地区，掩护铁路运输，另有1个野战高炮师在公路线上机动作战，掩护公路运输；铁路抢修部队由1个铁道

兵师陆续增加到 4 个师又 1 个团和 1 个工程总队；工兵部队已达数个团；运输汽车从入朝时的 700 余辆增加到 3000 余辆。与此同时，对后勤领导机构和后勤战线的兵力也进行了调整和充实，专门成立了志愿军后方勤务司令部，由志愿军副司令员洪学智兼任司令员、周纯全任政治委员，负责指挥志愿军在朝鲜境内的后勤保障工作，军、师、团各级以一名副职干部兼任各本级的后勤部（处）长。后勤人员从入朝初期的几千人增加到 10 余万人，同作战部队的人员比例由 1：35，增加到 1：6。

1951 年 8 月以后，为反“绞杀战”斗争的需要，志愿军首长陆续将在朝鲜高炮部队的 70% 集中用于掩护铁路运输，使掩护铁路运输的高炮部队达 3 个师又 4 个团和 10 余个营。9 月中旬，中央军委命令志愿军空军出动作战，掩护平壤以北铁路运输。中央还决定将从苏联订购的用于修建黄河大桥的钢材运入朝鲜，用于朝鲜境内的铁路抢修。周恩来副主席还指示，减少弹药和杂品的运输，主要运输粮食和冬季服装，并指示改变铁路运输的包装办法，车辆增载 1/3，多用大型车辆运输。为统一指挥铁路系统反“绞杀战”斗争，经同朝方协商，成立了以刘居英为司令员兼政治委员的前方运输司令部，在贺晋年为司令员、张明远（东北局秘书长）为政治委员的中朝联合铁道运输司令部领导下，具体负责协调指挥朝鲜北方铁路系统的抢修、运输和防空斗争。同时，还动员在二线的各军加修、加固和拓宽了公路。

经过这些努力，使志愿军的后勤保障工作，从 1951 年底起扭转了被动局面。

三、官兵们的创造

铁路公路战线上的广大官兵，为保证道路畅通，多运物资，群策群力，千方百计克服困难，采取了许多创造性的措施，提高抢修和运输效率。

在铁路战线上，以李寿轩为副司令员和崔田民为副政治委员指挥的志愿军铁道兵团，昼夜奋战，在反“绞杀战”期间，根据敌机轰炸特点，采取以集中对集中、以机动对机动的抢修方针，保证抢修。当敌集中力量轰炸平壤以北三角铁路时，志愿军铁道兵则集中 1/2 以上的抢修力量，保证这一地区的抢修。当敌机在这一地区遭到志愿军空军和高炮部队的严厉打击后，改取不定区的机动轰炸时，志愿军铁道兵团在保证三角地区抢修的同时，则集中一定兵力，做为机动，以便其他地区随炸随修。在重要车站，均修筑了迂回线，在重要桥梁地区均修筑了简便桥。为提高抢修速度，多抢通车时间，夜间抢修时，均在道钉上涂抹白灰，并采取枕木排架法代替大弹坑的填土。为迷惑敌机，尽量减少桥梁被炸，则采取了架设活动桥梁的办法，指晓前拆除几孔桥梁，使敌机以为是坏桥，而不必轰炸，黄昏后再将桥梁架好，保证夜间火车通行。

铁道兵不但抢修任务重，而且除了防敌空袭外，还要冒着生命危险排除美机轰炸时未爆炸的炸弹，其中大量的的是定时炸弹。这些定时炸弹浸入地下几米深，随时都有爆炸危险。铁道兵官兵以不怕牺牲的革命精神和科学态度，及时排除这些定时炸弹。1951 年 10 月，在平壤以北三角铁路几十公里的路段上，就排除定时炸弹 108 枚。铁道兵涌现了许多排弹能手，其中第 4 师司令部见习参谋钟英，3 天中连续排除定时炸弹 16 枚，该师第 4 团战士吴青山在几天中排除定时炸弹 22 枚，该师班长田清洲和第 1 师战士李云龙，分别拆

卸定时炸弹 18 枚和 34 枚。

志愿军铁道兵抢修能力之强，就连美国空军也无可奈何地表示叹服：“共军抢修部队填补弹坑的速度可以和……F—80 飞行员的轰炸速度匹敌。共军从我‘绞杀战’一开始就能迅速地抢修被炸断的铁路。共军修路人员和修桥人员，已经粉碎了我们对平壤以北铁路线的封锁……并赢得了使用所有铁路线的权利。”

志愿军铁路运输也采取了许多特殊措施：在桥梁被炸断的地区则采取分段倒运；临时架设的桥梁，承受不了机车的重压，则采取将车皮顶过去，而机车不过桥，由对面机车接运的办法，所谓的“顶牛过江”；为充分利用夜晚的通车时间，则采取集中向前突运，再寻机向后排回空车的办法，所谓“片面运输”。从而提高了铁路运输效率。

在公路战线上，沿途修筑了许多水下桥和汽车掩蔽所，并以 1 个公安师和志愿军后勤各分部的警卫团营，在主要公路干线上设置了防空哨，为行驶的汽车防空报警，并指挥交通，当敌机来临时，立即鸣枪或发射信号弹报警，汽车立即闭灯行驶。汽车司机遇敌机轰炸扫射时，或突然刹车，或猛力加油，躲避轰炸扫射，有的在敌机轰炸扫射后，立即在汽车附近点燃早已准备好的破油桶或破旧衣布，假示汽车被炸中燃烧，以迷惑敌机，保护车辆。采取这些措施，既大大减少了汽车的损失，又大大地提高了公路运输效率，季度汽车损失率由入朝初期的近 50%，降到 1952 年第一季度的 2.3%，公路运输能力，1951 年 9~12 月比 4~8 月提高 95%，1952 年 1~4 月比 1951 年 9~12 月，又提高 19.8%。

毛泽东在 1953 年 9 月讲到抗美援朝战争的胜利时，高度赞扬了志愿军这些群众性的创造，指出：“我们的干部和战士想出了各种打仗的办法。我讲一个例子。战争的头一个月，我们的汽车损失很大，怎么办呢？除了领导想办法以外，主要是靠群众想办法。在汽车路两旁用一万多人站岗，飞机来了就打信号枪，司机听到就躲着走，或者找个地方把车藏起来。同时，把汽车路加宽，又修了许多新汽车路，汽车开过来开过去，畅行无阻。这样，汽车的损失就由开始时的百分之十，减少到百分之零点几。”

四、高射炮兵的威力

在美军实施大规模“绞杀战”时，志愿军共有高炮部队 4 个野战师、4 个城防团和 50 余个独立营，总计有 85 和 37MM 口径的高炮 800 余门，还不及侵朝美军飞机数目的一半。独立营多数配属了各兵团各军，野战师大部分在掩护修建机场。为粉碎美国空军的“绞杀战”，1951 年 8 月底，志愿军总部将朝鲜北方铁路划分为 4 个防空区，指定 1 个团又 12 个营的高炮部队，分区担负对空作战，掩护铁路运输。同时还有城防高炮部队掩护重要铁路桥梁。这些高炮部队，积极作战，予前来轰炸的美空军飞机以严厉打击。美国空军战史供认，志愿军高射炮火使担负轰炸朝鲜北方铁路的美第 5 航空队的战斗轰炸机遭受了很大损失，“9 月，被击落 32 架，击伤 23 架；10 月，被击落 33 架，击伤 238 架；11 月，被击落 24 架，击伤 255 架”。美军舰载航空兵更惧怕部署在平壤至元山铁路线新成川至高原段上的高炮部队，他们称这里的高炮火力猛烈，射击准确，称这一地区为“死亡之谷”，而惧怕去那里攻击铁路。

由于平壤以北、清川江以南的三角铁路是朝鲜北方铁路的咽喉地带，所以美国空军把这一地区做为重点进行轰炸破坏。为粉碎美国空军对这一地区的轰炸封锁，中央军委和志愿军总部将掩护机场修建的3个高炮师和1个城防团，全部集中用于掩护铁路运输，并以高炮第64师司令部为基础，组成了铁道高射炮兵指挥所，统一指挥掩护铁路运输的高炮部队作战。1951年12月，这些高炮部队采取了“集中兵力、重点保卫”的方针，将70%的兵力、火力部署在三角地区铁路沿线，打击敌机。仅12月一个月，即击落敌机38架、击伤68架。美军飞机惧怕这一地区的高射炮火，不得不改变轰炸战术，寻找志愿军高炮火力较弱的地区机动突击。

魔高一尺，道高一丈。敌变我变。由于敌军轰炸范围扩大，重点不固定，而我军高炮部队少，为解决这个矛盾，高炮部队则采取了“重点保卫、高度机动”的作战方针，以一部兵力重点保卫一些桥梁和车站，而以主要兵力实施机动作战，将铁路沿线划分为几个作战区，每区以高炮师为单位统一指挥该区高炮部队机动作战，减少了掩护的空白区。高炮第605团在1952年4~5月间，5次机动作战，击落击伤敌机各11架，而自身无伤亡。第612团，在4月底的一次机动作战中，击落敌机5架，击伤9架。城防高炮第513团和第39营，在机动作战中，设置假阵地，引诱敌机上钩，以这种方法，在3月3日的作战中，一举击落敌机9架，击伤21架。担负掩护仓库区的高炮第24营，5月8日同来袭的数百架次敌机激战一天，创造了1个营一日作战击落敌机7架，击伤18架的记录。高炮部队采取“重点保卫、高度机动”的作战方针，有力地掩护了铁路运输，严厉地打击了敌机，1~6月共击落敌机198架，击伤779架。

整个反“绞杀战”斗争中，志愿军高炮部队充分发挥了威力，共击落敌机260余架，击伤1000余架，对粉碎美国空军的“绞杀战”起了重要的作用。

五、年轻的志愿军空军大显身手

当中国人民志愿军入朝参战时，中国人民解放军空军尚在组建过程中，全部作战部队仅1个混成旅（共4个团，各种飞机117架），尚无力参加志愿军在朝鲜的作战。为了适应抗美援朝战争的需要，中央军委突击组建和训练空军部队。1950年12月底起，有1个师在苏联空军带领下进行实战练习，学习空战和指挥的经验。大队长李汉，首开志愿军空军击落击伤敌机的记录，击落1架，击伤2架。1951年3月成立了以刘震为司令员的志愿军空军司令部，统一指挥志愿军空军作战。在此基础上，志愿军空军于1951年9月中旬起，以师为单位轮番出动作战，与苏联空军在平壤以北（主要是清川江以北）地区上空，打击美军入侵的飞机，掩护铁路运输和机场修建。在中国人民抗美援朝战争期间，苏联空军保持2~3个师，共4~7个团，飞机120~210架，在清川江以北地区上空作战，当时处于密而不宣的状态，20年以后公开。

当时志愿军空军装备的多是苏联制造的米格—15型歼击机，这种飞机的作战性能与美军的F—86飞机相当，飞行性能略优于F—86飞机。每师装备50架。志愿军飞行员在这种飞机上只有几十小时、最多不过100小时的飞行经历，既谈不上空战经验，也缺乏飞行经验。这同美军飞行员无法相比。但志愿军飞行员多数有陆军的生活战斗经验，政治素质强，具有顽强的战斗作风，在朝鲜战场上同美国空军展开了较量，表现出身手不凡。

志愿军空军首先出动的是第4师,从9月20日至10月19日,一个月内,共出动508架次,在苏联空军带领下,共进行大小空战10余次,其中敌我双方共200架飞机的大空战7次,共击落敌机17架,击伤7架,自己损失飞机14架。空战中,飞行员刘勇新首创击落美军最先进的F—86战斗机的记录。但他也不幸被敌击中,壮烈牺牲。大队长李永泰在驾机被击伤几十处,不能开炮的情况下,沉着果断指挥,并安全返回着陆,被誉为“空中坦克”。第4师为志愿军空军作战打出了良好的开端。毛泽东在10月2日看到第4师的空战报告后,欣然挥笔写下了“空四师奋勇作战,甚好甚慰”的赞语。

紧接着,志愿军空军第3师出动,接替第4师作战,第4师转入休整。第3师打得更漂亮。在10月21日至1952年1月14日的86天中,出动2391架次,进行大小空战23次,击落敌机54架,击伤9架。该师仅损失飞机16架。许多飞行员创造了突出的战绩,大队长赵宝桐击落敌机6架,击伤2架,战果最佳;大队长刘玉堤击落敌机5架,击伤2架;飞行员范万章击落敌机4架,击伤1架;大队长王海击落敌机3架,击伤2架;飞行员焦景文击落敌机3架,击伤1架。他们均荣立特等功,被授予英雄称号。1952年2月1日,毛泽东看到了第3师的作战报告,又欣然挥笔写下了“向空军第三师致敬贺”的批语。

志愿军空军出动后,与苏联空军并肩作战,有力地打击了美国空军的嚣张气焰,给美国空军造成了巨大的威胁。美国空军参谋长惊呼,中共在一夜之间就成了空军强国之一。美国空军战史说:“共军米格由于占有数量上的优势,所以11月份在平壤以北他们到处取得了主动地位,而联合国军所有的飞行员则只能对共军飞行员发动的进攻进行抵抗而已。”第5航空队只好决定,“他的战斗轰炸机以后不在米格走廊(美国空军称鸭绿江和清川江之间地区为“米格走廊”)内进行封锁交通线的活动,此后只能对清川江与平壤之间地区的铁路交通线实施攻击”。美国远东空军司令官奥托·威兰将军,也被迫下令,取消B—29轰炸机在昼间的轰炸活动,而于10月底起,全部转为夜间活动。

志愿军空军第4、第3师经受锻炼取得经验后,从1952年初起,轮番担负了带领新部队作战的任务。从1951年11月起,志愿军空军其他部队也陆续参战,根据第一线机场(均在中国境内)的容纳限度,保持2~3个师作战,每师作战3个月左右,经受锻炼取得经验后,即行轮换。到1952年6月,先后参战的又有志愿军空军第2、第6、第14、第15、第12、第17、第18师。1~5月,志愿军空军共击落敌机53架,击伤16架。其中在2月10日的空战中,志愿军空军第4师大队长张积慧,击落美军“王牌”飞行员乔治·A·戴维斯驾驶的F—86飞机,引起美国空军的很大震动。张积慧在抗美援朝战争的空战中共击落美机4架,荣立特等功,被授予一级英雄称号。

到1952年下半年,志愿军空军已有9个师经受了作战锻炼,各师均可独立担负作战任务,并且主要是同美军的F—86飞机作战。志愿军空军司令部的成员也进行了调整,由华东军区空军司令员聂凤智接替刘震任志愿军空军代司令员。1953年1月,志愿军空军第16师也参加了作战。这时,志愿军空军已能进行夜间作战,并取得战果。此外,1951年11月,志愿军空军轰炸机两个大队直接支援地面部队进行了攻占岛屿的作战。

在整个抗美援朝战争中,志愿军空军共击落敌机330架,击伤95架;被击落231架,被击伤151架。志愿军空军涌现了许多英雄人物,除前述英雄

外，著名的英雄还有：第3师中队长孙生禄，击落敌机6架，击伤1架，自己壮烈牺牲；第12师技术检查主任鲁珉，击落F—86飞机5架，被誉为“打佩刀式的能手”（“佩刀式”指F—86飞机）；第15师飞行员韩德彩，击落敌机5架，其中包括美国双料“王牌”驾驶员哈罗德·爱德华·费席尔的驾机；第15师飞行员蒋道平，击落敌机5架，击伤2架；第2师大队长王天保创造了用活塞式飞机击落F—86飞机1架，击伤3架的记录。

在志愿军空军和高射炮兵的有力打击下，加上铁路、公路抢修运输部队的艰苦努力，志愿军作战物资源源不断地运往前线。美军的“绞杀战”，不但未能“窒息”志愿军前线部队，而且还损失了大量的飞机。据美国空军战史称，尽管不断补充，但有的战斗轰炸机大队的飞机损失仍相当严重，只剩下75架编制数的一半左右，其中第49大队只剩41架，第136大队只剩39架。至1952年6月，美国空军的“绞杀战”终于以失败而宣告结束。志愿军建成了“打不烂、炸不断的钢铁运输线”，解决了能不能有饭吃的问题。

第七章

地下长城

- 四通八达的地下坑道
- 战术出击屡屡得手
- 冷枪冷炮神出鬼没
- 四平方公里与 190 余万发炮弹
- 上甘岭岿然不动
- 细菌战：“宣传弹”与“不爆炸的炸弹”

构筑以坑道为骨干的支撑点式的防御体系，这是志愿军在抗美援朝战争中的一大创造，在世界战争史上也具有重要意义。1952 年，志愿军后方形成了“钢铁运输线”，前方建立了坚固阵地防御体系，加之地面炮兵火力得到加强，因而，越战越强，越战越主动，几乎是攻则必克，守则必固。而“联合国军”则作战精神不断萎缩，其地面部队已逐渐丧失了主动权。

一、地下长城形成

能不能守的问题，是志愿军在抗美援朝战争中解决的又一个重大战略问题。在停战谈判达成关于军事分界线的协议后，志愿军能不能固守已有阵地，能不能在作战中巩固地占领阵地，已具有战略上的意义，并且同政治需要紧密相联。

根据战争形势的需要，1951 年秋，中共中央为志愿军确定了“节约兵力、物力和财力，采取持久的积极防御的作战方针，坚守现在战线，大量消耗敌人，以争取战争的胜利结束”。

为贯彻中共中央的方针，志愿军在保证作战需要的前提下，进行了精简整编和开展了反贪污、反浪费、反官僚主义的“三反运动”，节约了人力，节约了开支，为国家减轻了经济负担，同时大力开展了巩固阵地的工作。

对于没有空军直接支援作战、武器装备严重落后的志愿军来说，如何坚守现在战线，也是一个新问题。从入朝以来的作战实践看，在这样的装备条件下，仅仅依托野战阵地进行防御，不但伤亡大，而且也不可能坚守现在战线。但在粉碎李奇微 1951 年夏秋季攻势的作战中，志愿军阵地上出现了加深的防炮洞（俗称“猫耳洞”），对抗击敌军进攻，保存自己有生力量起了重要作用。这给志愿军战场统帅以重要启示。

于是，从 1951 年底起，彭德怀组织志愿军在全线展开了大规模构筑以坑道为骨干的坚固阵地活动。按照志愿军司令部提出的技术标准和战术要求，做到每个阵地均有坑道，并且坑道工事同野战工事相结合，既能防，又能打，既能保存自己，又能发扬战术消灭敌人，一般每条坑道长数十米，有两个以上出口，坑道顶部距地面厚度为 15—30 米，洞内宽 1.2 米、高 1.7 米。

这是一项巨大的工程，志愿军第一线各军，以小分队进行侦察、反侦察，袭扰、反袭扰活动，掩护主力进行筑城。在石质山上打坑道，对于缺少工具和炸药的志愿军来说，也是一项艰巨的工程。为解决工具和炸药，志愿军各部组织拆卸敌军发射而未爆炸的炸弹、炮弹，组织部队拾捡炮弹皮，自办铁匠炉制造工具。至 1952 年 5 月，在第一线阵地上，共挖掘坑道 7789 条，总

长 198.7 公里，修筑掩体 75 万个，露天及隐蔽式堑壕 3420 余公里，同时，人民军也挖掘坑道 1730 条，总长 88.3 公里，修筑掩体 3 万余个、堑壕 260 余公里。一般坑道均达到了防空、防炮、防毒、防雨、防潮、防火、防寒的要求。坑道内既有战斗设施，也有生活设施。每个阵地都自成体系，能打、能防、能机动、能生活。整个正面 250 余公里的战线上，在纵深 10 公里的范围内，基本上形成了以坑道为骨干同各种野战工事相结合的支撑点式的防御体系。第一线各军的二梯队阵地，于 8 月底也基本完成。志愿军的正面战线形成了“铜墙铁壁”。

这样，坚守现在战线有了比较可靠的阵地依托，可攻可守，巩固了战线，大大减少了伤亡。据统计，1952 年 4 月间，敌军以小部队向我攻击 60 余次，我军阵地无一丢失。1951 年夏秋季防御作战时，敌军平均发射 40~60 发炮弹杀伤我军一人，而 1952 年 1~8 月，敌军平均发射 660 发炮弹方能杀伤我军一人。正如毛泽东 1952 年 8 月所指出的：能不能守的问题解决了，“办法是钻洞子。我们挖两层工事，敌人攻上来，我们就进地道。有时敌人占领了上面，但下面还是属于我们的。等敌人进入阵地，我们就反攻，给他极大的杀伤。我们就是用这种土办法捡洋炮。敌人对我们很没有办法”。至此，志愿军是“方针明确，阵地巩固，供给有保证，每个战士都懂得要坚持到底”。

随着阵地的巩固，也节约了第一线的兵力。1952 年 6 月，志愿军对部署进行了调整，从第一线抽出一个军，部署在第二线，加强了二线的机动力量。此时，彭德怀在中央一再催促下回国治病，7 月接替周恩来副主席主持中央军委日常工作，仍兼志愿军司令员和政治委员，陈赓和宋时轮也先后回国任职。中央军委任命邓华为志愿军代司令员和政治委员，主持志愿军的全面工作，并任命杨得志为志愿军第二副司令员，协助邓华主持志愿军的工作。任命韩先楚接替杨得志任第 19 兵团司令员，第 19 兵团副司令员兼参谋长郑维山接替口国治病的杨成武任第 20 兵团代司令员，9 月又任命王建安任第 9 兵团司令员。

二、战术出击屡屡得手

彭德怀在回国之前，于 3 月 26 日指示：“我们目的作战方针，应采取积极手段，巩固现阵地，不放过任何有利战机，歼灭运动的、暴露的敌人，相机挤地方。”在阵地基本巩固以后，邓华又指示部队：“必须在战术上采取积极活动的方针，……总使敌处于一种防我进攻的姿态，迫使敌人处于被动地位。”根据这些指示，志愿军各部积极主动进行战术出击，打击敌人，蚕食敌军阵地。

从 4 月初起，志愿军开始有组织、有计划地挤占敌我中间地带和攻取敌军阵地上连、排兵力防守的突出的支撑点。到 5 月，这种活动在全线普遍展开。比较突出的有：第 63 军挤占阵地 10 处，第 40 军挤占阵地 4 处，第 39 军挤占阵地 3 处。5~8 月份，第一线各军共挤占阵地 23 处，扩展阵地面积 30 余平方公里，将斗争的焦点推向敌军阵地前沿。其间，刚刚接替李奇微任“联合国军”总司令的马克·克拉克（李奇微于 5 月中旬调任北大西洋公约组织总司令），为防止志愿军和人民军在朝鲜战争爆发两周年之际发动攻势，并对志愿军挤占阵地活动进行报复，于 6 月中旬，以 2 个师为主，第一线其他各师配合，对志愿军第 12、第 39 军 5 月份挤占的各一个阵地进行了攻击，

企图夺回。

志愿军的两个阵地各有一个连防守。克拉克动用营团规模的兵力，在飞机、坦克和大炮的支援下，连续攻击，仅夺去这两个阵地的部分表面工事。志愿军防守分队转入坑道坚守，分别坚守 5 昼夜和 10 昼夜，配合后方反击部队，将其中一个阵地的表面工事全部夺回，另一个阵地的表面工事也大部夺回。志愿军这两个阵地的坚守作战，初步显示了坑道工事在防御作战中的重要作用，并积累了依托坑道进行坚守的作战经验。

志愿军在取得 5~8 月份依托坑道工事进行攻防作战经验的基础上，为配合停战谈判，对敌方施加压力，并锻炼部队，取得经验，邓华、杨得志决定发动全线战术反击作战，经报请中央军委批准，于 9 月 18 日至 10 月 31 日，以准备换防撤出第一线的第 12、第 39、第 68 军为主，一线其他各军配合，组织进行了全线战术反击作战，先后对敌军营以下兵力防守的 60 个阵地攻击 77 次（其中人民军对 3 个阵地攻击 3 次），攻克 53 个阵地，均全歼防守的敌军，对于所攻克的阵地，不利于防守的立即放弃；对于可以争夺的阵地，进行反复争夺，大量杀伤敌军后视情况放弃或固守；对于可以固守的阵地，坚决固守打敌反扑。不但攻击连连得手，而且得手后是弃是守，主动权完全在我，打得敌军 8 个师频繁调动，疲于奔命，处处被动。经过反复争夺后，志愿军巩固占领 17 个阵地，共歼敌 2.7 万余人。这次重点作战的第 12 军，对 13 个阵地攻击 18 次，攻克 17 次，经反复争夺后，巩固占领 1 个阵地；第 39 军对 10 个阵地攻击 10 次，全部攻克，经反复争夺后，巩固占领 5 个阵地；第 68 军对 10 个阵地攻击 13 次，全部攻克，经反复争夺后，巩固占领 3 个阵地。

这次作战，志愿军兵力、火力构成同以往作战相比，有了很大变化，一般攻击敌军 1 个连的阵地，使用步兵 1 个连，而支援炮兵则达 8—10 个连，火炮 30—40 门，炮兵火力有了大大的加强。这是志愿军所以能够攻则必克、守则必固的重要因素。诚如毛泽东在 1952 年 12 月的一个文件里所指出的：“今年秋季作战，我取得如此胜利，除由于官兵勇敢、工事坚固、指挥得当、供应不缺外，炮火的猛烈和射击的准确实力致胜的要素。”毛泽东对这次反击作战给予高度评价，指出：“此种作战，在若干个被选定的战术要点上，集中我军优势的兵力火力，采取突然动作，对成排成连成营的敌军，给以全部或大部歼灭的打击；然后在敌人向我军举行反击的时机，又在反复作战中给以大量的杀伤；然后依情况，对于被我攻克的据点，凡可以守住者固守之，不能守住者放弃之，保持自己的主动，准备以后的反击。此种作战方法，继续实行下去，必能制敌死命，必能迫使敌人采取妥协办法结束朝鲜战争。”

与挤占阵地和战术反击的同时，志愿军首长还指示第一线各部，组织优秀射手，神出鬼没地展开了狙击歼敌活动（冷枪冷炮活动），歼击暴露在阵地前的敌军。第 15 军副班长罗怀孝一个月狙击歼敌 51 名；新战士张佩龙一个月狙击歼敌 36 名；机枪班长袁柳根一个月狙击歼敌 117 名；重机枪射手袁振江一个月狙击歼敌 221 名。这个军 4 月下旬至 7 月底，共狙击歼敌 3541 名，占这期间该军歼敌总数的 42%，狙击手仅伤亡 14 人。第 12 军从 7 月下旬至 10 月底，狙击歼敌 2506 名，消耗步枪子弹仅 5843 发，狙击手仅伤亡 11 人。5~8 月，志愿军和人民军共狙击歼敌 13600 余人。这一活动，有效地打击和杀伤了敌军，吓得敌军昼间不敢在前沿阵地上活动，被迫龟缩在工事内。

三、上甘岭岿然不动

经过 1952 年春季以来志愿军不断战术出击的打击，“联合国军”在战场上已处于不利地位。《韩国战争史》中写道：共军“从 1952 年 4 月至 9 月，在整个战线前沿不断挑衅，到 10 月初，全面发起高地争夺战，……采取了积极的方针”，“前线作战的主动权转移到敌人手里”。“相反，我军却一如既往，采取守势，因而不可避免地在作战上丢失先机之利，在战争精神上处于萎靡状态”。在美军战史中也写到：“9 月底 10 月初，种种迹象表明，共产党已越来越明显地掌握了地面作战的主动权。”此时的“联合国军”部队，就象“瘾君子”失去了刺激，怎么也提不起精神来了。

“联合国军”地面部队指挥官、美第 8 集团军司令范佛里特，为了给他的部队打上一针强心剂，振作一下精神，并对志愿军的战术反击进行报复，经他的上司克拉克批准，于 10 月 14 日，发动了“金化攻势”。范佛里特的目标，是夺取上甘岭以南志愿军分别以一个连防守的 597.9 高地和 537.7 高地北山。这两个高地是志愿军第 15 军五圣山主阵地的两个前沿支撑点，全部面积不足 4 平方公里。按克拉克的计划，使用美第 7 师和南朝鲜第 2 师各一个营，在 200 多架次飞机和 16 个炮兵营 280 余门火炮的支援下，进行 5 天作战，即可达到目的，估计要付出 200 人的伤亡。

然而，克拉克太高估了他的部队的作战能力，也太小看了志愿军的防守能力，他的算盘一点都没打对。在范佛里特发起进攻的第一天，尽管气势很凶，向志愿军的两个阵地及其周围发射了 30 余万发炮弹，投掷 500 余枚炸弹，创造了朝鲜战争中单位面积火力密度的最高记录，并使用 4 个营的兵力发起冲锋。但是，仍然在“一开始就挨了中国军队的当头一棒”。

第 15 军将防守该两阵地的兵力已各由一个连增加到一个营。在敌军实行火力轰击时，志愿军防守部队则利用坑道进行掩蔽，待敌军步兵冲锋时，则跃出坑道，使用步枪、机枪和手榴弹，进行顽强抗击，当天即毙伤敌 2000 余人，阵地几次失而复得，最后将敌军击退。

范佛里特第一天进攻的伤亡，大大超过了克拉克的估计，但继续投入兵力火力连续攻击。志愿军代司令员邓华，指示第 15 军军长秦基伟，取消该军计划中的战术反击作战任务，集中力量粉碎敌人进攻。于是第 15 军也不断投入兵力火力同敌军展开激烈争夺。战至 20 日，虽两阵地表面工事被敌军占领，但毙伤敌 7000 余人。志愿军防守部队转入坑道继续坚守。

到了此时，范佛里特已将美第 7 师和南朝鲜第 2 师全部投入使用。本来发动这次攻势，是为了扭转被动局面，对我军战术反击进行报复。然而，报复未达到目的，却遭受如此重大伤亡。我军战术反击，攻击数十个阵地，几乎是攻无不克，攻无不歼，而联合国军仅仅攻击这两个阵地，就碰上了硬钉子，使用如此众多的兵力和密集的火力，竟一周未克。无论克拉克还是范佛里特，已是骑虎难下。如果继续攻击下去，必然继续遭到重大伤亡，如果就此罢手，则面子上实在难堪。但是，为了挽回面子，只好硬着头皮，继续投入兵力火力争夺下去。克拉克后来在回忆录中说：“这个开始为有限目标的攻击，发展成为一场残忍的挽救面子的赌博。”而美军不愿再遭受伤亡，于是范佛里特把继续争夺这两个高地的任务，全部交给了南朝鲜第 2 师，后来又增调了南朝鲜第 9 师。对此，南朝鲜第 2 师师长非常恼火，抱怨说，“是

叫我们当美国兵的替身”。

志愿军是寸土必争，决心同“联合国军”争夺下去。志愿军总部为上甘岭地区的作战增调了炮兵部队，第3兵团首长王近山、杜义德调刚刚结束战术反击作战、准备休整的第12军为第15军预备队，参加上甘岭两个高地的争夺，并由第12军副军长李德生组成前沿指挥所。10月30日，第15军集中104门火炮支援，投入7个步兵连，在坚守坑道3个连的配合下，一举夺回了597.9高地表面阵地工事。11月1日，第12军1个团投入该阵地坚守。从1日到5日，范佛里特集中兵力火力连续5天猛烈反扑，企图夺回597.9高地的表面阵地工事。其中1日，发射炮弹12万余发，出动步兵6个营，2日，发射炮弹15万余发，出动步兵5个营。第12军和第15军坚守部队，灵活机智作战，打退敌军数十次冲锋，两天毙伤敌3500余人。至11月5日，彻底击败敌军反扑，巩固了阵地。对此，志愿军副司令员杨得志和代参谋长张文舟等致电祝贺，并鼓励部队“再接再厉，坚决打下去，直至将敌人的局部进攻完全彻底粉碎”。

在北京的毛泽东和彭德怀也非常关心上甘岭地区的作战。中央军委11月7日致电志愿军，指出：“此次五圣山附近的作战已发展成为战役的规模，并已取得巨大胜利。望鼓励该军，坚决作战，为争取全胜而奋斗。”8日，毛泽东将上甘岭地区的作战情况和作战部署批转全军，极大地鼓舞了上甘岭地区作战的部队。

11月11日，第12军以两个连在114门火炮的支援下夺回了537.7高地北山表面阵地工事。尔后又连续打敌反扑，直战至11月25日，范佛里特的“金化攻势”以彻底失败而告终，克拉克也承认，“这次作战是失败的”。

在上甘岭不到4平方公里的阵地上，范佛里特连攻40多天，先后投入3个多师6万余人、火炮300余门、坦克近200辆、飞机3000余架次，发射炮弹190余万发，投掷炸弹5000余枚。志愿军也投入3个多师4万余人、各种火炮140余门。在如此狭小的地区，双方投入兵力之多、作战时间之长、火力如此密集猛烈，不但是朝鲜战争中空前的，而且在世界战争史上也是罕见的。志愿军防守部队依托以坑道为骨干的坚固防御阵地，在炮兵火力的支援下，击退了敌人的进攻，守住了阵地，共毙伤敌2.5万余人，创造了坚守防御的范例。“地下长城”显示了“铜墙铁壁”的作用，上甘岭岿然不动。

至此，志愿军在整个正面战场，完全掌握了主动权。尽管“联合国军”具有现代化的武装装备，但由于“铁多气少”，在正面战线已是攻则不克、守则必失，完全陷入了被动挨打的境地，对志愿军已是无可奈何了。正如毛泽东所说的：“我们越打越强。美国人攻不动我们的阵地，相反，他们总是被我们吃掉。”

四、美国道义上的失败

在美军正面战线作战每况愈下，直至完全丧失主动的同时，美国侵略当局在道义上也遭到了可耻的失败。

美国当局为了挽救在战场上的不利局面，增加对朝中方面的压力，以影响停战谈判，并为了试验其细菌武器的性能，于1952年初，违反国际公法，不顾人道主义，在朝鲜北方及中国的部分地区实施了大规模的细菌战。

美国为了掩盖罪行，其细菌战是在保密状态下进行的。将经过精心培植

的鼠疫、霍乱、伤寒、痢疾等烈性传染病的病菌、病毒制成细菌弹或细菌粉剂，有的附在其他媒介物上，利用飞机进行投掷和布撒。对他们的飞行员也诡称“宣传弹”或“不爆炸的炸弹”，夹杂在轰炸任务中进行。仅1952年1月28日至3月1日，两个月时间内，在朝鲜北方就发现美军布撒的带有病菌病毒的昆虫等804处之多，在我国边境地区也有发现。多年没有鼠疫、霍乱流行的朝鲜北方，受到侵害而又感染流行。

毛泽东、周恩来对美国进行细菌战的情况极为关注，处理也非常慎重。经派专家调查了解，检验标本后，判明了“敌人最近在朝鲜所撒放的各种昆虫系进行细菌战的行动”。据此，2月下旬，毛泽东、周恩来决定展开反细菌战的斗争。

一方面采取有力措施进行战场防疫，紧急向前方运送了防疫药品和器材，供志愿军和朝鲜军民使用，派出防疫队和专家检验队，协助前方防疫治病。志愿军各部队也明确了责任，在各自作战区和驻防区内及时发现、扑灭美军布撒的带有病菌病毒的媒介物，及时消毒，还开展了清理驻区卫生运动。采取这些措施，迅速控制了疫情的发展。

另一方面利用新闻工具和国际场合，控诉、揭露美国细菌战的罪行，组成调查团并接受国际组织前往疫区调查，公布调查报告，举行美国细菌战罪行的实物展览，还从1952年5月起，陆续公布了执行细菌战任务的25名被俘美国飞行员的供词。尽管美国当局一直矢口否认细菌战的事实，但其细菌战的罪行在世人面前已昭然若揭，遭到了国际舆论的谴责。

至1952年冬，反细菌战的斗争告一段落。美国细菌战不但没有达到军事上的目的，而且在政治上、道义上遭到了可耻的失败。

毛泽东曾说过：抗美援朝战争，“我们方面发生的问题，最初是能不能打，后来是能不能守，再后来是能不能保证给养，最后是能不能打破细菌。这四个问题，一个接着一个，都解决了。我们的军队是越战越强。”

第八章

“山姆大叔”认输

- 艾森豪威尔：“在我们自己选择的情况下实行的行动”
- 中朝军队有备无患，以打促谈
- 严惩李承晚
- 克拉克：“我成了历史上签订没有胜利的停战条约的

第一位美国陆军司令官。”抗美援朝纪实美国在朝鲜战争中，始则气势汹汹，不可一世，继而连连失败，损失惨重，最后精疲力竭，几乎用尽所有招数，也只能是不断遭受伤亡而无所获。尽管“山姆大叔”对败在武器装备远远落后的中国人民志愿军和朝鲜人民军的手里，心理无法忍受，但也无可奈何，只好收场认输了。

一、防备美国使用最后一招

朝鲜战争进行到 1952 年冬季，美国已到了黔驴技穷的地步，除了原子弹以外，其他当时所有的现代化战争武器均已在战争中使用。然而，战争却总是同美国当局开玩笑，一点也不按美国的愿望发展，相反，却距离美国的愿望越来越远。“联合国军”在战场上只是不断增加伤亡和丢失阵地，而毫无收获。拖得时间越长，美国在这场战争中的“体面”丢失得越多。不但美国人民和在战场上的美国士兵，早已厌倦和不满，而且美国当局也认为，不能再这样令人难以忍受地无限期地拖下去了。要么通过谈判，老老实实地按照国际法和国际惯例解决战俘问题，要么孤注一掷，不惜进行最后的军事冒险。何去何从，美国决策当局必须做出选择。然而，停战谈判由于美方代表团于 10 月 8 日单方面宣布无限期休会，而处于停顿状态。从当年 10 月 14 日召开的联合国第七届大会上美国国务卿艾奇逊的态度看，美国没有恢复谈判的任何迹象。艾奇逊仍然顽固坚持美国的所谓“自愿遣返”原则，并操纵大会通过了强调这一原则的印度提案。

时值美国第 34 届总统大选。如何解决朝鲜战争问题，是这次大选活动中的突出内容。10 月 24 日，共和党候选人、曾在第二次世界大战中成功地组织了诺曼底登陆的德怀特·艾森豪威尔，在竞选演说中公开许诺，如果他当选总统，便亲自前往朝鲜，以结束这场战争。这一许诺对他击败对手当选美国总统起了关键的影响。

艾森豪威尔于 11 月当选为美国第 34 届总统后，12 月初到朝鲜进行了视察，与克拉克、范佛里特等侵朝美军高级将领及南朝鲜李承晚举行了一系列的会谈。美军的高级军官们都主张，在一定时间内，谈判还不成功，唯一的办法是全力发动一场进攻。李承晚更是竭力主张如此，并且要把战争扩大到鸭绿江以北，对中国境内的补给基地进行攻击。艾森豪威尔虽然没有做出决定，但他在回国以后于 12 月 14 日举行的记者招待会上声称：“对我们所面对的一个敌人，我们不能期望用言语打动它，无论言语是怎样娓娓动听；而只能用行动——在我们自己选择的情况下实行的行动。”艾森豪威尔就职后，又宣布解除了所谓“台湾海峡中立化”，怂恿蒋介石集团向大陆发动进攻。被解职的麦克阿瑟此时积极向艾森豪威尔建议使用原子弹。在朝鲜战场上，

早在 10 月间，克拉克就有计划地组织海、陆、空军联合登陆演习，并且制定了包括联合登陆进攻在内的大规模军事冒险计划。

此时，采取大规模军事冒险行动，是美国当局考虑的一个重要方案。艾森豪威尔后来在回忆中说：由于中国志愿军和朝鲜人民军在战线上建立了犬牙交错的坚固的地下工事，并有纵深防御阵地，联合国军如果发动正面进攻，“金化攻势”的失败已表明，突破阵地“是战术上的大问题”。此外，志愿军和人民军克服了后勤工作中的缺陷，前线物资充足，军队数量占有很大的优势。联合国军从正面发动“任何这类进攻都将付出极大的代价”。当然，如果配合以两栖登陆，也有将战线推进到朝鲜蜂腰部的可能，但这不具有“决定性作用”，因为战线靠近中国东北地区，会使联合国军“处于极端困难的境地”。因此，这类进攻是“最不诱人”的方案。除此，就是不惜进行一次大规模的军事冒险，把战争扩大到朝鲜以外，“同时打击中国在满洲的机场，封锁中国海岸，还要采取其他类似措施”。这需要增加至少 3 个美国师的兵力，和再扩充南朝鲜军两个师的兵力。为了“避免进攻时付出过分高昂的代价”，还要使用原子弹。但是原子弹对于具有坚固地下工事的中朝军队作用不大，还必须取得盟国主要是英国的赞同，否则会“和盟国之间造成分裂情绪”。最担心的是苏联会做出反映，苏联有原子弹，尤其美国占领的日本可能会遭到苏联的攻击。

对于美国大规模军事冒险的企图，主持中央军委日常工作的彭德怀和志愿军代理统帅邓华都有判断和察觉，并且认为美国不敢轻易使用原子弹，那么美国可能使用的最后一手，就只有大规模的登陆冒险。毛泽东同意这种判断。

因为中朝军队没有海军参战，空军力量也很弱，因此，防敌侧后登陆一直是我军战略指导上的一个大问题。此时，正面战线已经巩固，我军已有可能集中精力彻底解决侧后东西海岸的防御问题。只要这一问题解决了，我军就解除了后顾之忧，在整个战场上就完全处于主动地位了。这样毛泽东起草了指示，于 12 月 20 日以中共中央的名义发给志愿军，要求从目前起到 1953 年 4 月这段时间内，做好一切防敌在我侧后登陆进攻的准备。指示指出：“美帝国主义采用了很多办法和我们斗争，没有一样不遭到失败。现在剩下从我侧后冒险登陆的一手，它想用这一手来打击我们。只要我们能把它这一手打下去，使它的冒险归于失败，它的最后失败的局面就确定下来了。”毛泽东还指示邓华，应做肯定敌人以 5~7 个师在西海岸登陆，肯定敌于 1953 年春季甚至可能还早些登陆的准备。

{ewc MVIMAGE,MVIMAGE,!12300160_0137-1.bmp}

1953 年春志愿军代司令员、西海岸指挥部

司令员邓华视察西海岸阵地

于是，从 1952 年 12 月下旬起，到 1953 年 4 月，邓华、杨得志组织志愿军协同人民军进行了规模巨大的反登陆作战准备：调整加强了东西海岸的指挥机构，中央任命邓华亲自兼任西海岸指挥部的司令员和政治委员；确定了坚决阻敌上岸和上岸后坚决歼灭的指导方针；增调第 1、第 16、第 21、第 54 军及部分炮兵、高射炮兵和坦克部队入朝，志愿军在朝兵力达到了战争中的最高峰，共有 20 个军，连同其他部队计 135 万余人，将西海岸作为重点方向进行了部署准备。志愿军空军还有 14 个航空兵师做好了准备；以东西海岸为重点，全面构筑了坚固防御工事，共挖掘坑道 8090 条，总长 720 余公里，连

同以前挖掘的坑道，总长达 1250 余公里，在东西海岸和正面战线都形成了以坑道为骨干的完整的坚固防御体系；增调 6 个铁道兵师新建铁路，抽调 1 个步兵师会同工兵部队新建和改建公路，改善了朝鲜北方的运输网络；正面部队积极进行作战活动，配合东西海岸的战备工作。

毛泽东和周恩来，在 1953 年 2 月的全国政治协商会议上公开申明，如果美国新政府要扩大战争，中国人民只好奉陪到底，并做了充分准备，同时规劝美国通过谈判来解决问题。

至 1953 年 4 月底，随着反登陆作战准备的完成，我军完全解除了后顾之忧，从根本上掌握了整个战场的主动权，从而为取得战争最后胜利铺平了道路。鉴于这种情况，艾森豪威尔的大规模军事冒险计划只好胎死腹中，美国的最后一手也失灵了，不得不转而同中朝军队恢复停战谈判。

二、以打促谈

1953 年 2 月下旬，“联合国军”总司令克拉克奉命致函金日成和彭德怀，建议先行遣返病伤战俘，为被他们单方面中断的停战谈判重新恢复找个台阶。金日成和彭德怀给了他们这个台阶，于 3 月下旬复函克拉克，同意先行遣返病伤战俘，同时建议恢复停战谈判。3 月 30 日和 31 日，周恩来和金日成分别代表中朝两国政府发表声明：为消除在战俘遣返问题上的分歧，早日实现朝鲜停战，本着日内瓦公约关于停战后即予释放和遣返战俘的规定，建议：“谈判双方应保证在停战后立即遣返其所收容的一切坚持遣返的战俘，而将其余的战俘交中立国，以保证对他们的遣返问题的公正解决。”这个建议得到了包括英国、法国在内的国际舆论的支持。美国也就此下了台阶。4 月 20 日，双方开始交换病伤战俘。4 月 26 日，被美方单方面中断 6 个月之久的停战谈判重新恢复。

这次谈判的恢复，使朝鲜战争结束的可能性增大，但美国一些好战分子和南朝鲜李承晚集团仍有可能节外生枝，拖延谈判。为促成朝鲜停战早日实现，志愿军决定以打促谈。

此时“联合国军”在战场上，已是只有招架之功，而无还手之力了。志愿军同人民军完成了反登陆作战准备，已解除了后顾之忧，正面部队可以放胆作战。4 月底至 5 月初，邓华、杨得志召开志愿军党委会议，决定以美军和其他侵朝军队为重点打击对象，举行夏季反击战役，在充分准备的基础上，采取“稳扎狠打”、“由小到大”的方针，“目的主要是消灭敌人，锻炼部队，吸取经验，以配合板门店的谈判。同时，适当注意改善我现有阵地”。要求，“不打则已，打则必歼，攻则必克，守则必固”。

经报请军委同意，经过部署和准备之后，邓华、杨得志批准，准备较早充分的第 20 兵团郑维山、张南生指挥的第 60、第 67 军于 5 月 13 日开始，首先选定敌军连以下兵力防守的阵地发起了攻击。5 月 15 日，第 9 兵团王建安指挥的第 23、第 24 军（该两军是 1952 年 9 月入朝的，轮换第 20、第 27 两军回国），也发起了攻击。至 26 日，第 60 军对 7 个阵地攻击 13 次，经反复争夺后，巩固占领阵地一处，歼敌 1730 余人；第 67 军对 4 个阵地攻击 6 次，经反复争夺后，巩固占领一处阵地，歼敌 1790 余人；第 23 军对 3 个阵地攻击 3 次，歼敌 60 余人；第 24 军对 7 个阵地攻击 7 次，歼敌 540 余人。4 个军共对敌军连以下兵力防守的 20 个阵地攻击 29 次，全部攻克阵地歼灭守

敌，经反复争夺后，巩固占领两个阵地，共歼敌 4100 余人。

由于朝中代表团在谈判中的努力和志愿军作战的配合，美方代表团的谈判态度有所转变，于 5 月 25 日终于接受了朝中代表团的建议，同意将不直接遣返的战俘全部交中立国遣返委员会接管。然而，李承晚集团却对此极力反对，公开申明：不能接受联合国军的新方案，坚决反对不规定国土统一的任何国际协定。在 25 日的谈判会上，李承晚的代表拒绝到会，以表示抗议。直至停战协定签字，南朝鲜代表一直未到会。

邓华、杨得志鉴于这种形势，为更有力地配合谈判，打得更策略些，决定将原定以打美军为重点，改为以打南朝鲜军为重点，于 6 月 1 日，指示第一线各军：“目前反击作战对象主要是李伪军，应坚决打击，求得大量杀伤歼灭其有生力量，对英国等仆从军暂不攻击，对美军亦不作大的攻击（只打一个连以下的），但……不管任何敌人，凡是向我进攻，就坚决彻底地粉碎之。”

据此，第一线部队经过调整和准备之后，重点对南朝鲜军发起了攻击。从 5 月 27 日至 6 月 15 日，第 19 兵团曾思玉、陈先瑞指挥的第 46 军（1952 年 9 月入朝，轮换第 42 军回国），第 9 兵团王建安指挥的第 23、第 24 军，第 20 兵团郑维山指挥的第 60、第 67 军以及人民军金雄指挥的第 3、第 7 军团共对敌军团以下兵力防守的 51 个阵地，攻击 65 次，扩大阵地面积 58 平方公里，歼敌 4.1 万余人。其中第 60 军连续攻占南朝鲜第 5 师两个团的阵地，连同打敌反扑共歼敌 9000 余人，据《韩国战争史》记载，南朝鲜第 5 师所属 3 个团及配属的另 1 个团均被打残；第 67 军一次攻占南朝鲜第 8 师 1 个团阵地，连同打敌反扑共歼敌 4000 余人。该两军均创造了阵地战以来一次攻歼敌军一个团的范例。

我军的作战，有力地促进了谈判斗争。6 月 8 日，谈判双方首席代表正式签订了关于战俘遣返问题的协议。至此，朝鲜停战谈判各项议程全部分别达成协议。至 6 月 15 日，根据双方早已达成的军事分界线的协议，重新校订军事分界线的工作业已完成，双方司令官签署停战协定的各种准备工作基本就绪。为了保持政治上的主动，促进停战实现，6 月 15 日，彭德怀以中朝联合司令部司令员的名义，命令各部于 16 日起，一律停止主动攻击，但如敌向我攻击，则坚决打击。各部遂停止了攻击作战。

三、惩罚李承晚

就在朝鲜停战实现在即的时候，李承晚集团极力破坏和阻挠，一再叫嚷“不能接受如同对韩国宣告死刑的停战协定”，“将继续单独战斗，直达到目的为止”，公然破坏谈判双方于 6 月 8 日刚刚达成的遣返战俘的协议，有组织有计划地于 6 月 17 日深夜至 19 日，将在大邱、光州、论山、马山、峰山等战俘营由南朝鲜军看管的朝鲜人民军被俘人员 2.7 万余人和数十名志愿军被俘人员，以“就地释放”为名，强迫予以扣留。刚刚看到的朝鲜和平的曙光，又被罩上了阴影。

李承晚集团的破坏行为，引起了强烈的国际反响，不但民主国家的各国政府和人民纷纷谴责这种行为，就连英国、法国、加拿大、澳大利亚等国政府官员也强烈谴责这种行为，美国总统文森豪威尔和接替艾奇逊任国务卿的福斯特·杜勒斯，也觉得面子上难堪而非常恼怒。包括美国在内的许多国家

的舆论，纷纷要求撤换李承晚。6月18日，艾森豪威尔给李承晚发一急电，指责他“违抗了联合国军司令部的指挥”，并威胁说“要是你坚持目前的方针，就无法使联合国军司令部继续同你一致行动，除非你准备立即毫不含糊地接受联合国军司令部的指挥，处理并结束目前的敌对行动，否则就将另行安排”。正如美国一位记者所说的：“在整个世界上，李承晚的名望一落千丈，降到了最低点，世界上谴责之声四起。”

对于李承晚的这种破坏行为，我们当然不能容忍。6月19日，毛泽东致电志愿军代司令员邓华和副司令员杨得志及谈判代表团的李克农，指出：“我们必须在行动上有重大表示方能配合形势，给敌方以充分压力，使类此事件不敢再度发生，并便于我方掌握主动。”

同日，朝鲜人民军最高司令官金日成和中国人民志愿军司令员彭德怀致函克拉克，指出：美方“必须负起这次事件的严重责任”，“现在发生的这次李承晚‘释放’和胁迫战俘事件，证明我们所反对的强迫扣留已进一步地成为不容置辩的事实”，而“你方所一贯宣传的所谓‘防止强迫遣返战俘’，完全是无中生有”，“你方在这个问题上历来所表现的错误立场和纵容态度，不能不直接影响这次事件的爆发和即将签字的停战协定的实施”。“鉴于这次事件所产生的异常严重的后果，我们不能不质问你方：究竟联合国军司令部能否控制南朝鲜的政府和军队？如果不能，那么，朝鲜停战究竟包括不包括李承晚集团在内？如果不包括在内，则停战协定在南朝鲜方面的实施有什么保障？如果包括在内，那么，你方就必须负责立即将此次所‘在逃’的、亦即被‘释放’和胁迫扣留并准备编入南朝鲜军队中去的……战俘，全部追回，并保证以后绝对不再发生同类事件”。

这时，战场上的军事形势和政治形势对中朝方面都十分有利。为了对李承晚的破坏行为表示抗议，6月20日，朝中代表团要求谈判休会，直至美方做出保证。同时为了加深敌人内部矛盾，予美方以更大的压力，已从北京起程准备前往开城办理朝鲜停战协定签字事宜的彭德怀，于20日途经平壤时，致电毛泽东，建议：“根据目前情况，停战签字需推迟至月底似较有利，为加深敌人内部矛盾，拟再给李承晚伪军以打击。”并指示邓华、杨得志妥为布置。次日，毛泽东复电同意彭德怀的建议，指出：“停战签字必须推迟，推迟至何时为宜，要看情况发展才能作决定。”

根据这一精神，邓华、杨得志和轮换解方任志愿军参谋长的李达，指示第一线各部：

为给敌以更大压力，配合板门店谈判，并经彭总同意，决定在军事上继续予李伪军以狠狠的打击。为此，各军应根据原预选目标，如已准备就绪者应即坚决攻歼之，如新选目标应抓紧时间进行准备，并在有坑道之新占阵地上，应坚决扼守，求得在打敌反扑中大量杀伤敌人。对美军及外国帮凶军仍不做主动攻击，但对任何向我进犯之敌均必须予以坚决打击。

据此，第一线之第1、第46、第23、第16、第24、第60、第67军及人民军第3、第7军团，于6月25日开始，纷纷对已做好攻击准备的目标展开了攻击。与此同时，第20兵团杨勇、王平和被轮换准备回国的郑维山，计划了金城战役，接替王近山任第3兵团司令员的许世友、志愿军后方勤务司令部副司令员张明远等共同参加了研究。决定切掉敌军在金城正面的突出部，拉平战线。经邓华、杨得志批准，以第21、第60、第67、第68、第54军，组成东、中、西3个作战集团，在第9兵团第24军的配合下，于7月13日

黄昏，对南朝鲜军 4 个师防守的正面 25 公里的阵地，同时发起了攻击。

此次攻击，是志愿军转入阵地战以来规模最大的一次攻击，也是抗美援朝战争最后一次攻击，并且是抗美援朝战争中唯一的一次阵地进攻战役。志愿军集中了 1480 余门各种火炮，地面火炮对比以 1.7：1 占有优势，兵力对比以 3：1 占有优势。此次战役，志愿军共发射炮弹 1.9 万余吨，相当于志愿军在运动战时期第一至第五次战役发射炮弹总量的 2.2 倍。其中，在发起攻击的当夜，1000 余门火炮齐放，发射炮弹 1900 余吨，摧毁了敌军的主要工事。志愿军在 25 公里的正面上，一个小时之内即全部突破敌军阵地。至 14 日黄昏，已拉平了战线，向南最远推进 9.5 公里。尔后向敌军纵深做了发展，最远的又推进了 8 公里。16 日，敌军展开反扑，志愿军转入防御，直至 27 日，共击退敌军 1 个连至两个团兵力的反扑 1000 余次，共歼敌 5.3 万余人，南朝鲜军 4 个师被打残，收复阵地 160 余平方公里。毛泽东讲到这次战役时会说：“如果照这样打下去，再打它两次、三次、四次，敌人的整个战线就会被打破。”

从 6 月 25 日至 7 月 27 日，志愿军和人民军共歼敌 7.8 万余人，收复土地 178 平方公里。克拉克后来回忆时说：“在我的心中毫无疑问认为，这次共产党攻势的主要原因，假使不是唯一原因的话，是给大韩民国陆军一个迎头痛击，并向他们及全世界表示‘北进’是说易行难的事。”这次作战，严厉地惩罚了李承晚集团，加深了美方内部的矛盾，有力地保证了停战后朝鲜局势的稳定。

四、“联合国军”服软认输了

美国当局已经清楚地看到，战争越拖下去，联合国军的阵地丢失得越多，战争早停一天，阵地就可少丢一点。在朝中方面政治上强烈抗议、谴责和军事上严厉打击的双重压力下，一贯骄横的美国也不得不软了下来。美国向李承晚施加了压力，并向朝中方面作出了关于遵守停战协定的保证。

美国总统艾森豪威尔在回忆录中承认：共产党提出“美国究竟能否保证执行任何有南朝鲜人参加的协议”这一质问，是“有理由的”，并且克拉克无法作答。

为使李承晚能接受停战，并使克拉克能向金日成、彭德怀作出答复，美国向李承晚施加了压力。6 月 25 日，艾森豪威尔派助理国务卿沃尔特·罗伯特作为总统特使，前往南朝鲜，对李承晚进行劝说活动。克拉克也曾向参谋长联席会议请示，“假使大韩民国破坏停战协定，联合国应撤退对他的军事支持”。据 1953 年春接替范佛里特任美第 8 集团军司令官的马克斯韦尔·泰勒说，与此同时，“克拉克被授权，不管李承晚的反对态度，加紧解决停战谈判问题”。泰勒也被授权向南朝鲜的高级军官们说明：“美国对李承晚的耐心已接近最大限度的地步了。”泰勒在回忆中说：“为了表示我们迫切的意向，我们减少了对韩国军队的供应，特别是弹药与石油产品的供应，削减甚至停止了用来扩充南朝鲜军队的装备的交货，我在竭力提醒韩国的将军们，他们的国家和军队都是依赖美国的，如果李承晚继续抵制停战，那么援助就会没有指望了。”泰勒还说：“为了进一步强调这一点，我举行了一次记者招待会，公开阐明我的态度：如果韩国决定要单独继续战斗，联合国军可以从这场冲突中脱身出来，不会有多大困难。”

从6月26日开始，罗伯特同李承晚举行了14次会谈，对李承晚，一方面威胁恐吓，晓以失去美国帮助的利害，另一方面，又给以利诱抚慰，使这个美国人并不喜欢，但又没有别人能代替的老家伙能够听从美国的指挥。至7月11日，会谈结束，美国对李承晚表示：（一）停战后，美国将继续以和平方式促进朝鲜的统一；（二）缔结美韩共同防卫条约；（三）美国将予南朝鲜以长期的经济援助，并先援助两亿美元。美国以此为条件，换取李承晚做出不再破坏停战的表示。对于李承晚来说，就此停战不是他的愿望，但他也非常清楚，如果失去美国的帮助，他将一事无成，甚至整个南朝鲜和他这个傀儡总统的宝座也将失去。他也尝到了破坏停战遭到惩罚的利害。本来，他的不得人心的破坏行为，一方面是表示不愿停战，另一方面也是就此向美国要价。既然美国满足了他的要价，闹剧就不能继续演下去了。他向罗伯特表示，无意承认停战协定，但不再做反对停战的活动。

6月29日，克拉克也做了服软的表示，向金日成和彭德怀做出了答复和保证，他承认李承晚“释放”战俘“是一个严重的事件”，并保证“联合国军与利害相关的各国政府将尽一切努力以取得大韩民国政府的合作，遇有必要之处，联合国军将尽其所能建立军事上的防御措施，以保证停战条款将被遵守”。同时，恳求恢复谈判。

尽管克拉克对朝中方面提出的问题没有做全面明确的答复，但已经有了服软的表示，并做出了部分保证。鉴于此，金日成、彭德怀于7月7日，致函克拉克，表示同意双方代表团恢复定期会晤。7月10日，休会20天后，停战谈判举行了双方代表团大会。

此时，美方代表哈里逊，也一改原来的无赖模样，简直像一个做了坏事的小孩子，在倾听大人的指问，并且一条一条做出答复保证。当朝中代表团首席代表南日问及，能否保证南朝鲜不再破坏停战协定条款的实施时，哈里逊保证：南朝鲜政府“将不以任何方式阻挠停战协定草案条款的实施”。当问及南朝鲜进行破坏停战的侵略行为时“联合国军”将持何种态度？哈里逊保证说：“大韩民国进行任何破坏停战的侵略行为时，联合国军将不予支持。”当问及停战后，南朝鲜军破坏停战协定，采取侵略行动，而中朝方面采取必要行动抵抗侵略、保卫停战时，“联合国军”将采取什么态度？哈里逊保证说：联合国军仍保持停战状态，不给南朝鲜军以任何支持，包括不给予装备和供应上的支持。从7月11日至16日，哈里逊对朝中方面提出的9个问题一一做了答复和保证。

为了使世人得以共见哈里逊的保证，以便监督，7月19日，朝中代表团将这些保证公诸于世。同时表示，尽管美方对部分问题的答复和保证尚不能令朝中方面满意，但鉴于美方已做出了这些保证，朝中方面仍愿意尽快讨论停战协定签字前的各种准备工作。

7月24日，双方参谋人员最后一次校订了军事分界线。这时，同1951年11月27日达成军事分界线协议时校订的军事分界线相比，朝中方面净向南推进了332.6平方公里。

在1951年11月27日达成关于军事分界线的协议时，美方满以为有飞机大炮，只要战争没有停止就可多得地盘，因而，坚持在协议中写上，当时校订的军事分界线，在30天以内有效，而在30天以后实现停战，届时按双方军队的实际接触线重新校订军事分界线。然而，从那时起，到1953年7月，20个月时间，美国的现代化装备，美国的飞机大炮未能帮他们夺得一寸土

地，相反却丢失阵地 330 余平方公里。到了这时，对美国已没有什么“体面”可言了，但是如果不停战，就会更加不“体面”。

1953 年 7 月 27 日上午 10 时，朝中代表团首席代表南日和美方代表团首席代表哈里逊，在板门店签署了停战协定。是日下午 1 时和晚上 10 时，“联合国军”总司令克拉克于开城东南的汶山、朝鲜人民军最高司令官金日成于平壤也先后在停战协定上签字。28 日，中国人民志愿军司令员彭德怀于开城在停战协定上签字。谈判双方商定，1953 年 7 月 27 日上午 10 时为签字时间。根据停战协定规定，双方于协定签字后 12 小时，即 1953 年 7 月 27 日 22 时同时停火，朝鲜停战实现。至此，中国人民的抗美援朝战争胜利结束。

克拉克后来回忆朝鲜战争的情况时说：

1952 年 5 月，我受命为联合国军统帅，代表 17 个国家，在韩国抵抗共产党侵略。15 个月以后，我签订了一项停战协定，这协定暂时停止了……那个不幸半岛上的战争。对我来说这亦是表示我 40 年戎马生涯的结束。他是我军事经历最高的一个职位，但是他没有光荣。在执行我政府的训令中，我获得了一项不值得羡慕的荣誉，那就是我成了历史上签订没有胜利的停战条约的第一位美国陆军司令官。我感到一种失望和痛苦。我想我的前任麦克阿瑟和李奇微两位将军一定具有同感。

世界霸主、自由世界的“领袖”——“山姆大叔”，在朝鲜战场上失去了光彩与威风——在中国人民志愿军和朝鲜人民军面前输了，而且输得很惨。

第九章

胜利与启迪

- 不对称的力量对比
- 不对称的战争结局
- 胜利的启迪

中国人民是在极端困难的条件下被迫进行这场战争的，并且打赢了。这无论对朝鲜、对中国、对东方，甚至对于整个世界都具有重要意义。同时，也给人以重要启示。

一、悬殊的对比

一位加拿大籍印度学者，1993年夏季到中国访问，告诉本书作者，他正在写一本书，名为《不对称的战争》，朝鲜战争是他列入书中的6场不对称战争之一。

的确，朝鲜战争双方的经济实力和技术装备水平对比极为悬殊，是现代战争史上比较典型的一场不对称战争。本书作者曾准备将这本书定名为《悬殊的较量》，便是其中的主要考虑。

从经济上说，到朝鲜战争爆发时，美国的资本主义发展已有175年的历史，工业发达，技术先进。美国在第一、第二两次世界大战中又发了横财，第二次世界大战后，跃居为资本主义世界的最强国。1950年，其国民生产总值达1507亿美元（有的材料上说2848亿美元），钢产量8772万吨。而中国的情况同美国无法相比。中华人民共和国刚刚成立一年，由于近代以来中国遭受帝国主义列强不断侵略掠夺，工业发展极为缓慢，技术水平严重落后，几乎没有什么象样的工业，经济力量十分薄弱。1950年，中国工农业的总产值仅有574亿元人民币，如与美元按2:1的比值计算，则仅相当于287亿美元，仅相当于同期美国总产值1507亿美元的19%（或2848亿美元的10%）；钢产量仅有60.6万吨，仅相当于同期美国钢产量的1/144。

在军费方面，美国1950财政年度的军费开支达130.1亿美元，1953年度达504.43亿美元。而同期中国的军费开支仅28.01亿和75.38亿元人民币，相当于美国的11%和7%，也无法同美国相比。

在军队的武器装备方面，美国军队的武器装备是世界上最现代化的武器装备。美国具有强大的海军和空军，从战争一开始就将海空军投入了作战。投入到战场上的飞机最少时1100余架，最多时达2400余架，各种舰、船、艇最少时110余艘，最多时达300余艘。而志愿军参战后，志愿军和人民军在整个战争期间没有海军参战，并且前期也几乎没有空军参战。到了后期，连同苏联空军在内，参战飞机最多时为500余架，最少时仅200架左右。

地面部队，美军一个师即装备有各种坦克149辆、装甲车35辆，各种火炮794门，各种汽车3800余辆。美军的战场机动力、火力突击力、后勤补给力均很强，通信设备先进，指挥灵敏。连同其他国家军队在内，“联合国军”投入到战场上的坦克最少时880余辆，最多时1540余辆，各种火炮最少时10800余门，最多时16100余门。而志愿军在初期没有坦克参战，各步兵军也没有坦克和装甲车的编制，每个步兵军仅编有各种火炮520余门，仅相当

于美军一个师火炮编制的 2/3，并且火炮陈旧、型号杂、射程近、炮弹少。每军仅配有汽车 100 辆左右。志愿军的战场机动力、火力突击力、后勤补给力均很弱，通信设备落后，指挥联络困难。到后期火炮有所增加，总数略超过“联合国军”，达 19700 余门，但总体质量仍落后。坦克部队从 1951 年夏季开始入朝参战，连同朝鲜人民军的坦克在内，最多时为 792 辆，最少时仅 200 辆。

无论经济上，还是武器装备上，双方的对比均很悬殊，志愿军方面处于明显的劣势。美军进行的是全方位的、立体的现代化战争；而志愿军方面基本上是落后装备的平面战争，在前期是步兵在少量炮兵支援配合下作战，在后期，空军只能掩护后方，前方仍是以步兵为主在炮兵和少量坦克协同配合下作战。

然而，就是在这样的条件下，志愿军打胜了，并且是取得了了不起的胜利。从对方在战争中的得失上看，也是悬殊的对比，但是，这同武器装备的优劣悬殊并非成正比，而恰恰相反，武器装备处于劣势的志愿军则取得了大占优势的战果。

从战线的进退情况看，志愿军入朝时，美军已打到鸭绿江边。经过作战，将美国为首的“联合国军”从鸭绿江边打回到三八线，并一度打回到三七线，尔后互有进退，但将战线稳定在三八线南北地区。双方进退相抵，志愿军同人民军净进从鸭绿江到三八线的 500 公里以上，而美军方面则净退了 500 公里以上。志愿军完全粉碎了美国占领全朝鲜、威胁中国大陆的企图。

从双方人员伤亡损失看，自 1950 年 6 月 25 日至 1953 年 7 月 27 日，朝鲜人民军和中国人民志愿军共毙伤俘敌军 109 万余人，其中美军 39.7 万余人，南朝鲜军 66.7 万余人，英、法等其他国家军队 2.9 万余人。这是中朝方面公布的数字。美国官方公布，美国阵亡 3.36 万余人、战伤 10.32 万余人、失踪和被俘 0.51 万余人，共 14.2 万余人（可能未计美军编制中伤亡的南朝鲜人，每个美军师编 2500 南朝鲜人）；韩国国防部公布南朝鲜军阵亡 22.78 万余人、战伤 71.71 万余人、失踪被俘约 4.5 万余人，共 98.84 万余人。美国和南朝鲜官方公布的各自损失数的总和为 113 万余人（不包括英、法等其他国家军队的损失）。同一时期，朝鲜人民军和中国人民志愿军共伤亡、失踪和被俘 62.8 万余人（人民军的损失是本书作者统计的）。按朝中方面公布的歼敌数字计算，中朝军队和“联合国军”人员伤亡损失对比力 1：1.7。

单从志愿军的歼敌战果和自身的伤亡损失看，情况是：自 1950 年 10 月 25 日至 1953 年 7 月 27 日，志愿军共毙伤

俘敌 71 万余人，其中美军 29 万余人，南朝鲜军 39 万余人，其他国家军队 2 万余人。而志愿军阵亡为 11.6 万余人、战伤 22 万余人、失踪和被俘 2.9 万余人，共 36.6 万余人。志愿军同“联合国军”人员伤亡损失对比为 1：1.9。

志愿军共击毁和缴获坦克 1492 辆、飞机 4268 架、各种炮 4037 门（不包括击毁），而自身损失坦克 9 辆、飞机 231 架、各种炮 4371 门。

美国开支战费 400 亿美元（有的说 800 亿美元），消耗作战物资 7300 余万吨。中国开支战费 62.5 亿元人民币，消耗作战物资 560 余万吨。

从以上敌我双方经济力量、武器装备方面和战果方面两个完全相反的悬殊对比可以看出，中国人民的抗美援朝战争取得的不是一般的军事胜利，而是非常了不起的伟大军事胜利。

二、深远的影响

如果说中国人民的抗美援朝战争取得了了不起的军事胜利，那么在政治上取得的胜利更大，并在国际国内产生了深远的影响。

首先，这场战争中国人民达到了“抗美援朝、保家卫国”的目的。挽救了朝鲜民主主义人民共和国，稳定了朝鲜半岛的局势，保卫了中国大陆的安全，维护了亚洲及世界的和平。

其次，抗美援朝战争极大地提高了中华人民共和国的国际威望。中国人民热爱和平，但也不怕帝国主义的战争挑衅。刚刚建立的中华人民共和国，面对着长期战争造成的千疮百孔的烂摊子，面对着各方面的极为严重的困难，在国家安全受到威胁、在朝鲜民主主义人民共和国处境危急请求我国出动军队进行支援的情况下，以毛泽东为主席的中共中央毅然做出“抗美援朝、保家卫国”的决策，组成中国人民志愿军，同朝鲜人民一起与世界上最强大的资本主义国家的军队——美军作战，这充分表明了已经站起来的中国人民反抗侵略，保卫国家安全的决心，表明了中国人民伟大的无产阶级国际主义同爱国主义相结合的高尚品格，充分体现了中华民族的正气。这一举动本身就在国际上产生了巨大的影响，不但美国没有料到，而且世界许多国家都很瞩目。尤其中国人民志愿军，在武器装备那样落后、作战条件极端困难的情况下，竟然同世界上武器装备最现代化的美国军队坚持作战两年零九个月，竟然打败了美国军队。这更是美国当局始料所不及的，大大地震动了全世界，不但美国而且世界许多国家，包括社会主义国家，都不得不对中华人民共和国刮目相看了。中国在世界上的形象发生了180度的大变化。具有美国官方性质的关于朝鲜战争的史书，在谈到朝鲜战争的影响时承认：共产党中国在朝鲜战争中“提高了地位”，“从中国人民在整个朝鲜战争期间所显示出来的强大攻势和防御能力中，美国及其盟国已经清楚地看出，共产党中国已成为一个可怕的敌人，他再也不是第二次世界大战时的那个软弱无能的国家了。由于共产党中国有取之不尽的人力资源和坚强有力的领导，因此，他也在朝鲜战场上赢得了自己的声誉”。中国人民志愿军在朝鲜战场上打出了中国人民军队在国际上的威望，打出了新中国在国际上的威望。抗美援朝战争的胜利，一扫中国近代以来历史上的耻辱，中国人民真正地扬眉吐气了。可以说，这场战争对于中国人民是自鸦片战争以来最了不起的正气篇。正如毛泽东所指出的：“帝国主义侵略者应当懂得：现在中国人民已经组织起来了，是惹不得的。如果惹翻了，是不好办的。”

第三，严厉地教训了美国，消除了国内外一些人的“恐美病”，极大地提高了人们敢于同国际霸权主义势力作斗争的信心。美国从两次世界大战中发了横财，是第二次世界大战后资本主义世界经济上和军事上最强大的国家，俨然世界的霸主，到处侵略扩张，自认为不可一世。然后，美国在朝鲜战场上却遭到了失败，并且败在了经济力量和军队武器装备都远不能同他相比的中国人民手里。这是美国自1776年宣布独立以来的历史上，第一次受到严厉的教训。事实表明，美国不过如此，没啥了不起，并不是不可战胜的。对于他的侵略，只要敢于斗争，善于斗争，是可以把他打败的。这对我国具有“恐美病”的人是极大的教育，同时，对于亚洲和世界人民为民族解放和国家独立而反对帝国主义和殖民主义的斗争，也是极大的鼓舞。

第四，抗美援朝战争胜利的本身就确定了中华人民共和国在亚洲和国际

事务中的重要地位和作用，并且发生了深远的影响。在越南战争中，美国地面部队始终未敢越过北纬 17° 线向越南北方进攻，其主要原因就是朝鲜战争中的教训。美国兰德公司的一位学者说：60 年代，“美国期待选择对越南进行军事上干涉时，限制美国参加越南战争范围的主要遏制因素之一，是美国对朝鲜战争的记忆犹新。用约翰逊政府国务院主要官员的话说，‘我们考虑过中国干涉的可能性。我们肯定是非常深刻地牢记鸭绿江的教训’。美国决策制定人心中把美国参加朝鲜战争蒙受的巨大损失和所谓的风险已铭刻在心中”。60 年代末理查德·尼克松当选美国第 38 届总统后，主动要求同中国打交道，1971 年中国恢复在联合国的合法席位，1972 年尼克松访华，1979 年中美建立外交关系等，都有中国人民取得抗美援朝战争胜利这个因素在发生作用。

除此以外，抗美援朝战争的胜利，对我国在军事上和经济上也具有重大意义。

在军事上，我军经受了现代战争的锻炼和考验，特别是取得了依靠劣势装备战胜现代化优势装备之敌的宝贵经验。当时的许多经验，对我军后来的教育、训练和作战，一直发生重要的作用。直到现在研究高技术条件下的局部战争指导，仍具有重要的借鉴价值。这场战争极大地促进了 50 年代我军的现代化建设，尤其武器装备的改善和后勤建设，经过这场战争大有起色。

在经济上，抗美援朝战争不可避免地要付出巨大的物资消耗。但是志愿军在战场上取得胜利，也极大地鼓舞了国内的人民，从而激发了全国人民的生产积极性，使得我国原计划三年的经济恢复，于 1952 年提前半年完成。更重要的是，抗美援朝战争为我国经济建设取得了安全和平的环境，得以保证我军第一个五年计划顺利进行和完成。

三、启示与思考

这场战争作为历史已过去 40 多年了。然而，它留给人们许多耐人寻味的问题。为什么美国当局不顾中国人民的一再抗议和警告，而一意孤行，敢于越过三八线向鸭绿江进犯？为什么以毛泽东为主席的中共中央，在新中国当时那样困难的情况下敢于做出决策同美国较量？为什么中国人民志愿军在武器装备处于悬殊劣势、作战条件那样恶劣的情况下，能够取得胜利？这些问题很值得人们思考，并从中获得启示。

这场战争再次告诉我们，落后就会受欺，就要挨打。帝国主义者是欺软怕硬的，看重的只是实力。当时美国所以气势汹汹，不可一世，到处插手干涉别国内政，到处侵略，除了帝国主义的本性决定其必然如此外，关键的因素就是他具有强大的经济力量和强大的军事力量，具有侵略扩张的强大物质基础，具有威慑力量。如果中国当时不是那样的烂摊子，而是具有相当规模的工业基础和相当规模的经济力量；如果我军当时武器装备水平不是相当落后，而是具有相当规模的现代化基础，尤其是具有一支相当规模的海军和空军，装备水平与美军相当或接近，那么美国当局对我国一再发出的警告，也就不敢置之不理而一意孤行了。即便其一意孤行，那么我军在战场上作战有后方强大经济力量为基础，发挥人民军队的优势和特长，加上有一定现代化基础的武器装备，则完全可以取得更大的胜利，甚至完全可能在朝鲜境内歼灭以美国为首的“联合国军”地面部队，或将其彻底赶出朝鲜。我军著名

的军事理论家郭化若老将军多次讲过，在抗美援朝战争中，因为我军没有制空权，而难以达成战役的歼灭战，因为我军没有制海权，而不能达成战略的歼灭战。我军的战略方针一向是“积极防御”，我们不去侵犯任何国家，但我国也不容许任何别国来侵犯。然而，只有搞好我国的经济建设，增强经济实力，搞好我军现代化建设（特别是武器装备的现代化建设），增强我军现代作战能力，我们国家的安全才更有保证。

这场战争再次告诉我们，只要世界上存在帝国主义和霸权主义，我们就要时刻保持警惕，不能对他们存有任何幻想。毛泽东早在新中国成立前夕的1949年8月就说过：“我们说‘帝国主义是很凶恶的’，就是说它的本性是不能改变的，帝国主义分子决不肯放下屠刀，他们决不能成佛，直至他们的灭亡。”他们也决不会“强盗收心做好人”。因此，我们必须“丢掉幻想，准备斗争”。美帝国主义在朝鲜战争中的表现，完全证明了毛泽东论断的正确。台湾历来是中国的领土，早在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时，美国也承认台湾是中国的领土，并且在日本投降后，被日本侵占50年的台湾已归还中国，只不过当时是蒋介石统治的中国。然而，1950年6月，美国在侵略朝鲜的同时，也派其海军第7舰队侵略了台湾，并且一改美国以前的立场，不顾事实，竟公开声称台湾归属问题“未定”。美国在朝鲜战场上向北越过三八线以前，曾经通过有关国家向中国政府打招呼，说美国不打算越过三八线北进。然而，事实完全相反，不但越过三八线北进，而且在向中国打招呼之前即已决定向三八线以北进攻。这再一次告诉善良的人们，对于帝国主义者和霸权主义者不能抱有任何幻想，必须时刻保持高度警惕，对于它的侵略威胁和战争挑衅，必须坚决斗争。历史的经验和抗美援朝战争都告诉中国人民，对于帝国主义的侵略，决不能妥协退让，妥协退让只能换来帝国主义更大的贪心和自己国家的更大屈辱，只有坚决抵抗和斗争才是出路。

这场战争告诉我们，弱国可以打败强国的侵略。中国这个弱国所以能取得这场战争的胜利，是由许多因素决定的。其中最重要的有三条：第一，中国人民的爱国正气，反抗侵略支援正义的决心，尤其关键的是最高决策层的决心。中国近代史上的耻辱，是由于清王朝的腐败、软弱无能所致。日本帝国主义侵华，1931年迅速占领东北全境，1937年以后迅速占领大半个中国，是由于蒋介石国民党政府违背民意，实行不抵抗政策和消极抵抗政策的结果。美国侵朝，将战火烧到我国大门口，以毛泽东为主席的党中央勇敢地做出“抗美援朝、保家卫国”的决策，代表了中国人民反抗美国侵略的决心。对于侵略者的挑衅，敢于斗争，坚决斗争，这是取得胜利的前提。第二，在以毛泽东为主席的党中央和中央人民政府的领导下，中国社会的稳定和中国人民的团结一致。当时，加速各地剿匪和新解放区的改革及镇压反革命的工作，奠定了中国社会稳定的基础，与此同时，全党全国上下一致，团结一心，全力保护抗美援朝战争的胜利。“团结就是力量”，在党中央的领导下，在全国各级政府、抗美援朝总会和各级分会的具体组织下，全国各族青年踊跃参军参战；民工、铁路员工、汽车司机、医务工作者等踊跃开赴前线担负战地勤务；工人、农民努力增加生产、厉行节约，为前线提供需要的物资；各族人民为改善志愿军的武器装备踊跃捐款；祖国人民将志愿军称为“最可爱的人”，多次组织慰问团到前线慰问等。这些是取得胜利的物资保证和力量源泉。第三，以毛泽东为主席的中央军委和以彭德怀为司令员的志愿军总部根据这场战争的新情况、新特点，实行了灵活正确的富有创造性的战争指导

和作战指挥，加上志愿军广大官兵克服困难英勇杀敌的革命英雄主义精神和革命创造精神。这是取胜的关键。归结这三条，用毛泽东的话说，就是“依靠人民，加上一个比较正确的领导，就可以用我们劣势装备战胜优势装备的敌人”。

这场战争也再次告诉那些企图称霸的帝国主义者和霸权主义者，任何强国、大国，企图在世界上恃强称王称霸都是没有好下场的。在第一次世界大战以前，不列颠曾经是称霸世界的“日不落国”，曾几何时，他的殖民地纷纷独立了，他本身也在第二次世界大战中大伤了元气。第二次世界大战中的德、日、意法西斯，企图恃强称霸，然而，又是曾几何时，他们一个一个地被彻底打垮，不得不宣布战败投降。第二次世界大战后的美国，企图恃强称霸，然而，其第一个称霸行动——侵略朝鲜，就遭到了惨痛的失败，从此也开始走下坡路了。

历史是不能忘记的，前事不忘，后事之师。只有了解昨天，才能更好地知道今天和明天。

后 记

应《历史研究》编辑部之约，我写了这本小册子。感谢《历史研究》编辑部给我这样一个机会，感谢杨群编辑在我撰写过程中给予的指导。

这本战争历史小册子属急就篇，我从接受任务到撰写完成，共有三个多月的时间，并且因工作忙，只能利用晚上和工休日来写，来不及翻阅原始材料。所幸的是，我对抗美援朝战争历史有十余年的研究积累，并有许多成果可资利用。完成这本小册子，主要利用了我本人的《朝鲜战争决策内幕》（辽宁大学出版社 1991 年 4 月版）一书中的基本材料和基本观点，还参考了军事科学院军事历史研究部编著《中国人民志愿军抗美援朝战史》（军事科学出版社 1990 年 12 月版）、美国人著《朝鲜战争中的美国陆军》中译本（一）

（二）（国防大学出版社 1988、1990 年版）和韩国国防部编著《韩国战争史》等著作。

根据撰写要求，我撰写这本小册子的指导思想是：一、实事求是，尊重历史，不做任何虚构和夸张；二、在规定的篇幅内尽量多给读者以知识信息；三、虽然不是学术著作，但也尽量反映我对一些问题的新认识；四、尽我所能写得生动活泼，以求读者喜爱。这几点是我的初衷，但小册子中体现得如何，只有读者去评论。

曾庆洋同志审阅了小册子部分书稿，鲍明荣同志审阅了全部书稿，赵功德、郭志刚、曲爱国同志提供了帮助，在此一并表示感谢。

欢迎读者对小册子中的缺点错误提出批评指正。

作者
1995 年 9 月

